

# 国民政府

## 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1929—1948)

昆明學院  
學術文庫

马玉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一批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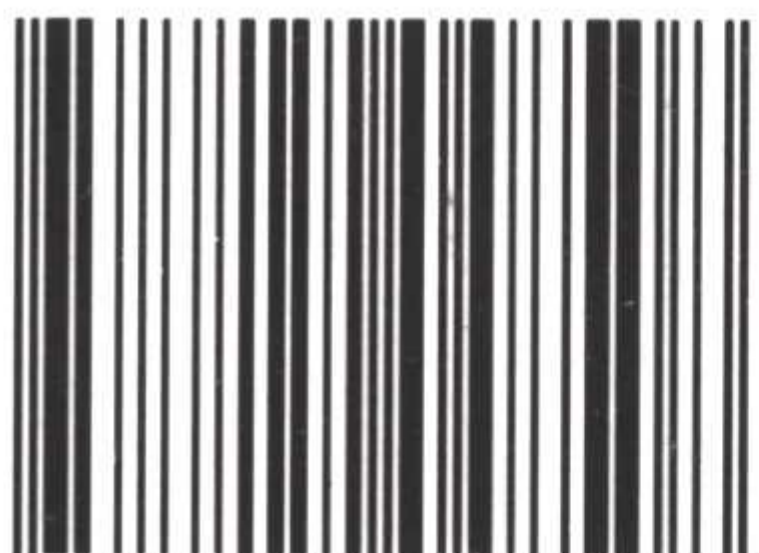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精神》 封海清 著

《〈易经〉心理类词研究》 刘青 著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 马玉华 著

《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 吴彦勤 著

ISBN 7-222-04850-2



9 787222 048508 >

ISBN 7-222-04850-2

定价：32.00元

# 国民政府

## 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1929—1948)

昆明學院  
學術文庫

马玉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马玉华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222-04850-2

I. 国... II. 马... III. 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国 IV. D69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616 号

责任编辑:杨云宝 文永清  
封面设计:袁亚雄  
封面制作:窦雪松  
责任印制:施建国

书名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1929—1948)
作者	马玉华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7-222-04850-2
定价	32.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序言

近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滇缅界务，日久未决，片马江心坡，已非我有，界碑外移，人民外徙”，“西教会已深入普及”，“外洋商品，充塞边市，印洋法币，横行垄断”<sup>①</sup>，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渗透分裂乃至侵入我西南边疆，边疆形势日趋紧张复杂。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研究边疆、建设边疆的高潮。而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与国防安全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三位一体的问题。研究边界边务，就必须研究边疆民族。研究国防安全问题，也必须研究民族与界务。正因为如此，大批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纷纷奔赴西南沿边地区，研究当地少数民族，考察界务，提出对策与建议。到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一个繁荣时期，产生了大量研究边地问题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为当时各级政府建设经营西南，并以西南为依托，抗击日寇等决策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进行民族识别，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解决边界与边务问题奠定了基础，积累了资料，至少是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成果的取得，与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尤其是1927~1949年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及云南、四川、贵州、西康等地方政府的倡导、鼓励、支持与亲历亲为是分不开的。由于整个民国时期仅为3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仅存在了22年，且由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执

---

<sup>①</sup> 陈玉科：《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弁言，见《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册，云南省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年5月。

政。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把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等同起来，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的反动的倒行逆施混为一谈，多作否定，较少研究。即使有所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取得的成果上，而没有注意到站在这些专家、学者背后的各级政府的作用，更没有注意到各级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界的一大缺憾。

而马玉华同志《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一书，弥补了上述缺憾。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马玉华，198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在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2002年，再次考入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民族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她刻苦努力，勤奋好学，选择了前人很少问津的课题作为其博士论文，从民族学史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及西南几省地方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系统研究。为完成论文，她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档案馆，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找梳理出民国各级政府进行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第一手档案史料，进而对这些史料进行排比、分析与研究，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书稿。

该书以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为空间，以国民政府及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等省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官方调查为研究对象。

作者首先分析了20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学的诞生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际背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浪潮，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为加强其政治统治和国防的需要，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强精神等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内背景；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和学术团体的西迁，民族学调查研究重点西移，使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成为可能。

其次，作者将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诸多调查系统归

纳，分为三大类：一是政府下发调查表格，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开展的调查。根据西南各省调查情况，对第一大类调查，又进一步归纳和分类，云南的调查可分为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和云南傣族调查5类。贵州、四川和西康的调查分为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4类。

再次，作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措施。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视和调查，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而这些调查又对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由于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中华民族一体观、中华民族一元理论)、民族平等观等治边思想，并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同化、培植各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国民政府建西康省、对西南土司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以及发展边疆教育等治理措施，又是其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贯彻和实施。

最后，作者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了全面地实事求是的评价与总结。认为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开始重视了；所进行的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调查，调查次数和种类较多，内容全面丰富，是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政府的民族调查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政府的调查，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推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当然，国民政府各级政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主张用汉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是传统大汉族主义的反映；加之其统治时间较短等原因，他们制定的带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民族政策也多流于文字和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与落实。西南各民族受压迫与剥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不平

衡，少数民族受歧视的现象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些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作用，也指出了它的缺陷。

总之，此书开拓了研究民国时期各级政府调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一个新局面，相信此书的出版，会起到抛砖引玉，进而将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作用。

万永林

2006年6月22日



## 目 录

前 言	1
<b>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及条件</b>	11
第一节 国际背景	11
一 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	11
二 西方民族学的诞生	12
第二节 国内背景	15
一 时代背景	15
二 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需要	17
三 国民政府巩固国防的需要	18
四 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强精神	20
第三节 调查条件	22
一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	22
二 中国民族学研究重心的西移	25
<b>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b>	27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	28
一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28
二 国民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对云南土司调查	31
三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34
四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35
五 国民政府对云南傣族人民调查	36

第二节	云南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及设计	38
一	云南省边政机构的设立	38
二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41
三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成果	44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云南的调查	56
一	国民政府派人对滇缅北段未定界的调查	56
二	国民政府派人对滇缅南段未定界的调查	57
三	国民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59
<b>第三章</b>	<b>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b>	<b>62</b>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	63
一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63
二	国民政府对贵州土司调查	64
三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66
四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67
第二节	贵州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	69
一	贵州省边政机构的设立	69
二	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成果	71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贵州的调查	78
一	国民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78
二	贵州省政府派人开展的调查	79
三	贵州省促进苗夷民族的同化工作	80
四	贵州省政府对威宁石门坎的经营	81
<b>第四章</b>	<b>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b>	<b>87</b>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	88
一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88
二	国民政府对川康土司调查	90
三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92
四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92

第二节	川康两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	93
一	四川省政府对川西南边区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	93
二	四川省政府对川西北边区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	97
三	川康建设方案 .....	100
四	对西康的设计和开发 .....	102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川康的调查 .....	104
一	国民政府及四川省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	104
二	四川省政府对大小凉山的调查 .....	106
三	蒙藏委员会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 .....	107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研究 .....	110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研究 .....	110
一	民国时期的民族观 .....	111
二	民族平等观 .....	116
三	边疆观 .....	118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	122
一	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以三民主义为指导 .....	123
二	中华民族一元理论是边疆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 .....	123
三	民族平等是边疆民族政策的原则 .....	123
四	民族同化是边疆民族政策的方针 .....	126
五	政治上培植各民族自治的能力 .....	126
六	经济上开发建设边疆 .....	127
七	文化上发展边疆教育, 提高边民文化 .....	129
第三节	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措施研究 .....	131
一	西康建省 .....	131
二	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 .....	134
三	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 .....	141
四	西南地区的边疆教育 .....	145

第四节 中央边政机构的设立 .....	154
一 蒙藏委员会的设立 .....	154
二 蒙藏委员会的工作 .....	156
结 语 .....	162
一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历史地位 .....	162
二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历史局限性 .....	165
参考文献 .....	169
附 表 .....	178
后 记 .....	199

## 前 言

### 选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 一 选题的缘由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听取多方意见，修改而成的。2002年9月，我考上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信息管理学系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博士研究生，师从万永林教授。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的博士课程。

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根据我曾教过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历，建议我从事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一个偶然机缘，我向大学同学张文芝（在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了解云南省档案馆馆藏少数民族档案的情况，她向我提供了她写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史料评述》<sup>①</sup>一文，从中我了解到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做过两次调查。以此为线索，我开始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过程中，逐步发现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止两次，调查范围也不局限于云南，而是在西南几省都做过。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是一种官方组织的调查，调查的资料大都散存在民国档案中，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云南、贵州、四川几省的档案馆。

为了搜集资料，我先后到云南省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两次）及贵州省档案馆查阅了有关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档案，并复印和购买了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省的许多书籍和资料。根据掌握资料的情况，通过与导师商量，在导师指导

---

<sup>①</sup> 张文芝：《弥足珍贵的史料——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史料评述》，《民族》，1997年第11期。

下，并听取了王文光教授、方铁教授、杨德华教授的意见，最后确定的题目为《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

选题确立了，但要做好这一课题仍有许多困难：一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刚开放不久，我的论文又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有的档案属于控制使用，部分资料我至今无法看到；二是课题所需资料均散落在几省浩如烟海的档案中，需要从众多卷宗中一点点找出相关资料，故搜集的档案资料有可能不全面；三是此选题由于过去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没有可资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四是我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功底较浅，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也较欠缺。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硬着头皮做了。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肯定会有许多欠缺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教。

## 二 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中华民国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国民政府离开中国大陆，在大陆统治38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历史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是中国现代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历史是延续的、前后相承的，后来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以前历史的部分内容、部分素质<sup>①</sup>。从发展的眼光看，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而了解昨天，比了解前天更为重要。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是短暂的，但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历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对了解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分布广泛，民族种类繁多（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民族种类有200多种）。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一不与当时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等有紧密关系。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及抗日战争等诸多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西南少数民族，在20世纪前期曾出现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热潮。对当时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繁荣情况，我们可以借用马大正先生对民国时期边疆史地研究总结的一段话来形容：“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

<sup>①</sup> 丁伟志：《对历史的宏观思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抒发国人之爱国热忱。他们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一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用群星灿烂形容此时研究发展盛况，本不为过。”<sup>①</sup>同样，一批接受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大量的民族调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民国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可分为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以及学者个人进行的调查3类，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及调查报告，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民族学资料。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既为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也为今天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保留了珍贵史料。

过去的学者曾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有所研究，对政府考察团开展的调查也有过介绍，但对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则迄今为止未见有人系统研究过。正因为这样，本选题的研究，具有下述几方面的意义：

1. 可以填补空白。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是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3类调查（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调查及学者个人调查）中规模最大、积累资料最多的一种，是中国民族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近现代中国民族调查历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本选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全貌，构建完整的中国民族学史。

2. 对国民政府进行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这些调查资料，有助于今天对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丰富西南民族史的内容。

3. 通过研究这些调查资料，可以进一步研究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及其边疆民族政策。而研究民国时期治边思想及其边疆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可以为新中国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提供某些借鉴。

4. 研究的成果能为时下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积累资料，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sup>①</sup>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研究现状及研究内容

### 一 研究现状

关于20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虽然迄今为止未见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许多前辈和学者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窥其一斑。

自20世纪40年代起，有一些专题论文对当时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初步介绍。如徐益棠的《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①</sup>、《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sup>②</sup>及《中国民族学之发展》<sup>③</sup>，岑家梧的《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④</sup>及《贵州宗族研究述略》<sup>⑤</sup>，愈兄的《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sup>⑥</sup>，陶云逵的《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⑦</sup>，罗致平的《战时中国人类学》<sup>⑧</sup>等文章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均为当时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学者所写，是研究者对于西南民族学史的回顾和总结。

在这些论文中，部分文章对政府的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情况有所涉及，如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及历史分期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及政府派出考察团的调查情况。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对1931年后（国民党）中央重视边疆问题，各省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研究管理边疆地区有所介绍。徐益棠先生曾参与中国民族学会的筹建，是中国民族学会的理事。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在蓉理事主持中国民族学会的工作<sup>⑨</sup>。他将政府的调查放在中国民族

①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②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斯文》（半月刊）第2卷第3期，1941年11月16日。

③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辑，1946年。

④ 岑家梧：《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

⑤ 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1944年1月。

⑥ 愈兄：《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社会研究》，1940年第12期。

⑦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⑧ 罗致平：《战时中国人类学》，《社会学讯》，1946年第1期。

⑨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学的发展历史中，可见中国民族学史理应包括政府的调查研究。

另外，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一文，对政府组织的贵州民族考察团也有一点介绍。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民族学史有新的认识，主要的论文有：陈永龄、王晓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sup>①</sup>，从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几个主要学派、民族学在解放前的基本情况等进行了系统介绍。这是80年代初最重要的一篇研究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的论文。

李有义的《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sup>②</sup>，对整个20世纪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对民族学未来的发展有一展望，但是文章对民国时期民族调查情况的介绍过于简略，且认为民国时期“所从事的一些边疆调查多是零星片段”，中国民族学始终未能得到很充分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这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

此外，秋浦的《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sup>③</sup>，江应梁的《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及《民族学在云南》<sup>④</sup>，满都尔图的《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sup>⑤</sup>，龙平平的《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sup>⑥</sup>，王水乔的《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sup>⑦</sup>，龙晓燕、王文光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sup>⑧</sup>等文，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也进行了回顾及研究，其中就包括了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调查。江应梁先生的《民族学在云南》一文，从民族学在云南的发展、成就及未来展望等几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20世纪

①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李有义：《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③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④ 江应梁：《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民族学在云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⑤ 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⑥ 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

⑦ 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⑧ 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

30~40年代的云南民族学的发展情况有详细介绍，其中也包括了政府派出考察团的调查情况。

近年出版的专著如：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sup>①</sup>，黄淑娉、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sup>②</sup>的第十四章“中国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对中国早期民族学发展情况有所介绍。杨庭硕等人的《民族文化与生境》<sup>③</sup>有一节内容讨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略。

上述的论著和论文，有的是对整个中国民族学史进行的回顾与总结，如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有的是专家学者自己研究西南民族的学术总结，还有的是对老一辈民族学家个人的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绝大多数是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个人的研究。其中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是近年来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它对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中国早期民族学史的历史分期、中国民族学的创建及发展、民族学中国化问题、早期民族学发展的特点、经验、存在的问题、作用与意义等，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其中包括了民国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内容。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书中只提到政府派出考察团和专门调查人员调查的情况，而对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进行的调查却没有关注到。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云南省志》<sup>④</sup>卷75社会科学志中，对民国时期云南民族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介绍，对于政府的调查情况提到了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学者、教师开展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云南省民政厅出版了“边政丛刊”（提到了书名，没有详细介绍），但对政府的其他几类调查却没有涉及。上述这些给我的研究留有了空间。

## 二 研究内容和特点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国民政府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研究基本上空白，当时的调查资料大都散存于南京和西南各省档案馆中，迄今为止未见有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75，社会科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5页。

人对这些调查资料做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故此课题是开拓性的研究。

本书是对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的研究。民国时期经过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从时间上来说，本书研究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具体的是1929~1948年间。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才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大规模调查。所以，研究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从研究的空间来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西南地区。由于20世纪30~4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异常繁荣，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发展的标志，代表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水平，因此本书以西南地区（即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作为研究的范围。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只涉及国民政府及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几省地方政府的官方调查，包括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及政府派出考察团和人员的调查。

充分利用档案材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由于这些调查资料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散存于西南各省的档案中，要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准查全相关资料，确属不易。因而本书重点研究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目的，即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和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措施，并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给予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 三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 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是比较重视的。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1949年，在大陆的统治只有22年，而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反映了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统治危机下，尤其是抗日战争中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使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西南少数民族。当然，由于当时的政府是建立在少数集团的利益和需要之上的，不可能为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有更多考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重视和调查是出于其政治统治的需要，是为了巩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了解情况。

2. 国民政府的调查既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又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中华民族

一体观、中华民族一元理论）、边疆观、民族平等观等治边思想。因此，政府重视西南边疆，调查西南少数民族情况，正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在调查基础上，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同化、培植各民族自治的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提出的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一体观等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中进步的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们认为，汉族在各方面胜过其他少数民族，主张用汉族同化少数民族，这是传统大汉族主义的反映。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间较短，其制定的民族政策只是表面和流于文字，边疆民族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各民族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民族平等只显示在民族名称的改变，而非权利。国民政府提出中华民族一元理论，妄图抹杀各民族间的差别，代之以宗族的概念，这是不对的。边疆民族政策中主张民族同化，而且是政府的强制同化，这必然遭到边疆人民的反对。

3. 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措施，主要有西康建省、对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及发展边疆教育等。这些措施对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加强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及提高边疆人民文化水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由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民族调查，民国时期尚属首次。清末，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政府理藩部曾对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过3次调查，内容有垦务、木植、牧厂、野兽、皮毛骨角、铁路、矿产、渔业、盐务、兵制、学堂、台站、疆界、商务等。这些调查主要在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进行，而且这些调查是为兴办实业了解情况，对兴利实边有一定益处。清末，还对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过边界调查。但上述这些调查并非专门针对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而由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大规模的官方少数民族调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种政府组织的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民族学调查中的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以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来搜集全面的西南少数民族资料，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调查次数和种类较多，调查内容较为全面丰富，是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情况

的真实记录。

5.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既为政府的民族调查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同时，政府的调查又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首次使用西方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开展的大规模官方调查。许多留学回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这些调查，他们运用了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使西南民族调查更具科学性。政府对民族学的鼓励和运用，促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

相对于现有的民族学史研究而言，本课题关注的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官方调查，这是过去的学者没有进行过的研究，这是选题方面的创新；所用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档案史料，且许多材料过去没有研究者使用过，这是资料方面的创新；首次对国民政府的官方调查进行集中研究，系统梳理，将其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研究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治理西南地区的措施，这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尝试。

本书以马列主义史学理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以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作为主要依据，采用史料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它们的成就与不足。

民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被称为边胞、边民，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称为边地，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称为边政机构，为了真实反映民国时期的原貌，保持当时的语境，这些名称在书中维持不变。调查中对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名称，如苗、夷、蛮、傛罗等，调查表格如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等均保持原来的称谓。

本书的题目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这里的“国民政府”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包括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西南几省的地方政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宣布中国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但这种统一只是表面的统一，事实上在1935年以前，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没有达到西南几省。即使是在1935年以后，西南几省名义上统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云南、四川等省仍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民国时期政府的调查，既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调查，也有西南几省地方政府的调查。虽然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省，民国时

期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对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如1929年的全国土司调查，西南几省在不损害地方政府利益的前提下，还是按照要求进行了调查上报。书中国民政府的调查，实际包括了中央政府和西南几省地方政府的调查，由于没有严格的区分，请读者明察。

## 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 调查的背景及条件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视与调查，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它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国际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西方民族学的东传，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际背景。

#### 一 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这个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所固有，而是从西方传来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标志性事件是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问世。<sup>①</sup>

18世纪，欧洲产生了三位民族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是英国的博林布鲁克、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赫德。虽然由于他们的环境不同，各自学说的内容颇有差异，但他们都有对其他民族权利的尊重，对侵略主义抱着愤恨的态度。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法国革命者宣告民族的统一，在他们的《人权与国民权》的初次宣言里，主张：“一切主权的原则根本属于民族。没有人可以行使不是直接由民族得来的权力。他们大胆地开始扫除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民族统一，有害民族统一的东西。他们取消阶级分别和特殊权利。他们没收贵族的财产……他们降低阶级的地位，把大众的地位提高到‘国民’的一般水准上，使一切‘国民’都一律成为法兰西‘民族’的分子。而且

<sup>①</sup> 陈露、刘泰民：《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社会动员》，《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一切‘国民’都同享个人的自由，同负民族的义务。”<sup>①</sup> 他们希望“欧洲与全世界的民族应当在自由，平等，和平与进步的国际友爱中团结起来。正如法人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自主，排除专制与特权一样，其他的民族应当拥护民族自决的权利，效法法人，摧毁束缚他们的桎梏。”<sup>②</sup> 可见，民族主义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

到19世纪，在民族主义的倡导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被奴役的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起来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压迫；被压迫的拉丁美洲人民起来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生了1820年的暴动；法、比、德、意在1830年发生了蔓延甚广的斗争；法、德、意、奥、瑞士和爱尔兰在1848年发生了更剧烈的斗争；波兰发生了1831年和1863年的革命。此外，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48~1849年，1859~1860年，1866年和1870年的意大利统一战争；1848~1849年，1864年，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日耳曼统一战争<sup>③</sup>等。其中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主义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他们创办的《浙江潮》第1期和第2期，连载余一的文章《民族主义论》，对当时民族主义席卷世界有一段描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正在席卷世界，“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sup>④</sup> 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 二 西方民族学的诞生

西方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国民政府调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方民族学产生于19世纪，现在普遍认为1839年法国巴黎成立的巴

<sup>①②③</sup> 海士著，黄嘉德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29、30、137~138页。

<sup>④</sup> 余一：《民族主义论》，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5页。



黎民族学学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学研究团体。随后，1842年成立了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英国伦敦建立了民族学学会，俄国在1864年成立了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则是于1869年建立的。

同时，一些学者在他们的实地研究和理论探索中，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以E.B.泰勒、L.H.摩尔根、A.巴斯蒂安为代表的古典进化学派，是民族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它的产生被看成是“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正式诞生的界碑。”<sup>①</sup>

英国民族学家泰勒（E.B.Tylor, 1832~1917年），被称为民族学之父。其代表作有《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原始社会》、《人类学：人和文明研究引论》。他认为人类文化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不断发展和进化，提出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并对文化下了经典的定义。他运用和发展了比较法，将统计学引入民族学研究，在文化进化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年），是古典进化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代表作有《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古代社会》等。他对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又通过寄发调查表格，广泛调查世界许多民族的亲属制度，提出了社会进化和家庭进化的理论。德国的民族学家巴斯蒂安（A.Bastian, 1826~1905年），在环球旅行广泛搜集世界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现代民族学的基本概念，通过实地调查开创了民族志的归纳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此后，学者们继续不断地探讨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学学派。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年）和奥地利的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imidit, 1868~1954年）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学家提出了文化圈理论。

英国的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 1864~1922年）等主张世界文明是从一个文明发源地即埃及传播出去的，形成了历史传播学派。

博厄斯（F.Boas, 1858~1942年）在19世纪末，先后对巴芬兰岛和

<sup>①</sup>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北美西南部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他与其学生克鲁伯（A.L.Kroeber, 1876~1960年）一起成为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代表，并于20世纪20~30年代建立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体系，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学学者。

法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杜尔干（E.Durkheim, 1858~1917年），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他后来从社会学的研究转向民族学研究。杜尔干与其学术继承人莫斯（M.Mauss, 1872~1950年）深入研究民族学，注重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的搜集，统计方法的运用，并对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关系加以分析，形成了法国社会学学派。美国民族学家F.伊根认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础是杜尔干和他的法国社会学派在19世纪90年代确立的。”<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以拉德尔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 1881~1955年）和马凌诺夫斯基（B.K.Malinowski, 1884~1942年）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出现了。功能学派关注社会的功能及结构，把研究的文化或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系统，一切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在其整合的系统中都有特定的功能。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是民族学学派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之一，而且它对美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也产生过推动作用。<sup>②</sup>

清末到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各流派通过我国留学生的介绍，陆续传入我国学术界。最早传入中国的是进化人类学派，影响较大，当时的学者主要是应用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对汉族古代历史进行解释，但没有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德奥民族学派、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民族学社会学派传入较晚，在中国除了广泛介绍这些学派的理论外，着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并作了不少实地调查。英国功能学派的传入是更晚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曾以几所高校为中心，曾在学术界广泛系统地介绍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曾深入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sup>①</sup> F.伊根：“民族学与社会学的100年”，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转引自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sup>②</sup> 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世界民族学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参考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实地调查，出版若干专刊报告，所以其影响较大<sup>①</sup>。

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民族学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经中国学者引入国内之后，“对于活跃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应当说也为中国民族学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sup>②</sup>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前提之一，也是国民政府重视中国少数民族，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理论依据。

## 第二节 国内背景

### 一 时代背景

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迅速在中国思想界占有突出地位，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并非偶然。正如章太炎在1904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sup>③</sup> 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接受和认同，是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有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发动了一次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而且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帝国主义入侵是中国近代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侵害，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噩运。因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这一思潮的出现，给苦难的中国人带来了曙光，使中华民族看到了希望。

<sup>①</sup>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sup>②</sup>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sup>③</sup>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几乎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民族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中国民众中高涨起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住的。既然世界正处在各民族“生存竞争”的时代，既然西方列强的扩张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而20世纪初的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怎样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中国有识之士就利用了民族主义这一武器<sup>①</sup>。于是，民族主义作为捍卫国家独立，抵御列强侵略的思想武器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旗帜，受到爱国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sup>②</sup>最早系统介绍宣传民族主义理论的是梁启超，他强调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是对抗专恃强权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呼吁中国“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sup>③</sup>可见，梁启超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是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新型民族主义<sup>④</sup>。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广泛传播，并且同革命要求逐渐结合起来。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显示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巨大威力。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他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把它作为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孙中山将民族主义置于三民主义学说的第一项，并很快为众多人们所接受。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资产阶级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1924年，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

①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

③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6～34页。

④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绪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所谓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是就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关系而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就国内各民族之关系而言，体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的主张。<sup>①</sup> 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主张民族平等，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国民政府立国的基础，国民政府要实现中国各民族的平等，需要了解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所以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这是民国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时代背景。

## 二 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需要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第三条：“为民族，故对于国内弱小之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sup>②</sup> 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立国，因此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视与调查，与国民政府标榜的民族主义相吻合。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由于时势的需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要实行同化，必须对边疆各民族的体质文化有充分的了解，这种知识的供给，就是民族学的任务。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蒋介石实施第二次“北伐”，进入北京，控制了华北诸省。随后，经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战争，蒋介石逐渐消灭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政权。1928年底，他又促使张学良“东北易帜”，实现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中国政治统治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转到由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扩大中央政府政治的影响力，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了解国内少数民族情况，处理好当时的民族关系，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为了控制西南、西北地区，实现全国范围的真正统一，

<sup>①</sup>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0页。

<sup>②</sup> 《国民年鉴》（民国18年）第4编，新亚书店1928年版，第1页。

必须对西南、西北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思考新的治边措施<sup>①</sup>。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从1929年底开始，反映了政府了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迫切需要。

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还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密切关系。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次年1月，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妄图侵占华北，进而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积极抵抗，救亡图存。

“一·二八”事变，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危机，南京不稳。蒋介石退到洛阳，作为行都。此举将中国后方薄弱等缺陷暴露无遗。如欲抗战，需要拓展并建设后方，建立依托，故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刻不容缓<sup>②</sup>。

### 三 国民政府巩固国防的需要

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巩固国防的需要。前所未有的边疆民族危机，引起国民政府关注边疆问题。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面临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东部海疆，美、日侵略台湾；在西北边疆，英、俄对新疆进行侵略和争夺；在西南地区，英、俄入侵西藏和英、法不断地侵略云南，边疆问题日益严重。

地处祖国边陲的西南各省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1858年，英国将全印度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并不断把侵略势力伸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几个小国家。1860年，英国派军队入侵锡金，把锡金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发动宫廷政变，支持亲英的拉纳家族掌握政权，实际上把尼泊尔变为了英国的附属国。1864年，英国出兵不丹，强迫不丹政府签订了《英不条约》，将印不边境的18个山口永远转让给英国。这样，英国不仅打通了英印殖民当局直通西藏的通道，而且削弱了这些小国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臣属关系。随后，英国就开始了西藏的入侵。1888年3月，英国侵略者500多人，进攻隆吐山下的扎鲁隘口，这是英国对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903年底，英国开始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

<sup>①②</sup> 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后，英帝国主义未能达到分裂中国侵略西藏的目的。1917年9月，英帝国主义又唆使和武装西藏分裂主义者向西康进攻，企图建立“大西藏国”，其目的就是将西藏和西康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数的1/3多，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3/4。云南有长达4060公里的国境线，西部及西南部与英属缅甸毗连，南部与法属越南接壤。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云南边疆地区不断地被英、法帝国主义蚕食和侵吞，先后发生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马嘉理事件”、“片马事件”、“班洪事件”；法国侵略云南、广西的中法战争、法国对云南南部领土的侵占、对云南矿权和路权的掠夺等。中国面临民族被肢解，领土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与边疆危机。

民国建立后，英帝国主义于1922年重新侵占云南的片马，并大举进兵江心坡，对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广大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926年，英国、缅甸殖民当局在江心坡登记户口，设官统治。同时，英国对中缅南段未定界（阿佺山地区）加紧资源的掠夺和侵占我国边境领土，先是非法收购我班洪、班老等地的银铅矿，进而直接开采我国阿佺山沿边的银铅等矿藏。民国23年（1934年），英帝国主义利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难方殷，无力经营边地之际，竟有以武力侵入班洪开矿之举”<sup>①</sup>，对中缅南段未定界进行武装占领。另一方面受英方唆使、鼓动和威逼，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大量少数民族边民纷纷举家逃离边境，进入缅甸<sup>②</sup>。1940年4月，暹罗改国号为泰国，日本利用泰国以大泰族主义相号召，图谋分化、吸收我西南地区的傣族。他们派人进入云南，到傣族聚居区秘密活动，诱惑傣族外附。<sup>③</sup>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势力南下，先后占领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西南地区由抗战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西南地区的稳定关系中国的存亡。

上述西南边疆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反响，人民纷纷呼吁，要求政府重视边政，解决界务，宣抚边民。西南边疆危机严重，已经威

①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张文芝：《弥足珍贵的史料——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史料评述》，《民族》，1997年第11期。

③ 参考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3卷。

胁到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国防，对西南边疆各省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

#### 四 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强精神

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殖民主义者、探险家和外交官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以游历、探险、传教、经商为借口，来我国边陲考察，或窃绘山川险要，记述边疆风土人情，或探发古城宝藏，满载而去。

19世纪到20世纪初，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的有英国人丁格尔（Dingle），他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由于他是徒步跋涉，对于当地的汉族、苗族、彝族、白族等民族作了亲自观察，后来写出了《丁格尔步行中国记》。英国商人立德（A.J.Little），到川边及云南等地，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和《穿过云南》。英国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的烈敦（G.J.L.Litton），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R.Davies），1894~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写出了《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分类。英国人克拉克（S.R.Clarke）在云南进行调查后，著有《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sup>①</sup>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王子于1895年从越南到印度，经过云南，写下了《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sup>②</sup>。

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他于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主要调查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调查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sup>③</sup>他“一方面利用古代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后来对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④</sup>

上述这些外国人对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考察和调查，出版了大量的考察记、探险记和调查记，对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中国民族学家从事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在较早时

①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0、61~62页。

② [法]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期，有些中国学者初涉民族学，特别是进行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是由研读和模仿外国的有关著作开始的。外国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为部分中国学者所吸收。<sup>①</sup>但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歪曲和诬蔑。

当时我国领土以外的人类学调查，没有中国人参加，这或许不能算是耻辱。但是，西南的少数民族“是在我国领土以内的民族，他们的人种、历史、生活、文化，都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去做调查的工作，成绩必远胜于外国人，若这个调查工作，尚欲让外国人去专美，还能说不是中国人的耻辱吗？”<sup>②</sup>

外国人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激发了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外国人的文化侵略，普遍存在着“不满”和“不服气”的情绪。许多学者认为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只有自己去搜集去研究。1929年，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从此真正开始了史语所相当有效的历史研究，其所长傅斯年的目的，就是“以历史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傅）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sup>③</sup>

1937年，江应梁也指出：“今日国人皆醉心于民族复兴之谈论。但对自己国内民族之认识，却又极端隔膜。西南民族为中华民族中之一大支派，过去国人对西南民族传统的谬误见解固无论矣，即今日言民族统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几人亲身到西南民族集团中作实地之调查研究？反之，外国却有花毕生精力，冒最大危险，往我国西南边境中作实际考察；考察报告一类书籍，在国内出版界中如凤毛麟角，在欧美以至日本学术界中，却有不少专门著述，这不仅为国人极大耻辱，且为民族前途极大的危机……今日国人欲求知晓自己国内的民族，反不能不从外人著作中寻取资料”，我们应该“深深地觉得内愧。”<sup>④</sup>因此，我国知识界的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② 参考杨成志民国19年（1930年）5月1日在岭南大学演讲《西南民族概论》时，何子恒所做的开场白。

③ 参考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江应梁：《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现代史学》，1937年4月，转引自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加强了对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的重视，开始组织对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

1929年后，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新史学的出现<sup>①</sup>。抗日战争中，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史学思潮，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掀起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sup>②</sup>。这些影响到国民政府对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全面了解本国各民族状况的重要性。

### 第三节 调查条件

#### 一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中国许多学生对社会科学知识感兴趣，到国外学习民族学等课程。中国学生大批到欧美留学，据不完全统计，1921～1925年，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主修社会学的共有35人，占当时留学生总数的2%<sup>③</sup>。自五四运动至1928年前后，在美国学习的有潘光旦、徐声金、吴文藻、吴泽霖、李济、吴景超、陈达、杨开道、黄文山、孙本文、许仕廉、江绍原、陈序经、张少微等；在法国学习的有杨堃、凌纯声、柯象峰、胡鉴民、徐益棠、卫惠林、许德珩、杨成志、李璜、萧瑜等；在英国留学的有刘威、梁宇皋、陶孟和、何联奎、刘咸等；在德国留学的有蔡元培、陶云奎、俞颂华等<sup>④</sup>。他们在国外学习时，大都受教于当时的民族学大师，接受了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课程，掌握了较为扎实的民族学知识，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20世纪20～30年代，在国外留学的学者们先后学成回国，推动了国内民族学学术活动的兴起。20世纪初至1937年，民族学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在中国开始介绍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1926年12

① 参考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参考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④ 参考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月，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最早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对民族学下了定义，并对民族学学科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民族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sup>①</sup>，如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由王亚南译为中文，1930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张鼎铭翻译的英国进化学派民族学家马雷特的原著《人类学小引》，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由杨东莼、张栗原合译出版。卫惠林将法国民族学家鲁妥势的《婚姻与家庭的进化》，译为《男女关系之进化》，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林振镛翻译了马凌诺夫斯基的著作《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1930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马凌诺夫斯基的另一重要著作《文化论》，由费孝通译出，1938年全文发表在《社会学界》第十卷上。李安宅翻译了弗雷泽的《巫术理论》（当时译为《交感巫术的心理学》），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景崧翻译了美国历史学派民族学家威斯勒的《现代人类学》，1932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钟兆麟译出了威斯勒的另一著作《社会人类学概论》，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吕叔湘译出了美国另一位历史学派民族学家罗维的《初民社会》和《文明与野蛮》，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局出版。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由蔡慕晖翻译，哈顿的《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由吕一舟翻译，译名为《南洋猎头考察记》，均由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同时，一些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还在国内介绍西方各种流派，其中贡献较大的有吴文藻、杨堃、孙本文等。吴文藻主要介绍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的学说，杨堃对杜尔干及莫斯学说的介绍<sup>②</sup>，孙本文则较多地介绍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发展历程。

其次，民族学家们开展了一些民族学实地调查，并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1928~1937年，一些民族学家开始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调查结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出版）一书。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的调查，后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出版）。杨成志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

<sup>①</sup> 参考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30页；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16页。

<sup>②</sup>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和《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等。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开展调查，写出《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刘咸对海南岛黎族进行调查，发表了《海南岛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和《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等多篇文章。庄学本赴川、康、青等地区调查藏族和羌族，出版了《羌戎考察记》（1937年出版）。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佯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1943年出版）。此外，还有凌纯声、陶云逵对云南彝族的调查，黎光明对川边民物学调查，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胡鉴民在川西调查羌族、马长寿等在川西调查彝族、羌族和藏族等<sup>①</sup>。“连同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所组织的调查在内，对国内少数民族中的瑶族、高山族、赫哲族、苗族、畚族、黎族、彝族、傈僳族、傣族、纳西族、羌族、藏族等，都先后有人作过调查”<sup>②</sup>。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始，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的一个标志。这些调查虽然是学术团体和学者自己开展的调查，但这些最早的调查，为后来政府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再次，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如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建立，蔡元培亲自兼任组长，民族学家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是民族学组的成员。同时，还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人类学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类学与民物学组也相继成立。民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的另一个标志。

最后，中国民族学会成立。1934年秋，由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凌纯声、商承祖、胡鉴民、徐益棠、何联奎等人发起，于同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对于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说明民族学在中国有了初步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由于群众基础不广，其活动时断时续。

抗日战争前，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主要的活动有二：一是黄文山、卫惠林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5月出版了第1期，撰文者十分之九为民族学会会员，此书出来后，国内外都很重视。这是中

<sup>①</sup> 关于中国早期民族学调查的情况参考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和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等。

<sup>②</sup>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只是出版期数极少，到1948年才出版了6期。二是193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主持了“全国风俗普查”。他准备以科学的民族学方法调查全国风俗，邀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三人负责筹划此事<sup>①</sup>。他们拟定了三年计划，一年筹备与训练，一年调查，一年统计与整理。全国风俗调查表格分别由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起草，最后由卫惠林整理统一。调查项目包括：人生礼俗、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道德观念与制裁等。此调查表力求完备，仅生活习惯就分为饮食、服饰、居住、旅行、卫生与疗养、游戏与娱乐六个部分，共有199个问题<sup>②</sup>。

此外，中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还根据国内的情况，先后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如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吴文藻《文化表格说明》，卫惠林《全国风俗调查问题格》，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sup>③</sup>等。

总之，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为国民政府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

## 二 中国民族学研究重心的西移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围主要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三大区域<sup>④</sup>。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各大城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再迁重庆。西南成为了我国当时的边防要地和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抗日战争的发生，是国民政府开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催化剂”。正如岑家梧先生在《青年中国》季刊上发表的《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所说：

“西南各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西南的地位益形

<sup>①</sup>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sup>②</sup> 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50页。

<sup>③</sup> 参考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④</sup>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重要。西南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题，更为各方面所重视。而要解决西南民族以上各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sup>①</sup>

抗日战争中，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民族学研究区域发生了变化。大批的人类学者和民族研究者来到西南，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为人们所熟知的有顾颉刚、闻宥、吴文藻、吴定良、罗常培、陈序经、朱谦之、杨成志、李景汉、陶云逵、吴泽霖、费孝通、李有义、张印望、凌纯声、芮逸夫、李济、董作宾、白寿彝、吴晗、翁独健、江应梁、李方桂、朱希祖、罗香林、林耀华、田汝康、吴宗慈、胡体乾、岑家梧、梁钊韬、马学良、李霖灿、张正东、陈国钧、张少微、李安宅、柯象峰、徐益棠等。他们被西南少数民族多样性的文化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走到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中来。学者们就地取材进行研究，中国民族学研究阵地转移到西部，研究区域集中在西南地区。可以说1937~1945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代表了中国当时民族学发展的水平，是中国民族学繁荣的标志。

民族学家们在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专题论文、纪实、报道等，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国民政府进行西南民族调查创造了条件。

同时，许多民族学家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使国民政府的民族调查，能够运用较先进的科学方法。如凌纯声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吴文藻任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边政学会常务理事；吴景超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陈国钧1943年任中央民众教育馆主任；杨成志担任广东省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主任委员；江应梁曾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车里县长等。他们在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8年抗战，民族学在西南地区确实开出了大量绚丽的花朵，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达到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高潮。

<sup>①</sup>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

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民国时期，云南东与贵州、广西连界，南接法属安南（今越南），西部及西南与英属缅甸毗邻，北界四川，西北与西康接壤。根据中国地理新志所载，当时全省面积大约398583平方公里。1936年，全省共有112个县，1市（昆明市），15个设治局，2个特别区（即河口、麻栗坡两个对汛督办署）<sup>①</sup>。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聚居区，民族种类繁多，“据云南通志载达142种”<sup>②</sup>，作者根据1938年云南上报的少数民族调查表统计，民族种类约150多种。可见，云南民族名称当时较混乱。1940年以后，云南省民政厅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初步识别，于1946年出版了《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分布册记载的云南民族种类有85种。

1946年，云南131个县属中，127个县（局）都有少数民族分布，只有昆明市及晋宁、江川、会泽3县，呈报无少数民族。云南少数民族从分布来看遍布全省，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县（局）占了全省行政区划的96.94%。根据1947年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统计，云南全省人口数为9200606人，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数合计4092104人，少数民族占了全省人口的44.48%。<sup>③</sup>

云南民族众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国民政府的调查可分为三类：一是国民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展调查；二是政府的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人员进行的调查。国民政府对云南的调查次数之多，规模较大，涉及内容广，这在中国历史

① 《云南民政概况》，云南省民政厅，1936年12月。

② 《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叙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1页。

③ 《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7卷，第119~132页。

上是罕见的。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

国民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对云南少数民族开展的调查共有10次，可分为5类。

### 一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主要有两次，分别是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

#### （一）西南苗夷民族调查<sup>①</sup>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危机严重，英帝国主义者于1934年武装侵占班洪、班老地区。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阿佤山17个佤族部落首领联名发表了《告祖国同胞书》，声称：“吾阿佤山，虽地瘠民贫……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告我同胞，尤念我阿佤山，地处中国极西南境，半壁河山，其关系于祖国之国防者，岂浅鲜哉！云贵川康，息息相通，唇亡齿寒之祸，岌岌可危，此我同胞所当留意之！”<sup>②</sup>呼吁中央政府及云南省政府当局，支援阿佤山人民的抗英斗争，重视云南边疆问题。

西南边疆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发布第112号咨文：“查我西南各省，苗夷杂处，种族甚多，生活习尚，各有不同，为团结国内各种民族，为防止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对于苗夷民族各项情况，实有深切明瞭之必要。兹经制定调查表式，拟请住有苗夷民族之各县政府，认真调查，确实填载，俾作施政之参考……”下令对西南边疆各省少数民族情况进行调查，并由蒙藏委员会制定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发往西南各省。

<sup>①</sup> 此次调查是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制定统一调查表格，对云、贵、川、康等西南省份少数民族情况开展的调查。因此，调查表格的名称四省都叫“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后面第三、四章也有此类调查。

<sup>②</sup>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云南省政府遵照蒙藏委员会的咨文，由省民政厅负责，要求有苗夷民族的县认真调查，尽快填报。《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包括：民族种类、户籍、人口、语言、生活习尚、教育情况及备考<sup>①</sup>等项内容。见附表1。

但由于种种原因，到1935年8月，云南“仅有昆阳等五十三县局遵办……其余七十七属，均未据填报。”<sup>②</sup>也就是说云南130个县（局），只有昆阳、宁洱、大关、凤仪、马龙、峨山、华宁、彝良、罗次、石屏、中甸、嵩明、玉溪、牟定、宾川、元江、南峽、晋宁、江川、呈贡、永平、澄江、缅宁、景东、建水、祥云、绥江、通海、富州、邓川、大理、弥渡、保山、洱源、文山、大姚、景谷、鹤庆、镇康、镇越、澜沧、华坪42个县和宁江、德钦、陇川、瑞丽、福贡、潞西、莲山、泸水、碧江、龙武10个设治局和河口对汛区，按要求上报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

### （二）西南边区民族调查<sup>③</sup>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增强抗战力量，稳定西南大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宣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民政府急需了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状况，于是，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8年5月又密咨：“查西南各省边区，汉夷杂处，自古多事。明清以来苗变层见叠出，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有以致之，值此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地方秩序之稳定，民力之团结，在在俱关重要。对于苗夷等族亟应因势利导，予以组织训练，使其效忠党国，籍以增强抗战力量。本部现拟编订宣抚苗夷方案，惟恐不明情形，将来实施困难，特制定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式，先事调查，俾资参考……转飭所属苗夷等族聚居各县，从速调查，填报汇转，以重要政……”同时，内政部下发了《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通飭西南各省对所属各民族情况迅速调查上报。

这次调查填报的内容有：民族种类、居住区域、人口数目（男、女）、壮丁数目、生活习惯、过去开化工作情形及备考等<sup>④</sup>项。见附表2。

① 《蒙藏委员会第112号咨文》，1934年10月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8卷，第1页。

② 《云南省民政厅叁籍字第4192号密令》，1938年6月2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9页。

③ 西南边区民族调查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统一调查表格，对云、贵、川、康等西南省份少数民族情况开展的调查。因此，调查表格的名称四省都叫“西南边区民族调查”。后面第三、四章也有此类调查。

④ 《云南省政府秘一民字第174号密令》，1938年6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6~7页。

在填表注意事项中要求：第一，民族种类栏分别填注苗夷等族类别；第二，居住区域栏填注前项民族住居省县乡村；第三，人口数目栏填注各该民族男女各别总数（后项壮丁数，应一并计入总数内）；第四，壮丁数目栏填注各该民族自18~45岁之男丁数目；第五，生活习惯栏如衣食住行及冠婚丧祭等以及语言性格职业知识程度均应详细填注；第六，过去开化工作情形栏填注各该省以往对于边区民族工作经过情形，以后工作意见亦得列入。

1934年的苗夷民族调查对于人口数目，仅列总数，未曾分别男女各有多少，其壮丁人数及过去开化工作情况，均未列入表内，甚为简略。而1938年进行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更侧重于男女人口数目、壮丁数目（壮丁指18岁~45岁的男丁）和开化情况，较1934年的调查规模更大，调查内容更详细。

云南省政府非常重视此事，于1938年6月发布密令：令云南各县、设治局及河口、麻栗坡对汛督办署，“于文到十日内，详实调查填报，以凭汇转。事关要政，切勿延误为要！”<sup>①</sup>

由于填报的表格有的太笼统，不符合要求；有的县长认为时间太紧，要求省政府宽限上报时间；有的将各种民族之人口、壮丁数目及生活习惯等项，合并填报，多与调查原意不符；有的以本县无少数民族为借口，不填报。为此，1938年8月，云南省民政厅在民叁三字第5706号训令中，要求“（一）各县苗夷民族，种类不一者，应视其种类之多寡，于表内加画直格，分为数栏，在民族种类后，每栏各填一民族，再将各该民族之住居区域、人口数目、壮丁数目等项按照原表各栏，每一民族，均分别详填，不得笼统填列，以期精确。（二）此项调查表，原限奉文十日内调查填表具报，现在为日已久，尚未据该属呈报，殊碍汇办，应饬赶紧调查，务尽七日内填报，不得呈请展限或缓办。（三）若无苗夷民族，应于奉令后，尅日呈覆。……事关重要，勿再延误干议。”<sup>②</sup>

在云南省政府和省民政厅的积极倡导与认真督查下，到1941年8月，

<sup>①</sup> 《云南省政府秘一民字第174号密令》，1938年6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6~7页。

<sup>②</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叁三字第5706号训令》，1938年8月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119页。

云南所属的113个县、15个设治局及两个对汛督办署都按要求上报了《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即使没有少数民族的县，也按要求做了呈覆。这次调查是完成得较好的。

《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和《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对云南民族的名称、分布地区、人口数目（有的还给出某一民族所占人口的百分比）、教育情况、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住行、民族性格、婚姻丧葬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民族的源流等都做了记载，它是民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与反映。

## 二 国民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对云南土司调查

这类调查共有4次，分别在1929年、1939年、1940年和1943年。

### （一）云南省现有土司调查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按照《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县为自治单位，“依照现行制度，各省省政府以下除县市政府外，本不容有他种特殊行政组织。惟边远省份或以种族居处太杂，或因土地开发较迟，所有特殊区划及特殊制度，不得不暂时存在，自属事实问题。兹为编订全国行政区划表起见……”，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制定了“现有土司调查表”及“现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sup>①</sup>，咨请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康、湖南、四川、新疆各省政府<sup>②</sup>，“飭令民政厅详加调查，凡与县治相当地方，现未改设县治，尚有此类特殊行政组织者，应即依式填表报部，以资稽考。”<sup>③</sup>

1930年1月，云南省政府给内政部的咨文“贵部第1488号咨文开，查县为自治单位，……自应查照办理，惟敝省仅有土司及行政委员两项，可资查填，并无盟旗等项，除将送到表式，令发民政厅遵照办理具报外，相应咨覆贵部查照。”<sup>④</sup>由于云南没有盟旗行政组织，主要是填报《现有土司调查表》（这里的“现有”是保持当时调查表的名称，指民国时期，下面调查表的名称也是如此）。

①③ 《内政部民字第1488号咨文》，1929年12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2卷，第199页。

②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1页。

④ 《云南省政府第5723号咨文》，1930年1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2卷，第196页。

《现有土司调查表》内容包括：土司名称、所在地、管辖境界、何时设置、隶属何处、可否改设县治、现在土官姓名、何时委任等<sup>①</sup>项。见附表3。

这次调查从1930年开始，到1931年8月结束。这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第一次调查，云南有土司的武定、建水、澜沧、保山、维西、宁江等35个县（设治局）上报了调查表。

## （二）云南省现任土司调查

第二次对云南土司的调查，起因是1939年1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渝日字第180号公函中称：“查边省土司原为前清遗制，民国以来，多已改土归流，旧有土司头人，亦由地方政府酌畀新职，本会现为办公上参考起见”，拟请云南省政府“将所辖境内已改土归流各土司之姓名、所在县治、现在职务及原有名称，列单见示。其有尚未明令改流者，亦盼一并查覆，籍便查考”。<sup>②</sup>

蒙藏委员会主要要求上报已改土归流的土司情况，但云南边疆地区当时已改土归流的只有金平县所属的猛拉土掌寨、茨桶坝土掌寨和者米土掌寨3处，大部分土司都没有改流。云南省民政厅按照蒙藏委员会要求，依据民政厅土司承袭的案卷并参照1930年第一次土司调查情况，于同年3月11日将金平县所属已改土归流的3处土司情况做了呈覆，并将尚未改流的土司情况一并上报给蒙藏委员会<sup>③</sup>。见附表4。

同时，云南省民政厅认识到：“本省边地各属，因交通不便，民族复杂，且历史风俗习惯，又各具有特殊情形，故迄今尚有土司制度存在。对于各属土司，曾于民国十九年通令调查一度；至今事隔九年，其中难免不无变迁。现值抗战建国之际，本省已成为后方重镇，边区地方界连缅越，关系尤大。为安绥边民巩固国防起见，特制定现任土司调查表式一张，随令发下……于文到一月内，依照表列各栏详细查填，具报来厅。”<sup>④</sup>于1939年10月发布了民叁三字第10841号训令，要求对云南省现任土司开展

① 《内政部民字第1488号咨文》，1929年12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2卷，第201页。

② 《云南省政府秘一铨字第358号训令》，1939年2月22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73卷，第144页。

③ 参考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73卷，第145～154页。

④ 《云南省民政厅民叁三字第10841号训令》，1939年10月2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34卷，第2页。

调查。

《云南省现任土司调查表》的内容有：属别、土司名称及职别、现任土司姓名及字号、年龄、简明经历、备考等<sup>①</sup>项。见附表5。

虽然云南省民政厅发布的训令要求在一个月內，有土司的各属填报到厅，但此次调查到1941年5月才结束，碧江设治局是最后一个上报到厅的<sup>②</sup>。云南有土司的37个属县（局）都按要求上报了调查表，无土司的93个县（局）也按要求做了呈覆<sup>③</sup>。见附表6。

### （三）云南省现存土司调查

由于土司有的死亡（如文山世袭开化土经历司周如桂，1939年病故，无人承袭），有的自己要求改土归流（如金平县所属的猛拉土掌寨刀光荣、茨桶坝土掌寨李温氏和者米土掌寨王纯安，分别在1931年和1932年自动请求改土归流，为云南省政府核准），有的因案被停职（如建水县溪处土舍赵福星，因争袭土司职位，主谋杀死另一赵福星嫌疑案被停职），故土司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

为了解土司变化情况，继续改土归流，1940年，国民政府下令对川康滇黔4省现存土司进行调查，这是对云南土司的第三次调查。

川康滇黔《现存土司调查表》的内容有：县（局）别、土司名称、设置年代、现任土司（姓名及年龄）、何种民族、辖境面积、管辖人口（户数和男女口数）、财赋、学校所数、识字人数、土司以下行政组织概况等<sup>④</sup>11项内容。见附表7。

云南省的兰坪、武定、昌宁、镇越、玉溪、蒙自、丽江、中甸、文山等县和德钦设治局等，按要求进行了填报。但是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次调查上报的不全面，有许多有土司的县（局），均没有填报。

### （四）云南省各属土司调查

1943年，云南省再次对巧家等37县（局）各属土司进行调查登记。同年9月11日，在民政厅下发的民叁二字第2132号训令中，对这次土司调查的原因说得比较清楚，“本省各属土司之死亡承袭及其他动态，

① 《云南省民政厅民叁三字第10841号训令》，1939年10月2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34卷，第3页。

② 参考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8卷。

③ 参考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34卷和48卷。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59卷，第92~130页。

曾经该管地方官报到厅者固多，而未据呈报者亦复不少，现本厅为明瞭各该土司近况计，特制定各属土司调查表一份，飭由该管县（局）长将所属境内各土司，照表列各项，逐一据实查填，限文到半月内，呈报来厅”。<sup>①</sup>这是对云南土司的第四次调查。

《云南省各属土司调查登记表》包括：属别、土司名称、姓名、字号、年龄、性别、学历、经历、现住地名、所属户口、承袭日期、备考等<sup>②</sup>12项内容。见附表8。这次调查登记到1944年才结束。

上述四次对云南土司的调查，涉及了云南土司的分布、土司名称、土司姓名、性别、职别、学历、经历、族别、管辖人口、辖境面积、财赋、学校所数、识字人数、承袭时间、土司以下行政组织概况等项内容，保留了民国时期云南土司的全面资料。

### 三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1947年，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人口进行调查，国民政府内政部指令：“和平建国纲领为改组后国民政府之施政准绳，已于国民政府施政方针第一条明白规定。上项纲领政治第六条第二项所定‘边疆少数民族所在之省县，应以各该民族人口之比例，确定其实行选举之省县参议员名额’一节，亟应切实实施。……本部兹为明瞭边省少数民族详细数字，以便根据上项规定，修改现行省县参议会组织及选举条例起见，特再制定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式一种，随电检送，务请迅即查填报部，以便汇办。”

《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包括：县（市）、少数民族名称、人数、合计、全县（市）人口数、少数民族占全县（市）人口百分比、备考等<sup>③</sup>项内容。见附表9。

云南省民政厅根据前几次对少数民族调查统计的人口数字，各县人口总数以民国34年度（1945年）保甲户口数为准，按要求进行了填报。根据此次调查，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合计4092104人，云南全省人口数为9200606人，少数民族占了全省人口的44.48%。

<sup>①②</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参二字2132号训令》，1943年9月1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58卷，第86~87、88页。

<sup>③</sup> 《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7卷，第119~132页。

#### 四 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此类调查分别是1947年的“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和1948年的“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 (一) 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

1947年，内政部人二字第271号未铣代电令称：“查我国幅员辽阔，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情形复杂，多未能切实依法举办户口查记，以致此项户口数字恒付阙，本部为明瞭上项人口状况，以便汇编全国户口统计起见，特制订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式一种，……希于文到一月内依式查填，专案报部”，并附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式一份，令云南省民政厅“依限遵办具报，以凭核转。”

调查内容包括：（民族）族名、人数（共计数和男、女数）、分布地区、生活习惯、语文（语言和文字）、宗教及备考等<sup>①</sup>项。见附表10。

（填表）说明：（1）“族名”，凡边疆民族原有族名者填原有族名，例如“蒙族”、“藏族”等，其余族名之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应填“生活习惯特殊国民”，并在备考栏内注明通俗之名称。（2）“人数”，如未经调查而无正确统计数字时，可填估计数，但须于备考栏内注明。（3）“分布地区”，应列举各民族及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现住之县名称。（4）“生活习惯”，列举各民族生活习惯之特点，择要填列，如有汉族，是否通婚亦应注明。（5）“语文”，填其本族自用之语言、文字名称，如通用汉语、汉文书，亦须注明。（6）“宗教”，应填明所信奉宗教之名称。（7）边疆民族及内地居住人口数，各省亦应查报。

这次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调查，到1948年2月完成。云南省民政厅“兹就现有资料，照填完毕，……具文呈覆”<sup>②</sup>给内政部。在这个调查表中，云南少数民族的族名经过初步的民族识别，共填有85个民族，对他们的人数、分布地区、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sup>①</sup> 《云南省政府卅六秘（一）（1）字第5296号训令》，1947年8月2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7卷，第105页。

<sup>②</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边字第1900号呈文》，1948年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7卷，第117页。

## （二）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1948年8月，重庆绥靖公署“为明瞭川康滇黔边区各民族人口、生活、教育、经济、出产等情形起见，特制定调查表式一种，……希于文到三个月内，查填具报”，并下发了《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令川康滇黔各省进行调查。

《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的内容有：族别、人口（男、女）、面积、教育程度（小学、中学、专科）、经济状况（主副食物、通货情况、特产物资、输入主要物资）、武力概况（枪种、弹药）、归化程度及备考等<sup>①</sup>。见附表11。

（填表）说明：（1）主、副食物应说明边区主要之食品。（2）通货情形指通货在边区使用之一般情形。（3）输入主要物资指日常生活所需而不自产之物资。（4）武力概况填明武器种类，已否登记烙印数及每枪配备子弹数。（5）归化程度指政府政令能否到达，及地方政府治理情形。云南省民政厅按要求进行了填报。

## 五 国民政府对云南傣族人民调查

中国的傣族与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印度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人是同属今天被学术界称为傣—泰民族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渊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的傣—泰民族逐渐分化成了傣、泰、掸、老、阿洪姆等新的民族群体，分布在今天中国、老挝、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国，形成了跨国境分布的格局<sup>②</sup>。

云南的傣族主要分布在今天滇西的德宏（民国时期的腾龙边区）、滇南的西双版纳（民国时期的思普边区）和玉溪的新平、元江、石屏等地。

1940年4月，暹罗改国号为泰国。受希特勒大日耳曼主义的影响，日本利用泰国以大泰族主义相号召，图谋分化、吸引我西南地区的傣族外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为，引起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注意。国民政府外交部致云南省政府的公函中说：“案据报告，暹罗自改称泰国后，对我云南之泰（傣）族人极为注意……查本

<sup>①</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统边字第14600号》，1948年9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2全宗765卷，第89～91页。

<sup>②</sup> 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部前曾迭据报告暹罗改称泰国之动机，在以大泰族主义号召，并宣称泰人散居我西南各省者为数达1950万云云，显欲效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之故，知其中别有用意，自应加切注意。究竟贵省南部是否有所谓泰人杂居？如有，其散布之区域如何，人数若干以及有无特殊活动情形？相应咨请查明，飭查详情，见复为荷。”

云南省政府在接到外交部密函后，令云南省民政厅“迅即转飭本省南部各县县长，详确查明呈覆，以凭汇转！”<sup>①</sup>要求对云南边疆傣族人民进行调查。

云南省民政厅认为：“暹罗改名泰国（Thailand），其民族名，国籍名用泰Thai，实含有希特勒所倡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谋吸收我西南边区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国号以前，（泰国国务总理銮披汶）曾旅行越南考古，详询越方人事登记职官关于泰族在越南及中国西南之人数。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云：‘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定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弦外之音，不啻视我车里、镇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区域如苏台德区。……泰Thai为自由之意，其民族散居我国者汉人俗称之为摆夷，依据美国传教士都德（W. Doad）《泰族》一书所载，认为有文字之泰族或佛教徒之泰族。在云南境内者汉摆夷60万人，水摆夷40万人，其他之水摆夷、花腰摆夷、龙家、水家等100万人……其实数或多或少，本省向无调查，殊难遽信？惟是水摆夷之聚居，以车里为最多，约占该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镇越、江城、南峇、佛海、六顺及宁江设治局一带，数亦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澜沧地方则有水、汉摆夷交处，景谷、景东则亦有汉摆夷在焉。又腾龙边区，则为汉摆夷所聚居。即开广、普思以及石屏、元江亦有摆夷。是知内部各地亦有所谓泰族者存在，不仅西南一部而已。兹奉令查各情，正拟办间，并据禁烟终查员彭钊函报‘澜沧二区被暹罗派人前来运动得紧’等语，以及暹罗改称与及其国务总理之言行种种，本省之泰族问题，前途实堪危惧！倘不急谋补救，则西南半壁，恐将发生重大变故。盖今日之敌国日本，正积极策动暹罗做政治之进攻也。”于是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密令，制定调查表式一份，令云南有傣族的县（局）“于文到一月内详查，将该属境内所有所谓泰族

<sup>①</sup> 《云南省政府秘外字第537号训令》，1940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3卷，第2页。

人民详细调查明确，依限汇填具报，以凭核转。事关重要，勿得视同具文，抑或向壁虚造！”

《云南省傣族人民调查表》，包括：种类（要求填水摆夷、汉摆夷、花腰摆夷、白摆夷、龙家、水家等所谓傣族人民）、人口数目、散布区域、与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百分比、有无特殊活动情形（有无外人入该区域活动）及备考等<sup>①</sup>项内容。见附表12。

此次调查，主要针对云南有傣族的51个县（局），即砚山、马关、西畴、屏边、金平、富宁、保山、腾冲、佛海、南峇、六顺、龙陵、大姚、墨江、缅宁、文山、思茅、镇越、镇康、顺宁、双江、新平、禄劝、昆阳、建水、石屏、元江、江城、景东、景谷、宁洱、潞西、莲山、梁河、盈江、陇川、沧源、瑞丽、宁江、耿马、平彝、峨山、丽江、广南、弥勒、蒙自、泸西、澜沧、车里、麻栗坡和河口对汛督办。调查从1940年5月开始，到1941年7月调查结束，宁江设治局是最后一个呈报的，于1941年7月16日才上报到厅。

以上十次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是由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开展的调查。调查的组织，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云南省政府，令云南省民政厅作为调查的主要组织机构，民政厅再令由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各县情况，填表上报。云南省政府组织的调查，仍由省民政厅组织，由各县（局）长负责调查填报。调查方法是采用调查表收集大量信息，通过对调查表的汇总，掌握云南省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情况。

## 第二节 云南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及设计

### 一 云南省边政机构的设立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边疆危机严重等诸多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边疆地区和边疆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要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援前线，提供充足的兵源，保证为前方提供各种军需物品，维护支持战争的后方交通补给线的

<sup>①</sup> 《云南省民政厅叁三字第4444号密令》，1940年5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3卷，第7页。

畅通，都要求对这些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次提醒人们建设和保卫边疆的重要性<sup>①</sup>。因此，开发西南边疆和建设边疆刻不容缓。

### （一）云南苗夷民族问题研究会的成立

国民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组织机构，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最突出的有“云南苗夷民族问题研究会”和“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

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需要对西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研讨，进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宣抚，以利抗战。1940年1月，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刘介提出“关于宣抚苗侬各族”的提案，咨请广西省政府转呈中央宣抚苗侬各族，以利抗战而挽危局。提案称：“自武汉残破，邕钦沦陷而后，我西南各省大规模之山岳战或有展进之可能，此一时期为我军以游击战达到消耗战，而予敌人以致命伤之时期，亦即我民族安危存亡千钧一发之时期，其关系比前此任何战区为重要。惟我西南之山岳地带，所居民族甚属复杂，除汉人外，在现时所称为边胞者如苗、瑶、侬、摆夷……各种族皆繁殖其中，湘之西，桂之北，滇、黔、西康山岳大部所在皆有。此等民族矫捷勇敢，坚忍耐劳是其所长；知识低下，生计困穷，利可以饵，威可以胁，智术可以牢笼是其所短。际兹抗战时期，我政府若不未雨绸缪，速谋所以抚而教养之法，必临渴而掘井，则事机一失将一溃而不可收拾矣。”于是提出关于宣抚苗侬各族的九项办法。<sup>②</sup>

内政部在接到广西省政府的呈文后，于1940年3月发布咨文，咨请川、康、滇、黔、湘、粤、桂各省政府暨教育部、财政部酌办，要求切实研究西南苗夷民族。

云南省政府也认识到：“本省苗夷民族，种类复杂，欲谋汉夷民族之融合，抗建伟业之完成，必须熟悉情形，对于苗夷民族问题详加研讨，始期化导，联络感情，似非一纸具文呈转所能了事，即如政府德威之宣传，抗战建国之重要，教育文化之普及，生活习惯之改良诸端，究应如何方适合于苗夷民族区域之推行，而迎合其心理，使之了然，政行

<sup>①</sup>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sup>②</sup> 刘介：《关于宣抚苗侬各族提案》，1940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111~116页。

无阻，在在均有研讨之必要。”<sup>①</sup>于是，云南省民政厅、教育厅联合呈请组织“云南省苗夷民族问题研究会”，罗致专家，专门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并要求制定宣抚边疆民族的具体办法。

## （二）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建立

根据国民党中央五届八次全会边疆施政纲要中“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sup>②</sup>的要求，1943年10月，云南省民政厅又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在给内政部的呈文中说：“窃查本省僻处西南边陲，省内沿边各地，尚保有若干具有特殊性质之边疆区域，在此类地区中，举凡山川气候，住民生活，均不同于内地，而物产丰饶，蕴蓄富厚，则又远非内地所能及。惜政府向以人事所限，未能开发利用，小之足以影响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向上发展，大之足以妨碍国家民族之团结统一……本省近年来虽曾多致力于开边化民，然无统筹机构及具体方案，收效殊鲜。为促进边疆之开发，俾得早与内地均齐发展，暨巩固国防起见，因根据需要，于厅内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网罗专门人才，根据边地实况，拟定具体方案，作为推行边地行政之张本。并培养边疆工作干部，以供政府开疆殖边之助。”<sup>③</sup>

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隶属于云南省民政厅，“设专任委员五人，由厅长委派充任之，办理本会一切会务。设兼任委员二人至四人，由厅长指派本厅有关科、处长充任之，共同办理本会会务。设主任委员一人，厅长在专任委员中指派一人充任之，秉承厅长命令，综理本会一切会务。设顾问若干人，由本会遴选对本省边疆有特殊研究之专家，提请厅长聘任之，供本会边务之咨询，必要时并出席本会委员会议。设干事若干人，由本会遴选熟悉边情，有志入边疆工作者，签请厅长委任之，秉承主任委员之命办理搜集、调查、研究、通讯及会内一切事务。”<sup>④</sup>根据

<sup>①</sup> 《云南省民政厅卷三字第4733号咨文》，1940年5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122~123页。

<sup>②</sup>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

<sup>③</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边字第2308号呈文》，1943年9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全宗646卷，第81~82页。

<sup>④</sup>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1943年9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全宗646卷，第83~84页。

其组织规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先后聘任杨可成、陈竹鸣、刘仲升、安石生等为顾问，朱兆、张涤清、曹子英、何中极、陆烈武等为委员<sup>①</sup>，民族学家江应梁被聘为主任委员<sup>②</sup>。

江应梁（1909~1988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西南民族。1937年，江应梁取得云南地方政府的支持，被派到云南考察滇西傣族，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取得硕士学位，留在中山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中山大学迁来云南，他也随之到了云南。1943年，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民政厅长陆崇仁聘江应梁为主任委员。1943~1945年间，江先生在主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为促进边地建设，改善边疆行政计划，编印边疆行政丛书，以供边疆从政人员，遵照实践或研究参考。”<sup>③</sup>先后编写并出版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1945年7月，江应梁奉令充任车里县长，才离开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

## 二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概括起来可分为调查、研究、设计和行政四类<sup>④</sup>。

### （一）边疆调查

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

1. 经常通讯调查。即将边地分别设置边地通讯区，聘请区内熟悉边情人士兼任特约通讯干事，就各该区内经济、文化、地理、社会、政治各项情况随时报告。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先后聘任了木焘轩、李拂一、杨友柏、彭桂萼、张征东、张子炜等为通讯干事。

2. 委托云南省民政厅政务督导员进行调查。当省民政厅派出政务督导员到各地时，委托他们进行调查。

① 参考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32、103卷。

② 《江应梁先生自述》，见高增德、丁东主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③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民国33年度全年工作报告》，1945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16卷，第13~14页。

④ 参考《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民国33年度全年工作报告》，1945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16卷。

3. 由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调查表格，下发给各县（局）的调查。如开展边民调查、边区人物调查、滇东北沿边调查和思普沿边调查等。

## （二）边疆研究

其研究工作有10类。

1. 翻译孙中山先生的遗作。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作翻译为爨、僂<sup>①</sup>、苗、摩些四种文字，并将译文发给有关专员及县局长审核校定。

2. 编撰边地民众读本，并译为边地文字。

3. 编译各项文献。将内地各种文献翻译介绍到边疆地区。

4. 编印边疆行政丛书。为促进边疆建设，改善边疆行政计划，先后出版了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书五种（后文有详细介绍，兹不赘述）。

5. 举办边疆问题系统讲演。聘请专家轮流主讲，以促进国人对于边疆的兴趣与认识。

6. 编辑《边疆周刊》。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借正义报出版《边疆周刊》，1944年，每周出版一次。

7. 对云南省边民生活及分布的历史进行研究。云南各族边民有本省土著者，亦有由外省迁入者，其生活习惯自古迄今，多有变迁。根据历史资料和当时调查情况，戴沐群对云南民族的分布进行研究，写出了《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sup>②</sup>，李圣智对云南民族的生活进行研究，写出《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sup>③</sup>

8. 征集边疆文物。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规定可征集的文物范围较广，包括汉文的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类，如衣服、靴、鞋、筒裙、帽子、包头巾、羊毛披毡、腰带、背心、披肩、首饰及其他饰物等；用具及工艺品，如农具、猎具、食具、乐具和工艺品等；宗教用品，如佛像、宗教绘画、献神装饰品及其他宗教品；还有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等。并规定所有征集到的文物都要统一填写卡片，写明汉名、当地人所用名、采集地、采集时间、所使用或制造的民

① 这里的“爨”是指今天的彝族，“爨文”即今天的彝文，“僂”是指今天的傣族，“僂文”即今天的傣文。

② 戴沐群：《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1944年，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5卷。

③ 李圣智：《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1944年10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5卷。

族、采集人与捐赠人等内容<sup>①</sup>。

9. 研究云南边民概况和分布。对云南边民概况的研究分三部分，一是边民志要，采用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出版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中“云南边地的土民”一项，附以边民分布图；二是云南边民分志，将云南各民族人民归入彝人、僂夷、苗瑶、西番、缅越等五大类，分别研究其源流、社会组织、生活习尚，并各附有分布区域图。三是对云南边民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根据多次对云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写出《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云南边民种属分布》等。

10. 编制表格。为协助边疆地区行政，达到开发边疆的目的，特制定各项表格，以备应用。如制定土司状况调查表、边疆地区外国人传教状况调查表、昆明至边区县途程表等。

### （三） 边疆设计

开发边疆是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设计各边区开发方案又是其中心工作。民国时期将少数民族称为边民或边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文化落后地区通称为边区。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首先将云南省边疆地区38个县（局）分为五大边区，即思普边区（包括车里、佛海、江城、六顺、镇越、南峤、思茅、宁洱、景谷、宁江十县）、缅宁边区（包括耿马、缅宁、澜沧、镇康、双江、沧源、昌宁七个县）、大小凉山边区（丽江、兰坪、鹤庆、永胜和宁蒍五个县）、中维德边区（包括中甸、维西、德钦、福贡、贡山、华坪六个县）、腾龙边区（包括保山、腾冲、龙陵、瑞丽、梁河、陇川、盈江、莲山、泸水、潞西十个县局）<sup>②</sup>。其次，逐步拟定各边区开发方案，先后制定了《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中维德区开发方案》、《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治理方案》等。

### （四） 边疆行政

1. 登记边疆行政干部人员。边疆行政的改进及边疆事业的兴办，须有健全的干部人员，方能顺利推行。因而凡有志愿入边疆工作者，即给予登记，并随时与之联系，以备需要时征集调用。

<sup>①</sup>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sup>②</sup> 戴沐群：《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1944年9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5卷，第9页。

2. 保障边疆人民权益。1944年2月，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通令各属地方，认真保护边民，无论内地官商，概不得欺压边民。同年5月，通令各县（局），不得以“犛”、“豸”等作为边民名称偏旁，并不得用“蛮”、“貊”等称边民。

3. 宣慰边民，并彻底清查边地不法事件。对各民族代表或各地土司晋省报告者，由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出面接见，与之谈话和询问。如1944年沧源设治局所属的佤族土司代表田子昌等、班洪总管胡忠华等、澜沧县募乃土司石炳麟、芒市土司方克胜等先后晋省报告，均由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负责接见。除对边地各土司拥护政府，协助抗战予以奖慰外，并宣扬政府治边法令，以期加强团结合作，巩固边防。对于边疆地区发生的不法事件，也由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转报云南省政府彻查，如抗战中，在边疆的“游击队”危害地方事件，“边疆宣慰团”在维西、德钦骗取边民财物，中央化学兵团征兵苛扰边疆人民等事件，由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核请云南省政府制止，并令有关各属注意查办。

4. 研讨审核各方边疆行政计划。仅1944年，就先后研讨省参议员李种德（毓茂）提出的“调整思普沿边行政建设建议案”和“训练边官计划建议案”；研讨省参议员姜亮夫筹议“西南文化研究院建议案”；审议远征军政治部“滇缅边区工作计划草案”等，并拟具意见，呈复给云南省政府。

5. 协助各项边疆工作。如协助民政厅将禁烟标语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协助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洽商来滇工作计划，并随时协助其各项工作。

### 三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成果

“云南省苗夷民族问题研究会”、“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等研究机构的成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积极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写出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西南边胞教育建议刍议》、《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其治理方案》、《政



务督导员调查报告》、《设立中缅边区及卡拉山区特派员行政公署意见书》等。

其中由江应梁编著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和杨履中主持编写的《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构成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系列丛书五册，现重点介绍和评价这几本册子。

#### （一）《边疆行政人员手册》

1944年1月~3月，江应梁编著《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这是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一，于1944年4月出版。手册叙述本省边地情况及边疆行政要点，实为全丛书之纲领。

《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分上、下篇，上编云南的边疆区域，包括何谓边疆（有地理环境、住民生活和语言文字三方面）、云南边地的土民、边区的土司政治（云南土司的来历、明清时代的土司、现存的土司和土司政治的实情）等内容。下编是革新边疆行政的基本要点：即建立政府威信（廉、信、实）、开化边民智能（从提高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统一语言文字、保持固有美德、提倡汉夷通婚几方面开化民智）、开发边疆经济（有建设交通、扑灭瘴疠、移民屯垦、开发矿产、倡导种植、倡导畜牧、成立合作金库、组织消费合作社、改良人民固有经济生产、利用环境作特殊建设等十方面发展经济的措施）、重视国防建设（提出调查山川险要绘制详细地图、增加粮食生产修筑交通要道、加强民族意识提高爱国精神、严密保甲组织充实民众武力、顺应边民个性训练国防战士等五项措施）及结语。<sup>①</sup>

手册介绍了本省边地的基本情况，将云南民族分为两大部门五个类别。两大部门是：一是住居本省境内年代较久远，人数较多，可以称为土著的爨人（今彝族）和摆夷（今傣族）两种。二是由邻境陆续移入的土人，约可分为3类：由贵州、广西边境移来的苗瑶，由西藏、西康移来的西番，由缅甸、越南移来的缅越人。故将云南民族分为罗罗系、摆夷系、苗瑶系、西番系和缅越系。这种分类既不同英国人戴维斯的分类<sup>②</sup>，也不同

<sup>①</sup> 江应梁：《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4月。

<sup>②</sup> [英]戴维斯在《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将云南民族分为孟高棉、掸或泰、藏缅和汉四类。他是从语言上进行分类，是当时较科学的分类，但它的错误在于把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瑶归到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于国内学者丁文江和凌纯声的分类<sup>①</sup>，这是江应梁先生根据历史资料及他对云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而提出的分类，虽不够准确，但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

《边疆行政人员手册》用大量篇幅论述了革新边疆行政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建立政府威信，提出政府应该在“廉、信、实”三个字上体会并力行，才能在边疆民族中建立政府威信。其次，主张“应以开化政策，代替高压政策。”要从提高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统一语言文字、保持固有美德、提倡汉夷通婚几方面开化民智。这些观点对于现在我们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仍有参考价值。

## （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

《大小凉山开发方案》，是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二，1944年9月出版。

《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共有九章，第一章 凉山现状（分为区域、住民和开发之必要三部分）；第二章 确定开发原则；第三章 川滇康三省合组凉山建设委员会；第四章 化凉山为内域（包括缩紧包围向内开拓、以武力协助开拓及以建碉堡辟交通奠定开拓基础三方面内容）；第五章 移内地人民入凉山屯垦；第六章 移凉山强夷分居内地；第七章 成立县治；第八章 凉山经济之开发（分现成财富之处理和待开发财富之处理）；第九章 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地区成为抗日的大后方，然而在川滇康三省交界处，有一片未开发地区——大小凉山。其“区域西与西康之越嵩、冕宁、西昌、盐源相接，南与云南之巧家，西康之盐边、会理相接，东与云南之永善，四川之雷波相接，北与四川之马边、峨边相接；据一般估计，全境南北约700余里，东西约400余里。”<sup>②</sup>

该地居民纯为夷人（今彝族），分布于全区险要山岳地带，文化相对落后，性情强悍，雄踞大小凉山中心地带。由于种种原因，形成当时严重的“夷患问题”，邻接凉山之各县区，每年被夷人侵扰，掳掠人畜，焚屋越货之事，屡有发生。而且他们种植鸦片，以换取白银

<sup>①</sup> 丁文江先生在其《爨文丛刻·自序》（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中，将云南民族分为掸人、藏缅、苗瑶和交趾四类。凌纯声先生的论文《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地理学报》，钟山，1925年），将云南民族分为掸人、藏缅和蒲人三类。

<sup>②</sup>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9月，第3页。

及枪支，妨害国家禁止种植鸦片的禁政，成为独立地区，既未立县，亦未设治，仍为各部落单独统治。国家法律，丝毫不能推行，与国家行政统一不符。总之，大小凉山的“夷患”，成为困扰川滇康三省的重要问题，且当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为稳定抗战后方，也需要开发大小凉山。

1943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专员考察三省边区夷民，鉴于三省边区夷务严重之原因，一由于夷人利用三省交界处之险峻地形，为害种种，再由于三省无共同治理方针与步骤，致凉山始终未能开化，因之由三省轮流，每年召开边务会议一次，对凉山之开发妥议具体方案，分期进行，庶使三省境内，不致有此特殊区域之存在，因由军委会、内政部分电三省政府查核拟复。云南省以邻接凉山，境内永善、巧家、华坪、永胜、宁蒍各县局，受害最深，对禁政之推行，阻碍尤大；故关于凉山之开发，除由（云南）省府复电赞同外，并将该案发交本厅（云南省民政厅），着拟具开发方案，因飭由（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根据各属报告有关资料，并实地考察情形，拟成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呈准省府核转内政部，作为三省边务会议举行时，本省对开发凉山之建议。”<sup>①</sup>

《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主张三省联合，作有计划的根本开发，以其地设置为正式县区（江应梁主张称凉山建设委员会），依民族平等原则，保护边疆少数民族的福利，大量移民入内，从事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以免这里形成特殊区域。因为江应梁曾在1941年春，冒着被掳为奴隶的危险，只身进入凉山地区，虽然没有能进入凉山的中心地带，但对大小凉山进行过实际考察。因此在《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中，他提出了高出当时人们认识的一些见解。如对于开发凉山的原则，当时各地人士“其用意不外两端：一认为凉山出产富饶，且各夷人存储白银，数量相当可观，开发不仅可取得产物土地，倘没收其白银，实为一巨大之资财；另一则认为凉山之白夷，皆历代汉人之被掳入山者，受黑夷之虐待，非止一世，而现时汉人之新被掳入者，所遭之惨酷待遇，更不忍见闻，从人道上救济此近十万被难同胞，不能不开发凉山。”江应梁先生则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提出开发凉山的三个原则，第一，平等待遇

<sup>①</sup>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弁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9月，第1页。

边胞原则，认为夷人掳掠汉人为奴隶，横加虐待，固属极不平等，极不人道之事，然我政府对待边胞，则万不能采取报复手段；第二，开发边地经济非掠夺边民财富，夷人以烟土换取白银，大量存储，固属非法行为，倘以政府立场垂涎此项财富而夺取之，将大失边民信仰；第三，提高边地生活文化水准，作为开发后的最终目的。另外江应梁提出：“凉山区域迄今仍未开发，其最大原因，即由于其地介居三省接壤之区，三省自来皆各自为政，迄无联合统筹办法，即某一省具有开发之决心与举动，往往碍于邻省之不能协同步调，致徒劳无成。故欲谋彻底开发，首须三省协同动作，川滇康三省合组凉山建设委员会。”<sup>①</sup> 1947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成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正是此建议的结果。

云南省开发凉山的方案，是同期所提方案中较好的一种（四川也提出），“虽属平易之见，但其内容，全根据实际情形立言，尚无空谈高论之失；对开发原则，亦一本政府平等待遇边胞，改进边民生活，提高边地文化之旨。”<sup>②</sup>

### （三）《腾龙边区开发方案》

《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是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三，1944年11月出版。

《腾龙边区开发方案》共有十三章内容，第一章 本区域概况（包括区域、住民、地理、国界、政治沿革）；第二章 行政（包括废除土司、废局设县、禁政、选举自治、民团警卫、行政官吏之选举与训练）；第三章 土地（实行土地整理、确定地权和土地分配）；第四章 垦殖（荒地、垦民和移垦办法）；第五章 水利；第六章 交通；第七章 企业（包括工业与矿业）；第八章 农林植物（涉及农业增产、造林和经济植物之试种）；第九章 医药卫生（提出各县成立卫生院、适中地点建立医院、组织巡回医药队、改良环境卫生）；第十章 教育（确定教育方针、师资、学校、民众教育、教材、优待）；第十一章 国防建设（调整界务及整理插花地与飞来村、建立国防军、沿边建关隘兵营碉堡及外人入境须领取护照）；第十二章 生活改进（包括习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和待

<sup>①</sup>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9月，第7~9页。

<sup>②</sup>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弁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9月，第2页。

解决问题)；第十三章 实施办法。

腾龙边区包括滇西十土司境，即南甸、陇川、干崖三宣抚司，芒市、猛卯两安抚司，盏达、遮放两副宣抚司，户撒、腊撒、猛板三长官司。民国初年，在此设梁河（统属南甸宣抚使司）、盈江（统属干崖宣抚使司和户撒长官司）、莲山（统属盏达副宣抚使司）、陇川（统属陇川宣抚使司）、瑞丽（统属猛卯安抚使司及腊撒长官司）、潞西（统属芒市安抚使司、遮放副宣抚司及猛板长官司）六个设治局（设治局是民国时期在土司统治地区为改县而设的过渡性质的机构）统治。居民有165000余人，以摆夷（今傣族）最多，其次有山头，傣傣和汉人次之，此外还有阿昌族和崩龙族（现改名为德昂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相继沦陷，西南地区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云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际交通线。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腾龙边区的芒市、遮放是滇缅公路出国的最终站。1942年，日军侵略缅甸，腾龙边区相继沦陷，人民受尽荼毒。1944年5月开始，中国军队浴血反攻，相继收复腾龙地区，随之应该从事开发建设。因此，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及时提出《腾龙边区开发方案》。

开发腾龙边区，不仅具有国防意义，而且从疆域、民族、政治、民生、经济、文化等方面看，也有开发建设的必要。中国的西南边疆，由于清朝国势衰弱，越南亡于法国，缅甸割于英国，暹罗独立（后改为泰国）。“沿边邻接英缅之区，虽曰界址已定，然不依山脉河流，不准经度纬度，犬牙相错，插花飞地互见，昔有所谓界椿迁移之说（英人常将界椿私自往中方内侧搬移，侵占中国领土）……沿边各处，漫不设防，前岁敌人（指1942年日军侵略腾龙）内侵，不费一兵一卒，长驱直入，横据全境，往事已足发人深省，近迹更堪资以警惕，此从疆域国防而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

“腾龙沿边各土司区住民，以摆夷为主要土著，其数占全境人口过半数以上，其他则山头（开钦）、傣傣、崩龙、阿昌、汉人等。……（摆夷）在今日本省各边民中，资质最为优秀，文化最为发达，集居于南部及西南沿边与緬、越、泰邻接区域，人口达数十万。此种边民，自历史言之，固早为我中华民族中之一宗支，血族文化已与我不可分，政治之直接统属于我者亦千余年。降及近世，内以政府之疏于管教，外由列强之竞相诱惑，使我诚朴之边民，渐疏于内向。日人更嗾使暹罗，改国号曰泰，倡所谓泛泰族主义曰：暹罗人民为泰族，摆夷亦泰人，其意谓，凡属摆夷，

皆应归之泰国，凡摆夷所居土地，皆应为泰国土地，边民不察，多受其感……而我沿边僰民，则因失于教化，数典忘祖，一遇敌人诱惑，难免资敌所用，此从民族团结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

“土司制度，滥觞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明，其意在羁縻。云南在元明之时，凡摆夷区域，皆不直接设官，概委土司以治，所谓三宣、六慰、二府、四州、两长官司，皆摆夷区内之土司也……（本区域之土司）虽改流设治已三十年，而土司治权，依然完整，政府政令，不能直达于民，土司中之梟黠者，拥土自豪，轻视政府官吏；其庸愚者，烟酒淫娱，待边民如奴隶，视国土作粪壤，此从行政统一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

“云南号称山国，然此仅能指内地而言，至若沿边摆夷居住区，则皆大平原也。……沿边各地汉人，恒于极度倾斜之山崖上，辟草斩荆，种植苦荞；而摆夷区则沃壤肥田，荒芜无人耕种。沿边土地，大多尚保有原始制度，所有田土，皆由土司一家掌握，形同私产，人民尽为土司一姓之农奴。以此之故，地不能尽其力，民不能得其利，而山林宝货五金矿产，亦深藏而无由开发，诚所谓国有沃壤，野有饿殍，此从救济民生，发展经济而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

“摆夷虔信佛教，自有文字语言，且其文字语言之应用极为广大普遍……其文化仍自成一类型，十余年来，政府虽积极于本境中兴学设教，然以客观环境之限制，收效殊鲜，为民族文化之普遍发扬，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sup>①</sup>

上述国防、疆域、民族、政治、民生、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就是拟制腾龙沿边开发方案的动机。

《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主张改现有各设治局为县治，然后依据地方实情，实施各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而以树立清廉政治，改进民生，发展地方生产为原则。《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且各方面互有关联，要求统筹并进，相互辅持。在方案实施的原则中指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教育文化为开发边疆之基本大业，政治建设则为开发边疆之原动力，经济事业即为推进上两项事业之燃料。”<sup>②</sup>在中国军队浴血反攻，腾龙相继收

<sup>①</sup> 江应梁：《腾龙边区开发方案》序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11月，第2~5页。

<sup>②</sup> 江应梁：《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11月，第47页。

复之时，云南省民政厅提出较全面的开发腾龙边区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及时的，“本境地当国际交通要冲，国家边防重镇，更兼平原广大，产物丰饶，开发与否，对整个国家，关系极大。”<sup>①</sup>这不仅关系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于国家民族的振兴也有重要意义。

#### （四）《思普沿边开发方案》

《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是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提出全省边疆分区开发方案第三种，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四，1944年出版。

《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有十一章，第一章 区域概况（包括沿革、住民和地理环境三部分）；第二章 行政（包括区域之调整、土司之处理和县政之健全）；第三章 土地（分为本境土地之特殊现象、酌设地政机构实行地籍整理、确定地权）；第四章 交通（包括现时交通状况、铁路、公路、航道、空运、交通机构之健全、人力与经费）；第五章 垦殖（完美之农垦区、垦民、移垦办法）；第六章 农林建设（包括适于种植之产物、倡种及生产）；第七章 企业（适于创办之企业、企业组织及管理）；第八章 矿冶及盐产；第九章 卫生建设（包括疾病及其发生原因、环境卫生、充实卫生院、普遍成立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和设立隔离医院五方面内容）；第十章 教育文化（确定教育方针、师资、学校、民众教育、教材、教会教育之管理、建立四项制度）；第十一章 方案实施办法（有方案实施之基本原则、成立执行机构、如何对待边民、如何对待工作人员、以方案执行程度为考核标准、开发经费之筹措几方面）。

思普沿边（即今天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东界越南，与猛乌、乌得连界，东南与越南猛幸接界，正南与缅甸猛岭连界，西南与缅甸景栋连界，西与缅甸大猛养连界，北与澜沧、思茅、宁洱衔接，包括车里、佛海、南峤、镇越、江城、六顺等六县及宁江设治局。人口总计180000余，以摆夷为主要土著。”<sup>②</sup>

思普沿边昔为车里宣慰司辖地，俗称“十二版纳”，有三十余猛土司区。1910年，猛遮土司刀正经谋变，由思茅厅呈请屡派大员率大军剿办，旷日持久一直没有平定，后调河口滇越铁路下段巡防营管带柯树勋率队增援。因柯树勋所部多是两广士兵，能耐瘴疾，于是平息了土司叛

<sup>①</sup> 江应梁：《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第48页。

<sup>②</sup> 江应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第11~12页。

乱。平叛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柯树勋向新成立的云南军政府上治边十二条，建议实行土流并治作为完成改流的过渡阶段。准呈以后，1913年土流并治政权——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正式成立。柯树勋被任命为第一任总局长，对思普沿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治理<sup>①</sup>。柯树勋死后，后继无人，虽经改县，但进步不大。

思普沿边位于滇南，气候温暖，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土壤肥沃，地广人稀，诸种条件优良，“惟反观本境边民，则又皆文化落后，生活原始，挣扎于疾疫死亡之中而不能自拯……是则本区之亟待开发，岂容再缓。”<sup>②</sup>

由于区内地广土沃，物产富饶，为全省其他边区所不及，此方案主张调整政治机构，整理土地，修筑铁路和公路，增辟航路，移民垦殖，发展农林，兴办电力、制茶、造纸、纺纱、樟脑、锯木、油漆、畜牧各种企业，并开发矿产，加强教育和卫生各项建设。针对思普沿边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交通和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过去思普沿边，“一阻于交通，再危于瘴疫，纵沃野千里，何能凭言开发？”交通和瘴疫是思普沿边迟迟不能开发的因素，因此方案中，注意了交通和医疗卫生两项。“倘照方案交通计划，铁路公路全线完成，则东通越南，南达泰国，西入缅甸而至印度，使十二版纳，成为国际交通之枢纽，则开发本区之价值，当远超乎常人想象之外。”<sup>③</sup>

上述《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沿边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均是由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持，根据各边区实际情况，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定方案初稿，遵照云南省政府指示，分别函送有关厅、处、局审核订正，由财政厅、建设厅和教育厅暨企业、地政、公路局等机构详细研究，分别修正。又根据卫生处签呈的补充意见，使这些方案渐臻完善，而成定稿，并报呈省政府核准后刊印的。首先，这些方案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在调查基础上（如为拟定《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于1943年10月令昭通、巧家、绥江、华坪、宁蒗、永善等地调查境

① 参考王志芬硕士论文：《柯树勋与思普沿边开发》，云南大学1999年印。

②③ 江应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序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第2、3~4页。



内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种情况以供研究），参考各有关机构意见，经过详细研究，缜密审议后，再报省政府核定。故各边区开发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其次，这是政府对各边区的开发方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 （五）《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

杨履中编写的《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卷），是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五，1946年出版。

云南省少数民族，“宗派至为复杂，其名称、人数及分布区域，向乏精确统计，施政敷教，殊多不便。”<sup>①</sup>以民族的种类而言，“据云南通志载达142种”，根据作者对1938年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的统计，云南民族的名称达150多种。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汇集各方调查表和报告，进行整理和统计，辑为册子，并分上下两篇，“上编以县局地方为纲，以宗（民）族为目，各该县局地方有若干种边民，何者最多，何者最少，依次胪列，人数及分布乡镇村落，暨所占县局地方人口之百分比，逐一记载明确。下编以宗族为纲，在全省中何者最多，何者最少，仍依次胪列，各宗族名称及人口数之下，列以分布县局地方名称及人口数目，使全省每一宗族人口总数，在全省人口百分比中占若干，何县最多，何县最少，均得一览无遗”<sup>②</sup>。

上编列出民国时期云南127属的民族分布情况，它们是昆明、呈贡、昆阳、富民、嵩明、寻甸、安宁、易门、禄丰、罗次、宜良、澄江、玉溪、通海、河西、峨山、华宁、泸西、弥勒、开远、路南、马龙、曲靖、沾益、陆良、师宗、罗平、平彝、宣威、禄劝、元谋、武定、广通、楚雄、镇南、双柏、牟定、盐兴、大姚、姚安、盐丰、永仁、祥云、弥渡、宾川、凤仪、大理、邓川、洱源、漾濞、永平、保山、云龙、昭通、永善、绥江、盐津、彝良、大关、镇雄、威信、鲁甸、巧家、文山、砚山、丘北、广南、西畴、富宁、马关、屏边、建水、蒙自、个旧、石屏、元江、曲溪、新平、金平、宁洱、思茅、墨江、六顺、澜沧、车里、佛海、南峤、江城、镇越、景谷、镇沅、顺宁、

<sup>①</sup>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民国33年度全年工作报告》，1945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16卷，第14页。

<sup>②</sup> 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叙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1~2页。

昌宁、云县、镇康、景东、缅宁、双江、蒙化、腾冲、龙陵、丽江、中甸、维西、鹤庆、剑川、兰坪、华坪、永胜109个县，龙武、沧源、宁江、耿马、泸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瑞丽、德钦、福贡、贡山、碧江、宁蒗16个设治局，河口、麻栗坡两个对汛督办署。并列出了地名、少数民族种类、人数、分布概况、占全县人口数之百分比等内容。昆明市及晋宁、江川、会泽三县，根据呈报，没有边民，就没有列入。

下编根据云南省民族人数的多少，依次排列，内容包括名称、人口数、分布概况、占全省人口之百分比等项。人数最多的是傈罗（今彝族）、依次有民家（今白族）、傣人（今傣族）、苗人、窝尼（今哈尼族）、沙人、傈僳、侬人、傈黑、濮喇、山头、土僚、摩些、佻佻、傜人、撒尼、佉宗、百子、散民、阿佻、本人、佻堕、濮曼、姆几、怒人、阿昌、阿细、巴苴、崩龙、子君、乡壇、糯比、山苏、喇鸡、白皮子、仲家、蒙古、孟武、罗婺、苦葱、侬人、佻人、两粤人、劳乌、奇地、西摸罗、四块瓦、客人、麻黑、悠乐、阿车、黑衣人、扯苏、崩子、墨槎、天保人、那密、水人、喇游、普儿、缅人、黑普、米里、黄傈、阿马、阿折、白壳、阿梭、后路卡老、大头人、阿木、阿客、阿肋、罗缅、三达、补角、垦子、龙安人、罗谋、补夏、茶蛮、密义、那路、老品、莫沙共85个民族名称。

《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中民族种类之所以为85个，是根据1940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阳壹字20985号训令，公布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拟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规定，“本册所列各民族之命名，其见于此项命名表者即从其规定，并于备考栏内注明，其未见诸此表者，亦本中央改正命名之原意加以改正，以示平等。”<sup>①</sup>故《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所载云南少数民族的名称，不再有虫兽鸟及反犬旁等（如猿人）字样，全部改为亻字旁，不再用歧视性的民族名称。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识别，将原来的150余个识别为85个。

这本册子不仅“可供行政之参考，且可作研究民族学者之重要资

<sup>①</sup> 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编例，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3页。

料。……使施政者阅览一过，即能认识全省边民之个性及分布情形，如家长之认识家人子弟，然后因材施教，因人器使，政教之推行，有所因，有所本，则一切实施靡不中肯，事半功倍，民情悦服矣。”<sup>①</sup>

上述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五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此外，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还编写了《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治理方案》、《设立中缅边区及卡拉山区特派员行政公署意见书》等，这些是没有公开出版。

总之，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作为管理云南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在民国时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并设计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民族学家参加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使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设计、开发，更具有科学性。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于抗日战争后期，对于团结云南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云南省民政厅会同财政、建设两厅及警务处联合呈报了《云南边疆概况》<sup>②</sup>。其内容分为八个部分，第一，滇缅北段未定界区概况、以往处理边事及一切有关法案（包括滇缅北段未定界区历代发生中英界务纠纷事件及其处理经过情形，北段未定界区我政令达到之范围及政治遗迹，北段未定界区域沿革、种族、物产、气候等概况）；第二，贡碧泸边区概况（包括地理环境、民族、卫生、文化、行政等）；第三，腾龙边区概况（包括地理环境、民族、交通、教育、行政等）；第四，镇沧澜边区概况（包括地理环境、种族人口、民情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物产、交通、卫生、文化教育、行政）；第五，滇缅南段未定界区概况、以往处理边事及一切有关法案；第六，思普边区概况（包括沿革、地理环境、种族人口、民情风俗语言文字、卫生、教育、行政）；第七，滇越边区概况（包括地理环境、民族人口及民情风俗习惯语言文

<sup>①</sup> 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叙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2页。

<sup>②</sup> 《云南边疆概况》，1947年8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1卷。

字、政治、河麻两区与法方相对设置之对汛及各汛官员驻地表）；第八，各种图表（包括云南边境各属面积人口警卫财政概况表、云南边境要隘关卡繁荣及应设国境警察地点一览表、云南边境现有土司姓名表、详细境界说明图、云南省边境县局卅五年（即1946年）度收支预算数额表、云南省畹町警察局编制表及组织规程、云南全省公路线图等诸多图表）。

《云南边疆概况》将云南沿边各地情况汇集在一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云南的调查

#### 一 国民政府派人滇缅北段未定界的调查

19世纪末，英国占领缅甸后，不断入侵我国云南。1910年，英国占领了片马。1926年，又发生了英国入侵江心坡事件。

江心坡原为明代里麻土司的辖地，在片马西约200余里，“因其位于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故世人称之为江心坡。……英人前占小江流域及坎底一带后，即欲经营，因不明内中真相，且以江深地险，恐为土人所乘，未敢急切从事。先派英人测量员二人入内测绘探查，土人不与往来，亦不代为引路，前后4年，尚未成功。嗣后复派缅人哥武沛携巨款购备土人所好食物品、衣服等项，散给土人，厚结坡内山官，巧言诱惑，始得渐次着手在内测量探查。”<sup>①</sup> 1926年春天，英人又“邀约坡内大小山官来密支那做会（土名戛摆），除连日饱以酒肉，优加赏赐外，并给以金银鸟枪等，拉拢其心……是年冬，英人即大举侵略，三路进兵。”当地少数民族“出其不备，伏山中袭击死英兵官瓦昔一人，士兵数人，英人大怒，除焚烧附近山寨以泄愤外，并捕去土民13人系之狱中。”<sup>②</sup>

江心坡事件发生后，当地民众以“江心坡本属汉地，世为汉人子孙，一旦受英人摧残，莫不痛恨切齿”，乃于1928年秋派代表董卡诺、张早扎二人携木刻信物来腾冲，表示江心坡是中国的领土，请中国政府派兵支援。腾冲人士组织了“滇缅界务研究会”，派人到江心坡调查，

<sup>①②</sup> 《云南边疆概况》，1947年8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1卷，第18、18~19页。

并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江心坡问题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

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了“滇缅界务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1929年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委派尹明德先生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到滇缅北段未定界进行调查。1930年，尹明德先生“赴滇省遴选测绘人员及胆识兼优、熟悉边情之士，先后组成六组，乔装商贩，分头密往北段未定界茶山、浪速、球夷、坎底、江心坡、野人山各地，缜密探查。”<sup>①</sup> 历经11个月，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和《云南北界勘察记》等。绘制了《滇缅界务北段地图》，提出了中缅划界的“尹明德建议线”，并为国民政府所采纳<sup>②</sup>。

## 二 国民政府派人调查滇缅南段未定界的调查

英国在对中缅北段未定界进行侵略的同时，对中缅南段未定界（阿佤山地区）加紧资源的掠夺，并侵占我国边境领土。1934年，英国武装侵占班洪、班老地区。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阿佤山17个佤族部落首领联名发表了《告祖国同胞书》，呼吁中央政府及云南省政府当局，支援阿佤山人民的抗英斗争，重视边疆问题。

云南旅京同乡成立了滇缅界务促进会、后援会等组织，呼吁政府重视边政，解决界务，并派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呈述边境危机，督促政府采取行动。他们于1934年3月21日分赴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部等处请愿，为声援班洪人民抗英斗争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班洪一隅，实为滇省南段未定界务全部关键之所系，与南段界务悬案，片马、江心坡问题，亦有连带关系，同为滇、康、川、藏国防之门户，岂能拱手让人。敝会同乡人等，籍隶云南，默察英人野心之叵测，深痛我国边土之屡失，本匹夫有责之议，抱不失寸土之心，誓死反对英帝国主义之侵略。”并提出治标和治本的两策，“惟有恳请政府向英方严重交涉，亟应先责令英人停止军事行动，撤退侵入滇兵队，以免发生重大纠纷，此为当前治标之策。至于治本之永久解决方法，端在划清国界，仍请由政府与英方交涉，两方各派大员，率领专门人才，

① 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1931年9月，第1页。

② 谢本书：《片马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二集，云南专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克期上界，将滇缅沿边各界，重行勘划，确定界标。至于划界原则，自应南段与北段未定界同时解决……”同时呼吁“惟兹事体重大，断非云南一省之力所能及，惟望中央政府毅力主持于上，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协力声援，庶我国土可保，纠纷永息。”<sup>①</sup>

为此，1934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调查专员周光倬对滇缅南段未定界开展调查，他到了滇西的班洪、孟定、猛角、猛董、澜沧等地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实地考察，归来后写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于1935年铅印成册。

1935年，中英决定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成立了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曾留学英国的民族学家梁宇皋被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中国主任委员，尹明德为中国委员，他们在考察中，对滇西边区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情况都有所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事后，尹明德著有《滇缅南界勘察记》<sup>②</sup>，梁宇皋拟定《为招募海外侨胞资金垦殖云南边地意见及计划书》和《解决滇缅界务悬案暨改进滇西边政方略》<sup>③</sup>。

一些民族学家，如凌纯声、芮逸夫和方国瑜等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对滇缅南段未定界内的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1935年8月，方国瑜应尹明德之邀，作为中国委员随员，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工作。他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提供历史资料、查阅文献和作实地调查访问。为做好边界的勘察工作，他先到昆明查阅政府档案1个月。1935年10月30日，他随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的中国委员从昆明出发，经禄丰，先后到孟定、班洪、岗猛、耿马、猛角、猛董、保山等地，共8个月时间。方国瑜在联络未定界地区内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和进行边地实地调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工作得到了当地爱国人士的支持，他们帮助联络班洪、班老等地土司、头人，并把这些土司、头人请到委员会作土地归属的证人，用事实说明他们所居住之地是中国领土。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向当地民族宣传、讲解他们是中国人，所居之地是中国领土的道理。每到一地，他就对该地的历史地理状况、民族风情、习俗等作考察，这使

①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② 曹明煌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云南大学2003年印，第25页。

③ 梁宇皋：《为招募海外侨胞资金垦殖云南边地意见及计划书》和《解决滇缅界务悬案暨改进滇西边政方略》，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2045卷。

他对边地的史地和民族情况有了实际了解<sup>①</sup>。后来，他整理旅行边境8个月的记录，写出了《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及《界务交涉纪要》。这次滇西考察，使方国瑜先生开始重视实地调查。正如他在《滇西边区考察记》自序中所说：“及至边区，始知前所知识，率多谬误，研究边疆问题之难如此。”<sup>②</sup>

### 三 国民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国民政府还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零星组织过对云南的调查。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派人到云南农村的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是全国范围的，委员会在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4省调查后，转向广西和云南。派了“鲁君、王杰二君到云南去作一个大概的考察”。其“调查方法，取抽样调查，以村为单位，就云南如滇中、滇东、滇南，各不同之区域中，选择一二县份为代表县份；再就县中，以其经济环境关系，选择六个代表村，其中关于土地分配、农田使用及借贷关系，则求之于农家，挨户调查。”报告所依据材料，除自然环境概况和政治经济概况，是根据在云南搜集之已成材料外，其土地分配、农田使用及借贷关系等，则根据云南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等五县概况调查。后来写成的调查报告《云南省农村调查》，于1935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sup>③</sup>。

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联合资助，中央大学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由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教授和奥籍费师孟教授牵头，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的严德一、王德基及国防会滇籍人士张凤歧等参加了考察团。入滇后，至思普沿边调查，游历考察8个月，归来后团体写出了调查报告。严德一另写了《车里、孟连一带旧十二版纳内之民情风土农事》，发表在1940年的《地理学报》上<sup>④</sup>。

1938年，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目的是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参加考察的大部分是教授和学者，

① 方福祺：《方国瑜传》，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9页。

②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自序，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1943年版，第1～2页。

③ 彭学沛：《云南省农村调查》序，商务印书馆版1935年版。

④ 曹明煌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云南大学2003年印，第24～25页。

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人参加。这虽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考察团，但一到边疆，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就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结果，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sup>①</sup>。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之一的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记载了当地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的风俗<sup>②</sup>。

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分为教育、社会、自然三组，到昆明后分为两队，即迤西队和迤南队。迤西队考察滇缅边境的腾冲、南坎一带，然后经贵阳抵桂林；迤南队沿滇越铁路至蒙自、石屏、河口，到安南等地考察，然后经马关、文山、富宁、百色抵桂林。两队会合后，再往瑶族聚居的山区考察，足迹遍及西南，历时8个月，整理出数十万字的报告<sup>③</sup>。

1940年末，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后方与盟军联结的惟一陆上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因遭到日军轰炸而导致物资运输有中断的危险，国民政府于是准备修建中印公路，以另辟至印度洋出海口的通道。交通部提出由西昌经中甸、德钦至印度萨地亚的路线。该线在德钦分南、北两线，由袁梦鸿、陈思诚任正、副队长，于1941年8月率队进行勘测，前面参加过中央大学云南地理考察团的严德一也是勘测成员之一（后因为道路艰险，施工困难，沿线人口稀少而放弃修建这条通道）。陈思诚在事后写出《中印通路勘察记》<sup>④</sup>，严德一写出《中印通路经济地理调查》<sup>⑤</sup>。

此外，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滇西调查后写成《中甸调查报告》，于1945年出版。

上述由政府派出人员或考察团对云南的调查和勘察，大都以政治目的为主，涉及边界问题、边疆教育、地理考察及战时交通线等，但调查成果中大部分有关于云南少数民族情况的记录。

① 江应梁：《民族学在云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④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记载，卷38、39，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⑤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记载，卷40，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本章小结。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总体上看，有以下4个特点：

首先，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是西南几省中开始较早的省份，调查次数最多，种类最多。仅国民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对云南少数民族开展的调查就有10次，分为5类，加上政府的边政机构和政府派出考察团及人员进行的调查，调查达数十次之多。此外，对云南傣族的调查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

其次，研究成果最多。云南省边政机关成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积极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撰写了《云南边疆概况》、《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西南边胞教育建议刍议》、《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其治理方案》、《政务督导员调查报告》、《设立中缅边区及卡拉山区特派员行政公署意见书》等成果。

政府派出考察团及人员的调查大都与中国外交有关，尹明德先生写出了《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云南北界勘察记》和《滇缅南界勘察记》等。周光倬写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方国瑜先生写出了《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及《界务交涉纪要》。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等。

再次，影响巨大。这些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是当时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为国民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他们提出的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是根据云南实际拟定的，对于云南边疆地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成果向世界介绍了云南，是云南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最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一个边政机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工作，对于云南边疆的稳定，各民族团结，边疆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

贵州省东与湖南毗连，南部及东南与广西毗邻，西南及西部与云南连界，西北、北部及东北与四川接壤。全省面积176470平方公里。1937年，共设81个县。<sup>①</sup>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分属苗瑶、藏缅、壮侗语族。民国时期，对于贵州少数民族的名称，记载不一。贵州省民政厅编写的《贵州民政概况》记载贵州民族有71个<sup>②</sup>，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族社会概况》认为贵州少数民族达82个<sup>③</sup>。另据贵州省教育厅的调查统计，民族名称达123个<sup>④</sup>。作者对1934年贵州上报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进行统计，贵州民族的名称达90多个，说明了当时民族名称的繁杂。

当时贵州81个县中，有60个县有少数民族分布，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县占了全省的74%。贵州民族的分布，以东、南两路为最多，西路次之，北部最少。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数，没有明确的统计，“据贵州省之估计，苗夷族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强”<sup>⑤</sup>，依据贵州省民政厅1939年统计，少数民族人口有170余万<sup>⑥</sup>。另据贵州省政府夷苗政教设施概况记载“约占本省人口六分之一，计170万人”<sup>⑦</sup>。但是，1947年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统计，贵州全省总数有1228659人，而当时贵州全省人口总数是10489747人，少数民族占了全省人口的11.7%<sup>⑧</sup>。

①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A2页、C9页。

② 贵州省民政厅：《贵州民政概况》，1944年10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275卷。

③⑤ 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④ 《贵州省边民名称统计表》，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1445卷。

⑥ 《贵州省各县苗夷人口统计表》，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1445卷。

⑦ 《贵州省政府夷苗政教设施概况》，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7096卷，第1页。

⑧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1947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2卷，第6~8页。

为了解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国民政府先后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了多次调查。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仍分为三类：一是国民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自上而下开展的调查；二是政府的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人员进行的调查。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

从1929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了8次调查，调查可分为四类。

### 一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这类调查与云南的调查相同，主要有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

#### （一）西南苗夷民族调查

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发布第112号咨文下令对西南边疆各省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并由蒙藏委员会制定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发往西南各省。《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的内容有：民族种类、户籍、人口、语言、教育情况、生活习尚及备考<sup>①</sup>等项。见附表1。

贵州省政府非常重视此事，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下发各县政府，要求认真填报。此次调查从1934年11月开始，贵州省的息烽、台拱、都江、罗甸、三穗、石阡、铜仁、施秉、瓮安、桐梓、三合、安顺、威宁、永从、八寨、榕江、镇宁、平越、贵阳、普安、炉山、修文、大塘、清镇、盘县、关岭、锦屏、册亨、水城、都匀、下江、安龙、黎平、江口、开阳、织金、麻江、松桃、独山、丹江、黔西、剑河、黄平、贵定、广顺、镇远、贞丰、大定、兴仁、龙里、荔波、怀仁、兴义等53个县上报了调查表到民政厅<sup>②</sup>。但是，1935年9月，贵州省政府上报给蒙藏委员会的《苗夷民族调查表》只有23个县，它们是贵阳、修文、瓮安、炉山、镇宁、施秉、安顺、大塘、三穗、息烽、威宁、桐梓、三合、台拱、八寨、罗甸、平越、石阡、榕江、清镇、铜

<sup>①</sup>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112号咨文》，1934年10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2872卷，第1页。

<sup>②</sup> 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2872卷，第7~268页。

仁、都江、普安。<sup>①</sup>

## （二）西南边区民族调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动员全民抗战，稳定地方秩序，促进民众团结，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内政部1938年5月的密咨<sup>②</sup>要求西南各省开展西南边区民族调查。同时，内政部下发了《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通飭西南各省对所属各民族情况迅速调查上报。贵州是受调查的一个省份，要求贵州“所属苗夷等族聚居各县，从速调查填报汇转，以重要政……”<sup>③</sup>《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有：民族种类、居住区域、人口数目（男、女）、壮丁数目、生活习惯、过去开化工作情形及备考等内容。见附表2。

贵州省民政厅于1938年6月，下达密令，“限文到十日内，依表列各项，逐一详查填列……以凭核汇”<sup>④</sup>。由于是限时填报，贵州只有48个县报送了调查表。它们是息烽、怀仁、习水、桐梓、黄平、麻江、清镇、青溪、三穗、普定、织金、贞丰、长寨、兴仁、都江、贵定、紫云、台拱、荔波、平越、丹江、黎平、剑河、独山、沿河、定番、安南、水城、三台、罗甸、松桃、八寨、永从、铜仁、天柱、广顺、普安、平舟、盘县、镇远、都匀、江口、安龙、榕江、安顺、关岭、平坝、龙里县<sup>⑤</sup>。

## 二 国民政府对贵州土司调查

### （一）贵州省现有土司调查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成立后，认为“土司制度，不特不合现时行政组织，亦且违反现代潮流，更以各省土司，坐享厚糈，剥削人民，迭据人民呈控土司，欺压平民案件，不一而足”，于是“对于改土归流政策，亟应力求实行”<sup>⑥</sup>。按照《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县为自治

① 《贵州省政府咨送贵阳等23个县〈苗夷民族调查表〉》，1935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3207卷。

② 《云南省政府秘一民字第174号密令》，1938年6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6~7页。

③ 《国民政府内政部渝民字第1036号密咨》，1938年5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38卷，第2页。

④ 《贵州省民政厅民治字第858号密令》，1938年6月1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38卷，第4页。

⑤ 《西南边区（贵州部分）民族调查表》，《贵州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第15~36页。

⑥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1页。

单位，“依照现行制度，各省省政府以下除县市政府外，本不容有他种特殊行政组织。惟边远省份或以种族居处太杂，或因土地开发较迟，所有特殊区划及特殊制度不得不暂时存在自属事实问题。兹为编订全国行政区划表起见……”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现有土司调查表”及“现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sup>①</sup>，咨请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康、湖南、四川、新疆各省政府<sup>②</sup>进行调查，贵州是其中受调查的一个省份。

《现有土司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土司名称、所在地、管辖境界、何时设置、隶属何处、可否改设县治、现在土官姓名、何时委任等项<sup>③</sup>。见附表3。

贵州土司在清末已大规模改土归流，“自民国以来，均经改土归流，从前土司制度，早已无形消灭。奉发表式，无从查填”<sup>④</sup>。故贵州没有上报调查表。

#### （二）已改土归流土司调查

1939年1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渝日字第180号公函称：“查边省土司原为前清遗制，民国以来，多已改土归流，旧有土司头人，亦由地方政府酌界新职，本会现为办公上参考起见”，拟请贵州省政府“将所辖境内已改土归流各土司之姓名、所在县治、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列单见示，其有尚未明令改流者，亦盼一并查复，籍便查考。”<sup>⑤</sup>贵州主要填报已改土归流各土司调查表。

《改土归流土司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住址、备考等项。见附表13。贵州省民政厅要求：“于文到十日内填报来府，以凭汇转。”<sup>⑥</sup>

①③ 《内政部民字第1488号咨文》，1929年12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2卷，第199、201页。

②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1页。

④ 《贵州省民政厅民字第517号呈文》，1931年3月24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9卷，第5页。

⑤ 《蒙藏委员会渝日字第180号公函》，1939年1月28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0卷，第3页。

⑥ 《贵州省民政厅民三字第231号训令》，1939年3月2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0卷，第6页。

按照贵州省民政厅的要求，开阳、黄平、兴仁、盘县、黔西、施秉、罗甸、三合、丹江、黎平、册亨、松桃、沿河、织金、朗岱等15个县，上报了调查表。这次调查到1939年6月结束。根据调查，贵州已改流及未改流的土司还有51位<sup>①</sup>。见附表14。

### 三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 （一）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

1947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给贵州省政府的指令：“和平建国纲领为改组后国民政府之施政准绳，已于国民政府施政方针第一条明白规定。上项纲领政治第六条第二项所定‘边疆少数民族所在之省县应以各该民族人口之比例，确定其实行选举之省县参议员名额’一节，亟应切实实施。关于贵省少数民族概数，前经电请贵省政府报部有案，惟时经多日不免有所变动。本部兹为明瞭边省少数民族详细数字，以便根据上项规定，修改现行省县参议会组织及选举条例起见，特再制定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式一种，随电检送务请迅即查填报部，以便汇办……”<sup>②</sup>

《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包括：县（市）、少数民族名称、人口数、合计、全县（市）人口数、少数民族占全县（市）人口百分比、备考等项内容。见附表9。

贵州省政府根据历次少数民族调查的资料，将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按调查表要求汇总，进行了填报。

#### （二）边地土著人口调查

同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进行“边地土著人口调查”。在内政部公函中说“扶植国内各少数民族之繁荣发展，为中央一贯政策。本部兹为明瞭各边地土著民族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状况，俾供施政参考起见，经拟订‘省县各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表式’一种，……连同填表须知一份，函请查照转饬各土著民族住居县份，遵照查填，并希于文到一个月内，汇送过部，以便办理”。

《省县各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表》包括：宗（民）族别、居

<sup>①</sup> 参考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0卷，第7~142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7522号文》，1947年7月9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2卷，第3页。

住区域、人口数（合计、男、女）、壮丁数、各民族特质异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教育程度、语言文字）及备注<sup>①</sup>等内容。见附表15。

填表须知：（1）本表填写以各县土著民族人口为限，凡无土著民族居住县份，即不填报，但须由省政府汇案说明。（2）“宗（民）族别”栏应分别填注各族类别名称，应详细记载。（3）“居住区域”栏应填注前项民族居住之县、乡、保或村街。（4）“人口数”栏应填注各该民族之男女数及合计数。（5）“壮丁数”栏填注各该民族自18~45岁之男丁数。（6）“各民族特质异同”栏应将各民族之衣食住行婚丧礼教以及语言知识职业等详细填注或作比较。（7）调查年月必须填入，俾便分期统计比较。

对于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贵州省民政厅对各县市政府、雷山设治局下发训令，“于文到十日内，分别详填二份具报，以凭汇转”<sup>②</sup>。按照要求，望谟、修文、盘县、纳雍、安龙、剑河、平坝、赫章、关岭、大定、铜仁、锦屏、榕江、镇宁、松桃、炉山、镇远等县上报了调查表。这次调查从1947年9月开始，到1948年2月结束。

#### 四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这类调查有1947年的“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和1948年的“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 （一）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

1947年8月，国民政府内政部要求对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进行调查。“查我国幅员辽阔，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情形复杂，多未能切实依法举办户口查记，以致此项户口数字恒付阙。本部为明瞭上项人口状况，以便汇编全国户口统计起见，特制订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式，……希于文到一月内，依式查填专案报部”，并附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式一份。

《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包括：族名、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8158号公函》，1947年7月3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3卷，第1~2页。

<sup>②</sup> 《贵州省民政厅（卅六）民四字第5807号训令》，1947年9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3卷，第4页。

人数（共计数和男、女数）、分布地区、生活习惯、语文（语言和文字）、宗教、备考等<sup>①</sup>项内容。见附表10。

贵州省民政厅根据内政部的指令，要求“本省各地其人民生活习惯特殊者，亟应分别照表查填，于文到十日内，依式查填具报”<sup>②</sup>。贵州省锦屏、赫章、大定、龙里、贵阳、平坝、兴仁、罗甸、修文、普安、息烽、关岭、纳雍、安龙、铜仁、榕江、镇宁、松桃、雷山设治局、炉山、三穗、黎平、镇远、三都、威宁等县上报了调查表。

但到1948年5月，贵州省都没有将收集到的表上报到内政部，于是内政部发代电令：“前经本部制订表式，于三十六年（这里指民国36年，即1947年）八月十六日以人二字第271号代电，送请查照办理在案，兹以为时已久，贵省辖境内有无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迄今未准查复，用再电请查案核办……”<sup>③</sup>贵州省民政厅在给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回电中说：“本省边疆民族生活习惯近年多已同化，能习汉语文字，相互通婚，故仅据少数县份调查填报。准电前由，相应将已报之锦屏等28县市（局）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调查表汇订成册，随电送请查照为荷。”<sup>④</sup>

## （二）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1948年8月，重庆绥靖公署“为明瞭川康滇黔边区各民族人口、生活、教育、经济、出产等情形起见，特制定调查表式一种……希于文到三个月内查填具报”，同时下发了“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令川康滇黔各省进行调查。

《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的内容有：族别、人口（男女）、面积、教育程度（小学、中学、专科）、经济状况（主副食物、通货情况、特产物资、输入主要物资）、武力概况（枪种、弹药）、归化程度等<sup>⑤</sup>项

① 《国民政府内政部人二字第271号代电令》，1947年8月16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6卷，第1~2页。

② 《贵州省民政厅民四字第5966号训令》，1947年9月26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6卷，第3页。

③ 《国民政府内政部人二字第474号辰俭代电令》，1948年5月28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6卷，第107页。

④ 《贵州省民政厅民四字第3349号代电》，1948年6月1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6卷，第108页。

⑤ 《重庆绥靖公署政四字第252号代电》，1948年8月26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7卷，第2页。



内容。见附表11。

贵州省民政厅令贵阳市、各县、雷山设治局，要求他们“遵照于文到一个月内，依式查填，具二份呈报，以凭汇转。”<sup>①</sup>这次调查贵州全省都进行了填报。

上述8次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是由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官方民族调查。对于贵州民族名称、分布地区、人口数目、教育情况、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民族源流及土司情况等也都做了调查。

## 第二节 贵州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

### 一 贵州省边政机构的设立

贵州省组织了一些边政机构，如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和“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等，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调查研究。

#### （一）贵州省民俗（民族）研究会的设立

1938年6月，贵州省教育厅以“调查研究省内各地民俗与方言，便利各种教育及文化之实施为宗旨”<sup>②</sup>，特设立民俗研究会（有的档案称民族研究会）。其任务是：“1. 调查省内各地民俗及方言；2. 研究省内各地民俗及方言；3. 拟定改良习俗及讲习方言之方案；4. 编辑关于民俗方言之调查研究之报告。”<sup>③</sup>

其组织章程规定：“本会设委员若干人，由教育厅延请或指派熟悉或热心研究各地民俗方言之人士充任之。设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各一人，由教育厅就委员中指定之，处理本会一切事务。设干事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办理日常会务。”<sup>④</sup>贵州省教育厅聘请或指派郭一岑、傅启学等22人为研究会委员，并指定郭一岑为主任委员，傅启学为副主任委员<sup>⑤</sup>。该会分为体质、心理、语言、历史及社会五个组<sup>⑥</sup>，进行调查研究。

① 《贵州省民政厅（卅七）民四字第5196号代电》，1948年9月13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7卷，第3页。

②⑤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

③ 《贵州省民俗研究会简章》，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290卷，第48页。

④⑥ 《贵州省政府夷苗政教设施概况》，1938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7096卷，第19、18页。

1939年初，民俗研究会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搜集各县的苗族、彝族等民族的民俗资料。研究者分赴各地搜集资料，经过前后半年时间，汇齐后送交民俗研究会<sup>①</sup>。此外，贵州民俗研究会还进行了苗区歌谣的调查，苗夷方言的收集，苗胞儿童的各种测验及乡土教材的编辑等。但到1945年研究成果都未见披露<sup>②</sup>。

## （二）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建立

1945年10月，贵州省政府“为适应环境，促进边胞文化，特于省政府下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聘派专人负责，研究改进，出版刊物”<sup>③</sup>。研究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当时省政府主席杨森兼任；设常务委员3~5人，委员若干人，均由省主席就省级机关高级人员中指任。研究会下设调查、出版、研究3个组及秘书室。研究组分史地、教育、政经、礼俗、卫生等；调查组主要负责边疆问题的调查研究；出版组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刊物及《边疆文化丛书》。

边胞文化研究会“以开发边疆，改进边胞习俗，提高生活水准、文化水准为宗旨”<sup>④</sup>。提出“确保自由权利，发扬平等精神，巩固统一组织，发挥团结力量，造成尚同风气，促进共同进化”六大纲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张改良服装、统一语言及各民族通婚三大政策<sup>⑤</sup>。

1945年，边胞文化研究会一成立就制定了以后三年的工作重点：“第一年中心工作：1. 唤起国人注重边陲；2. 促进边胞共同进化；3. 确认国族一元理论；4. 倡导中国化运动；5. 发扬平等精神；6. 加强边地工作。第二年注重边区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第三年：1. 加强化导工作；2. 杜绝民族自决、高度自治之荒谬言论；3. 完成建设工作，同时对言语之统一，服装之改良，通婚之鼓励，亦列为经常中心工作之一，随时宣传劝导……”<sup>⑥</sup>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②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③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

④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⑤ 白敦厚：《谈黔省边胞文化》，《边铎月刊》第10、11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⑥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

## 二 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成果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20世纪40年代贵州重要的边政机构，其工作主要有研究、宣传和改革三方面。

研究首重资料，故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比较重视资料搜集，除由贵州省政府令饬各县征集文物、史籍、图片、填报调查概况外，并派员赴边胞聚居区实地考察，收购有价值的资料，以供研究参考。同时聘有通信研究员，远驻于我国边疆地区，搜究边疆文物制度，再与贵州省做比较研究，如当时马鸿瑞被派驻承德、赵捷民派驻北平等。

宣传方面首先发行刊物，边胞文化研究会发行有《边铎旬刊》和《边铎月刊》等刊物，并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边铎旬刊》于1945年10月10日开始发行，到1948年时共发行85期；《边铎月刊》于1946年3月创刊，到1948年发行到第二卷。这两个刊物省内外的文化机关和团体均有寄赠，互相交流。1945年1月，刊印有《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颁发各县以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1947年7月，又印有《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为使宣传迅速而有成效，曾先后派员到边地实地访问宣传，如1945年冬，李寰、陈貽荪及梁聚五等赴石头寨观礼，并宣传访问，1946年10月，又派本会研究员李祥金、张问童两人赴雷山、炉山等县考察访问等。

改革方面主要是与各级政府会商联络，制定各种改良实施办法，通饬实行，限期完成。这是政府强制实行同化。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是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由白敦厚拟定《贵州省各县市边胞概况调查大纲》，大纲要求调查报告分上下篇，上篇为一般状况，下篇为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此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内容多与大纲相同。目前看到发表在《边铎月刊》上的调查报告，主要有《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这些调查资料是实地调查所得，成为人们了解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为我们保留了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的宝贵史料。

### （一）《镇宁县边胞概况》

镇宁县（今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部，为滇、黔孔道，北连普定，西接关岭、东邻安顺、南界紫云。少数民族占了

全县人口的80%，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边胞有“夷、苗、戎（原文如此，作者注）三种，苗胞较少，有黑苗花苗两种，零星散居，不上两千人；戎胞尤少，近西部之比工上、下两寨，人口约三四百左右，夷胞最多，类分‘补以’、‘补农’、‘补开方’（译音）三种，人口约八万五千人。”

调查报告分各族一般状况（包括地理、经济、教育、卫生等一般情况）、各族特殊状况（包括各族的历史、组织、礼俗、生活等内容）、结论三部分<sup>①</sup>。

报告对各族的由来有初步的识别，指出：“本县边胞，除戎、苗为当地土著外，夷胞均于明洪武时迁徙而来”，根据本县一些夷胞家谱记载，这些“边胞确由江西移来，而且实系明时征南军之后裔也”。在结论部分，对于边胞问题解决，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成立边务机构，作为指导边民政治之最高机构：此组织无论在中央在省都应设有，并确定政治全盘计划，按步实施。

二是澄清吏治，严惩土劣。

三是改善生活。本来边民素好劳勤，惟其生产方法及工具，非常幼稚，产量最低，兼受一般巨富高利贷之剥削，乃边民社会穷困之主因。故一面应当改革生产方法，一面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另一面成立农村贷款社，使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

四是促进教育：在边地，应由省政府拨款多多创设省立小学，普遍分配于边疆各地，进而在边民集中之地，设立边疆师范，以培养师资人才。

五是改善交通：交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极大之关系，故开辟边区的公路，实为不可缓之要务。

六是提高政治认识，对于各地边胞人才，应当随时调查，量才录用，使其对服务方面，深感兴趣，并边情亦因此能上达。这些建议，中肯而有远见。

## （二）《望谟县边胞概况》

望谟县系民国29年（即1940年）春，奉命划拨贞丰、关岭、紫云、罗甸4县边区之地，新设的县治。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东界罗甸，西毗册亨，南邻广西省，北与关岭、紫云县接壤。本县民族可分汉、夷、苗三

<sup>①</sup> 《镇宁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

类，汉人多居高山地带，一般称之为客家。夷族人口最多，约占90%以上，分布较广，平原地带、重要城镇、场集所在地等，是他们的聚居地。苗胞分布在县境僻远之地，有白苗、黑苗、老苗、孛拉子、红苗等。

调查报告共有两大部分，一是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卫生（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几方面内容。二是夷族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生活（衣、食、住、行及嗜好）四方面内容<sup>①</sup>。

调查报告是对望谟县边胞情况的全面介绍，对各民族分布情况调查十分仔细，详细介绍了各乡镇民族情况及户数。本文与其他调查报告不同的是在教育一项，从学校、私塾、社会和宗教教育几方面进行介绍，尤其是对本县天主教堂教育情况的介绍，是其特点。

### （三）《荔波县边胞概况》

荔波位于贵州省南部，毗连桂边，东北连三都、榕江，东南倚下江及广西宜北，南邻广西思恩，西接广西南丹，北界独山。本县民族有汉、夷、水、苗、瑶五种，合计八万四千人，夷族、水家占人口的50%，苗族和瑶族占人口的30%，其余为汉族。

《荔波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关于全县一般状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税捐、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为各族特殊状况，分为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能力）、礼俗（言语、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和娱乐）、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几部分<sup>②</sup>。

此调查报告是对荔波县边胞情况的较全面介绍，与其他调查报告不同的是讲到了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由于汉夷同化，荔波县存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其租佃制度有三种：

① 《望谟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4期，1946年7月1日。

② 《荔波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1日。

一是为土肥径捷之田，工少效多，则佃主与佃户平均分花。

二是为土瘠丘多，此事半功倍之田，则须由佃主帮助佃户耕牛一只或二只，以资耕耘，分花亦可各半。

三是为开荒，荒芜之田，经佃户开拓，佃主亦得帮助佃户耕牛一双或二双，及粮食七八秤，并给予佃户三年收益。租制则于每年初议定租金数目，年终给租，其收获如何，地主概不过问。从租佃制度来看，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并不严重。本县原来为蒙、皮、雷三土司辖地，清末改土归流，改为州县制。民国成立后，废州设县，以县长综理县政。

#### （四）《平越县边胞概况》

平越县（今贵州福泉市）位于贵阳东南，东接黄平、炉山两县，南与麻江县，西与开阳、贵定两县，北与瓮安接界。主要有汉族和苗族，其中苗族占全县人口数的18%强，分布于各乡镇。苗族有花苗和黑苗两种，以所穿衣服为区别，语言亦略有差异。苗族系贵州土著，花苗原籍平越，黑苗多由麻江、黄平两县移入。

《平越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务、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主要记述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和丧葬）、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sup>①</sup>。

这篇调查报告与《荔波县边胞概况》的内容大体相同，由于平越县只有苗族同胞，所以其下篇只介绍苗族状况。

#### （五）《威宁县边胞概况》

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插入滇省，西南北三方与云南省的昭通、鲁甸、会泽、宣威、彝良等县接壤，东北和东南与贵州省之赫章、水城连界。威宁原为乌蛮居住地，其民族有汉、夷、回、苗4个，汉族众多，占全县人口数的60%，分布遍于全县；次则夷族，约占全县人口数的20%，除附城一二个乡外，夷族几乎遍及各乡。威宁夷族有土目黑夷、白夷和仲家等类，土目为部落时代之酋长，势力厚而领土广，世代相袭。若论族众，当称黑夷，至于白夷和仲家，则为土目黑夷之佃户，多属贫

<sup>①</sup> 《平越县边胞概况》，《边锋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1日。

弱。回族惟西南四五个乡为多，占全县人口数的10%左右。苗族人数较少，只占全县人口数的5%，依据其服饰分为青苗、大花苗和小花苗，散处本县西北部。

《威宁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古迹）、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是关于本县民族的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和人物）、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体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sup>①</sup>。

与上面两篇调查报告不同之处：一是在组织一栏，增加了人物一项，介绍本县所谓“为国宣劳”和对教育有贡献的几位人物，如对教育有功者缪良玉、孙家祥等均有介绍。二是在语文一栏，介绍了威宁苗族文字的由来。苗族文字历史较浅，创造只有40年。苗文的创造者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来威宁石门坎传教，发现苗族语言难通，乃采用外国字母26个，仿用拼音，联成字句，以教苗族同胞。三是在礼俗下面，增加了节令和体貌两项。尤其对少数民族体貌的介绍，如苗族体质较弱而黄，个头稍矮；夷族鼻高而面黑；回族体强而剽悍等，这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观察和描述。

#### （六）《施秉县边胞概况》

施秉县位于贵州东部，西邻黄平，北界石阡、余庆，南接台江，东连镇远。本县主要有汉族和苗族，苗族占全县人口的60%。其分布县城以北多汉少苗，县城以南多苗少汉。本县苗族分为河边苗和高坡苗。

《施秉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三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

<sup>①</sup> 《威宁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10~11期合刊，1946年12月1日。

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礼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等。<sup>①</sup>

与《威宁县边胞概况》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在礼俗一栏，《威宁县边胞概况》记载的是苗族体貌，而《施秉县边胞概况》是礼貌。

上述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和施秉6县边胞概况是由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分别选择黔西、黔西南、黔东南、黔西北和黔东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派专门人员赴上述地区实地考察，收购有价值之资料，进行研究，汇编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其研究方法，纯持客观态度，参酌实际资料，用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等方式研究”<sup>②</sup>。这些调查报告对于了解各民族状况，制定边疆建设计划做了准备。

#### （七）《台江边胞生活概述》

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文章还有王嗣鸿写的《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发表在《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

台江位于贵州省东南，东界剑河，南邻雷山，西接炉山，北以清水江与施秉、黄平两县为界。台江县边胞占了全县人口的90%，皆为黑苗，细可分为五类（以县内边胞的习惯分）：即方朗（意为下域人）、方纠（意为上域人）、方西（意为西方人）、方排（意为高坡人）和方你（实为水家）。

《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共有台江地势及边胞类别与其分布概况、经济生活略述、一般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三部分）、一般礼俗（有婚姻和丧葬）、风俗习惯（有过年、敬桥、登高、划龙船、吃新、抬龙、抬猪、吃牯脏、摇马郎等风俗）、迷信观念、特殊技能与特殊习性（包括绣花、织布洗染三种技能，有健康、勤苦、朴实、重情谊、重信用、互助合作等习性）、英雄崇拜、对汉人与政府之印象及结论<sup>③</sup>等十部分。

文章对台江县边胞好的风俗习尚，如辛勤耐劳、节约单纯、忠诚守信等美德，及简单合理之婚丧仪式，不受礼俗之严格束缚，不失人生之本来面目等良好风俗的赞扬，对他们迷信观念的批评，对边胞英雄崇拜的正确分析，都是实事求是，难能可贵的。

① 《施秉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12期，1947年1月1日。

②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

③ 王嗣鸿：《台江边胞生活概述》，《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1日。



## (八) 《车寨社区调查》

车寨地属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位于县城以北，是侗族聚居区。全寨合计170余户，人口1400余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在此创立村寨教育实验区，实验村寨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收容侗家子弟入学。车寨既为村寨教育实验区的地址，1946年3月，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研究工作中列入了“车寨社区调查”一项，经过调查写出了《车寨社区调查》报告。

《车寨社区调查》分为前言（简述了车寨设立村寨教育实验区的经过）、车寨释名（车寨的命名，意为使用水车的寨子）、历史沿革（车寨原为苗民的住地，其后侗族迁来，侗族勤敏，为苗民所不及，苗人遂被迫移住山坡，侗人反客为主，车寨成为侗族聚居区）、地理背景、社会概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寨风民俗（银毫的币制、女系财产继承制、忧郁的歌堂、斗牛的经济意义）、同化关系（向来侗汉关系协调融合）等七部分。<sup>①</sup>

这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了记录。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贵州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机关，以宣传国民政府的国族一元理论为宗旨，以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治为目的。

边胞文化研究会做了一些工作，到1948年，在“边胞学生数字之增加，边胞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之遴选，（贵州）省训团优秀边胞青年训练之挑选，省政府边胞参政之奖拔，不良习俗之改革……边胞妇女职业训练班之成立”<sup>②</sup>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颇多，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是典型的民族学、社会学的文章，如《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是民族学的调查报告；梁瓯第的《车寨社区调查》，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完整记录。这些成果成为人们了解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

① 梁瓯第：《车寨社区调查》，《边铎月刊》第5～6期合刊，1946年8月1日。

②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

但是，作为贵州省政府下属的边政机关，边胞文化研究会无专职研究人员，其成员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处职员兼任，无定额资金延揽人才。这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相比，取得的研究成果就大打折扣。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开发和建设，没有提出设计方案。

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他们在出版的《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中把贵州少数民族的服装看成是“奇装异服”，强迫改装。实行强迫同化政策，由各级政府制定同化办法，限期完成，要求统一语言，即用汉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强迫民族通婚，这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反对。

###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贵州的调查

#### 一 国民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调查是在抗战以后。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于定番，以定番为实验县，对定番少数民族尝试作详细的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曾派王文萱到贵州调查，他先后发表了关于贵州苗族的诸多文章。

1939年，教育部组织西南边疆教育团，其中对贵州进行了考察。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两人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sup>①</sup>

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社会研究部先由吴泽霖先生主持其事，1942年春，吴泽霖先生受聘于西南联大，乃由岑家梧继任。由上海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的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过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县，调查历时8个月，根据内政部调查要点，最后将调查结果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三种呈报，每种约20万字。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

<sup>①</sup> 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1944年2月。

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生活状况。大夏大学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从东路和西路分赴边远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sup>①</sup>。

## 二 贵州省政府派人开展的调查

贵州省民政厅为了解贵州少数民族情况，于1935年“派员驰赴西路苗民集中县份，实地考察，宣布政府今后注重苗民之意旨，并制定调查表式，分令各县，将各该苗寨生活情况，逐一详细调查，以备政府拟定改进办法之参考。关于西路苗民大概状况，已得一二，威宁石门坎、镇宁等处苗民情形，调查尤为详细。其在东南两路，如炉山、黄平、台拱、丹江、剑河、榕江、八寨、都江等县，苗民土著，极为众多，其实际情况如何？殊非表报所能详列，为求改进计划，推行便利起见，复于本年度（即1935年）派员彻底详为调查。”根据调查资料，写出《贵州省苗民概况》，于1937年4月出版。

《贵州省苗民概况》由导言和7章内容组成。导言部分首先对贵州省少数民族情况进行介绍，“本省苗民，多结寨而居，男女老幼，俱能操作，不避寒暑，不畏艰难，有刻苦耐劳之习惯，团结合群之性质，自强不息之精神。其散布区域，以东南两路为最多，西路次之，北路最少。就现在八行政督察区而言，则七八两区最多，一二三四等区次之，五六两区最少。如按81县区分，则有60县均有苗民散处其间。”对于民族的称呼，“因生活习惯之差别，服饰亦随之改变，于是苗民称呼乃益繁杂矣。如以衣服颜色区分，则有青苗、黑苗、白苗、红苗；以居住地域区分，则有山苗、高坡苗、平地苗、坝苗；以地名区分，则有水西苗、加车苗、滚塘苗；以衣服花纹区分，则有花苗、大花苗、小花苗、花衣苗；以所着之裙区分，则有长裙苗、短裙苗、围裙苗；以职业区分，则有打铁苗，以装饰区分，则有枕头苗。此外尚有仡佬革兜等名称……历代书志统称之曰‘苗民’、‘苗夷’、‘苗蛮’，亦曰‘土著’，盖未深入苗寨，以悉其详也。”“兹将苗民生活形态，风俗习惯，与夫言语文字，经济状况，简述于后，俾海内贤达，明其概况，进而研讨改进方针，俾此一部分民众生

<sup>①</sup>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活，获相当之改进，因以达复兴民族之目的。”<sup>①</sup>

其他七部分分别为第1章 生活，包括饮食、衣服（材料、装饰及花纹）、居住（平房、楼居）三方面内容；第2章 语文，包括语言（将语言分为青苗语、仲家语、洞家语和水家语）和文字（文字有木刻、水书、夷字、苗文）；第3章 乐器（主要介绍了六笙、五笙、萧笛、口琴、唢呐、铜鼓等6种乐器）；第4章 婚丧，有婚姻（关于媒介方面、关于结合方面）和丧祭（丧礼及祭祀）两方面内容；第5章 习俗，包括习性（指合群观念、自给友爱、刻苦耐劳、诚挚服从、男女互助）和信仰（神鬼、鬼师、蛊毒）；第6章 生产，包括畜牧、耕种和手工；第7章 交易—赶场。

《贵州省苗民概况》是贵州省民政厅在派人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写的，其资料可靠，内容丰富，是当时较权威的一本册子。它是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是现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但是对于贵州少数民族一概用“苗民”来概括，是不科学的，这反映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名称的混乱。

### 三 贵州省促进苗夷民族的同化工作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贵州积极制定同化少数民族的计划和大纲。1937年2月，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拟定了《贵州省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同化苗胞计划大纲》，其宗旨是“协助政府普及苗胞义务教育，改良苗胞服制、语言、习俗，暨鼓励汉苗通婚，实行汉苗同化”<sup>②</sup>。大纲将同化工作分为4个步骤：（1）开始调查；（2）实施宣传；（3）实施改良；（4）鼓励通婚。在实施改良阶段，首先进行劝导，在劝导期满后，仍无改良趋向时，由政府强制实行，这是强迫同化。

1937年4月，“为促进土著民族文化，实施种族同化，复兴中华民族”<sup>③</sup>，贵州省政府会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拟定并颁布了《贵州省各县土著民族同化工作纲要》及《贵州省各县民族文化促进会章程准则》，令

<sup>①</sup> 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印：《贵州省苗民概况》导言，1937年4月，第1~3页。

<sup>②</sup> 《贵州省各级新生活促进会同化苗胞计划大纲》，1937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715卷。

<sup>③</sup> 《贵州省各县土著民族同化工作纲要》，1937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7096卷。

各县遵照办理。

民族同化工作纲要规定，最低限度的工作有7点：一是调查土著民族生活情况及意识倾向；二是消除汉人与土著民族双方成见，打破互相歧视观念及不平等待遇；三是开办农村学校，专收土著民族，注意知识的启迪；四是劝导关于风俗、习惯、装饰等的改良；五是七项运动的提倡及推行；六是正当娱乐的提倡；七是汉人与土著民族通婚的提倡。纲要的实施分为3期，第一期，调查宣传同时并行。由各县党部派员分赴土著民族村寨，访问优秀分子，联络感情，并即推行宣传及调查工作；第二期，筹备组织民族文化促进会。着手组织文化促进会之步骤及方式，使民族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第三期，按先后缓急推进工作，务须精密筹划，实事求是。

同时，决定成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制定了《贵州省各县民族文化促进会章程准则》，文化促进会以“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教育，启发民智及改良一切风俗习惯为宗旨。”<sup>①</sup>促进会主要职务有：关于三民主义之研究与实施事项、关于宣传破除夷苗汉歧视实行通婚事项、关于发展民族教育启发民智事项、关于改良不良风俗习惯装饰等事项、关于调查各土著民族之民生经济状况及其编制统计事项等13项，凡有关少数民族的事项均包含在内。

从上述的计划大纲中可以看到，对贵州少数民族采取强迫同化政策。这种强迫同化会增加少数民族的民族反抗心理，拉开民族间距离。

#### 四 贵州省政府对威宁石门坎的经营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境内，与云南省的昭通、彝良交界，处于川滇黔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矿产资源亦较丰富。居民多系大花苗，民国时期人口共计10余万人。

1903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经昭通进入石门坎，在这里遍设教堂与学校，实行同化教育（梁瓯第先生认为是异化教育）。经过外国传教士30多年的经营，这里仿佛成为一特殊的区域。1935年，时任二十军军长的杨森驻节黔中，曾到威宁石门坎，在欢迎会上，该地苗族同胞竟称：“我们外国人，从未见过中国官长，今日杨将军来，实为来

<sup>①</sup> 《贵州省各县民族文化促进会章程准则》，1937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7096卷。

此地的第一个官长。”<sup>①</sup>由此可知，边疆危机的严重。

1936年，贵州省政府派民政厅视察员田东屏前往威宁石门坎宣布政府“德威”，同时进行调查。随后，田东屏写出《威宁石门坎苗民情况调查报告》，呈报了他宣抚威宁石门坎苗族的经过，对于英国传教士经营该地的情形，也有详细介绍。

当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及民政厅长曹经沅根据田东屏的调查报告，向国民政府做了汇报，“该地毗连滇界，居民多系大花苗，计共有10余万人，向有英人在该地设循道公会，宣传教义，拢络愚民，复遍设学校，实行同化政策，又因威地土目土豪势力甚大，社会机构仍停滞于部落时代，英人偶为苗民援助，以减少土目土豪之压迫，一般苗民遂为所惑，每日唱诗歌，读圣经，不知有县政府，更不知有国家，加之英人自柏格理深入苗寨，改英文为苗文，该花苗只自认为苗文，老幼男女，皆能诵习。三十年来，英人将该地形势、矿产及其他一切，均已详查无遗，纤悉毕至，认为香港第二。该地苗民受英人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彼等对于政府人员反加疑虑，及经宣扬国家德意，并宣示今后政府对于苗民将予以特别重视，该苗民等始改变疑虑态度”。田东屏回来时“携带了苗族学童王聪灵、韩邵刚到贵阳，由教育厅送入省立青岩乡村师范肄业，并于该县办有短期小学，复定于下年度在该县设立四年制苗民初级小学1所，该县苗族学生杨汉先在四川华西协和大学肄业，本省特予每年补助费贰百元以资奖励……”<sup>②</sup>

贵州省政府的呈文，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发布训令<sup>③</sup>，并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边政设计委员会核查此事。后由边政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并由边政设计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璜、沈重宇、张为炯等三人组成了调查组，对石门坎一案重新核实后，呈报了调查报告，他们认为：“石门坎地居冲要，矿产丰富，政府如不设法经营，关系国家前途……此案之重要性，固由于石门坎地位之本身，具有形胜（毗连三省）资源（富银煤矿）民族（苗寨中心）三种关系。而尤在外人卅余年来，阳藉传教之名，阴

① 杨森：《从边疆危机说到本（贵州）省边胞文化工作》，《边铎月刊》第2卷1期，1948年1月。

②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1期。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治宽字第1717号训令》，1936年8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寓侵略之计。”

贵州省“所呈英教士经营该地经过情形，其侵略阴谋显而易见者，一为抚循苗族，结予小恩小信，使其生心向外；二为垄断地方经济，测绘矿山要厄诸图；三为以石门坎为中心，用45里路作半径，广设苗民学校；四为制造苗族文字，诱致远近苗民诵习，造成特殊文化。就中，前三项为普遍情形，凡有教会之地，大抵皆然，本无足怪。惟第四一项，用意最深，关系最大。请试申论之。查民族同化之要素，第一为文字语言，而宗教、政治、风俗、习尚等项，尚属次之。……故凡灭绝人之种族者，必先灭绝其语文，离间人之种族者，必先离间其语文。反之，保障其种族者，必先保障其语文，统一其种族者，必先统一其语文，此一定之势也。……苗民散处滇、黔、川、桂、湘间，适当今日民族复兴之根据所在地。查自清初以来，政府对于苗教事宜，已常为最大之努力，故苗民在西南诸族中，最为接近汉化，通晓汉语之人，所在多有，虽仍保有其原来语言，然幸尚无独立文字，其根不深，其执不固，只须广设学校，不难于十年内外，悉使同化……今英教士突于石门坎地方，妄创苗文，其内容是否合理，组织是否成熟，尚不得知，如果不合理，不成熟，不过使一部分苗民盲从一时，其害尚小。如其合理而成熟，推行无阻，经假由石门坎传演，遍及邻疆，则散漫之苗民，藉文字而团结，在文化上屹然立异。当此国家多故之秋，尤易供人挑拨离间。平时则为同化之梗，有事则增内顾之忧。本会窃以为应当特别注意，能禁止则禁止之，否则逐渐取缔之。”<sup>①</sup>

于是，提出《经营贵州威宁石门坎地方办法原则》<sup>②</sup>，内容如下：

#### 甲、关于文化方面

1. 由川黔滇省府严查该地附近一带教会学校，是否悉已遵章立案，并遵章教授，如有违章情形，随时加以取缔。
2. 由贵州省府查取外国教士所制苗文课本，咨请教育部审查，如不合法，即予禁用，即令合法，亦应筹逐渐取缔之办法。
3. 查滇黔两省，对于（民国）二十四年度之苗民教育本有相当计划，应饬再于该项计划中，特别注意推行注音办法，期以注音字母替代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边政设计委员会呈文》，1936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sup>②</sup> 《经营贵州威宁石门坎地方办法原则》，1936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该教士所制之苗文，而使苗民由注音以通汉字，逐渐成为整个汉化，此项办法须飭由四川省府通令沿边各县，一体照办。

4. 凡川滇黔三省沿边各县有苗民各县之学校，均应附设苗生优待学额，其优待办法由各该省自行酌定。

5. 凡苗校教师，须采取英教士化装入寨，学习苗语，接近苗民，遇事有扶助之精神与办法。

6. 苗校教师，于化苗工作特著成效者，应由该省府呈报中央特别奖励。

7. 呈请中央仿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特订苗族学生留学国内各级学校优待办法。

#### 乙、关于政治方面

1. 设一类似设治局或化苗局等之特种机关于石门坎，针对外力侵略情形，专司化苗及开辟各项事业。

2. 此项特种机关，直隶省府，其主持人员以县长待遇，严其选格，假以事权，并预定若干年计划，宽其时限，而责其成功。

3. 设立石门坎农民银行，救济佃苗，并开发地方实业。

4. 查照法令，取缔外人违约购买土地置业事宜。

又由于石门坎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行营令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政府分别核办。当然，在西南三省中，由于这一件事发生在贵州，贵州省政府自是出力最多。贵州省政府很快组织财政、民政、建设、教育四厅就各自主管事项，拟定了“治理石门坎方案计划”，分为政治、文化、建设、经济四方面，其主要内容是将威宁县西部原第10、11、12三区划出，建一个“石门坎设治局”，该局直接隶属省政府管理，设治局长相当于县长待遇，并规定了区域、局务组织、职权、经费、职员人选及实施方式<sup>①</sup>等。

经上报中央，国民政府基本同意贵州省政府的方案：“兹据内政部复称，原拟政治、文化、建设、经济四项办法，颇为详晰，关于石门坎设治局一节，亦具理由，惟设治局以石门坎三字命名欠妥，其管辖区域，亦应略加扩大……又据财政部复称，原送经费预算表说明栏声叙包括每月经常费内之事业费壹千元，请由国库拨款，但原规程第七条复规定设治局行政经费……由国库补助之两者互有出入，此项设

<sup>①</sup> 《设置威宁县石门坎设治局计划》，1936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治局经费，无论为事业费或行政费，均属需款无多，似应由省府妥为拨补，”<sup>①</sup> 最后将“石门坎设治局”改为“石门设治局”，所需经费由贵州省政府拨款。到1937年2月，治理石门坎的事宜，全部转由这一机构去落实办理<sup>②</sup>。

1937年9月，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视察员潘隆址提出了《开化贵州威宁县石门坎苗族意见书》<sup>③</sup>，对治理石门坎提出了分两期完成，即“开化期”和“同化期”。在开化期的主要工作有推行农村合作，改善苗民生计；增设学校，启发苗民知识；提倡畜牧，增加生产。在同化期主要是推行统一语言文字运动，提倡通婚运动，统一服装运动及改良苗区土地制度等。其主要精神是强调苗族要汉化。

虽然威宁石门坎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但由于外国传教士在这里的经营，形成了一特殊区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国民政府及贵州省政府对威宁县石门坎的经营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防止民族分化的角度来讲，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国民政府的所谓“开化”、“同化”，实质上是使其汉化，完成大中华民族的建设。

本章小结。抗战前，中国很少有人对贵州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所以，贵州的民族调查起步较晚，抗战前基本属于调查盲区。政府派出考察团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调查是在抗战以后。

国民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次数较少，第一类调查只有8次，政府派出考察团的调查也不多，与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相比，调查次数明显减少。

贵州的边政机构，“贵州民俗研究会”和“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选择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过多次调查，调查的成果主要发表在《边铎月刊》上。这些调查报告是由一些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所写，是典型的民族学、社会学的文章，如梁瓿第的《车寨社区调查》，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完整记录。这些成果成为人们了解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但是，对于贵州少数民族地

①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26号训令》，1937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② 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③ 《开化贵州威宁县石门坎苗族意见书》，1937年9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1卷。

区的开发建设，贵州的边政机构却没有设计开发方案。

国民政府对威宁石门坎的经营，是贵州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在石门坎地区“异化教育”的担忧。政府想要控制这一地区的意图在《经营贵州威宁县石门坎地方办法原则》及各种“明文”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若从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和防止民族分化的角度来讲，似乎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在‘担忧和控制’上的思想出发点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当落实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时，就跳不出‘旧法’的窠穴。”<sup>①</sup>

---

<sup>①</sup> 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

四川省东与湖北连界，东南与湖南接壤，南部与云南、贵州毗邻，西接西康，北部与青海、甘肃、陕西相邻。1935年，四川设有147个县，1市，1设治局（金汤设治局）<sup>①</sup>。1938年，又增设宁东设治局。

民国时期，四川少数民族主要有：保罗（今彝族）、回、羌、戎（注：档案中有此族名）、藏族（民国时期称西番、估宗等）、摩梭、傈僳、苗族等。四川少数民族分布较集中，主要分布在川西南、川西北和川西地区。另外在川南及东南与滇黔湘边境毗连各县，有部分苗族。

原西康省位于四川西部，东界四川，南界云南、缅甸和印度，西与西藏毗连，北接青海。其范围东自打箭炉（今康定）起，西至察木多（今昌都），南抵云南省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省西宁，包括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是连接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过渡地带，与西藏和四川有紧密联系。到1939年西康共辖33个县和2个设治局。西康全境由三部分组成，原西康所属19个县、四川划入的宁属8县、1个设治局及雅属6县、1个设治局。

西康居民以汉族、藏族（当时叫康族、西番、估宗等名称，经识别均为藏族）为主，依次有蒙古、回族、保罗（今彝族）、潞族（今怒族）、摩些（今纳西族）、傈僳等民族。康属以藏族为最多，宁属以保罗族为多，雅属大多是汉族，虽有保罗、藏族等，久已同化。

在1939年西康单独建省前，西康的雅属、宁属均属于四川省，到20世纪50年代西康撤省，其大部仍划归四川。民国时期西康与四川紧密联系，故将西康的少数民族调查与四川的民族调查放在一起叙述。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与云南、贵州的调查相同，仍可

<sup>①</sup>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16~17页。

分为三类：一是国民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自上而下开展的调查；二是政府的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人员进行的调查。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

### 一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主要有1936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

#### （一）西南苗夷民族调查

1936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公函称：“本会为欲明瞭各地苗夷民族状况起见，特制定调查表式分送各处苗夷分布地域主管机关，请代查填。现查贵省理番、松潘、汶川、茂、懋等县向有苗民聚居，特检同调查表式一份，函送贵府查照，务希依式画量赐予填送，如有关于苗夷问题各种刊物，并祈赐寄，俾供参考”<sup>①</sup>，并附发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

此调查表包括的调查内容与云南、贵州的这类调查相同，见附表1。

四川省接到上述公函后，回蒙藏委员会函说：“贵会总字第3005号公函，嘱为调查苗夷民族状况，暨检送有关苗夷问题刊物，并附苗夷调查表式等因。……按贵会所指松、理、茂、汶等县，除汉人外，其土著者康藏种族，世通称为夷人，并无苗民聚居，惟与滇黔湘边境毗连各县，乃有苗族，不知贵会对于上开各该处苗夷民族，是否一并需要调查？希即赐覆为荷。”<sup>②</sup>对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于8月明确指示：“本会此次调查，所有苗夷民族俱在调查范围之内，贵省与滇黔湘边境毗连各县苗民，仍请一并调查，以期全璧。”<sup>③</sup>

四川省政府于1936年9月发布训令，“番民应由16、17两区查照办

①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总字第3005号公函》，1936年6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7卷，第3页。

② 《四川省政府民字第17401号公函》，1936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7卷，第1页。

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总字第3812号公函》1936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7卷，第7页。

理，猓（原文如此）民应由第5、第18两区查照办理，苗族应由6、7、8三区查照办理。……所属各边县，依式查填，并检有关各种刊物，呈由该署汇呈来府”<sup>①</sup>。

调查从1936年开始，按照省政府的训令，四川省第5、6、7、8、16、17、18行政区及康巴地区各县上报了《苗夷民族调查表》。但到1937年2月“时逾五月，迄未据报”，四川省政府发令，要求赶紧查填。<sup>②</sup>调查最终于1937年底才结束。

## （二）西南边区民族调查

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密令四川省政府对西南边区少数民族开展调查，令“所属苗夷等族聚居各县，从速调查填报汇转，以重要政。”同时下发了《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sup>③</sup>《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的内容同云南、贵州<sup>④</sup>。见附表2。

事关抗战大局，四川省政府及时下发密令，令第5、6、8、14、16、17、18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饬所属苗夷等族聚居各县，限奉文十日内，从速详密调查……迳呈来府，以凭存转，勿稍忽延为要！”<sup>⑤</sup>

到1938年9月，已有“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平武、松潘、茂县、理番、汶川、靖化等10县，先后填报到府，除第6、第8两行政督察区所属各县及第16区所属懋功县尚未具覆，已分令严催外，相应将雷波等10县边区民族调查表10份，先行汇转贵部……再本省原属雅安、天全、芦山、汉源、荣经、宝兴、西昌、会理、越嶲、冕宁、盐源、盐边、昭觉、宁南等14县及金汤、宁东两设治局，现已改隶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所有各该县局应填表报，业由本府专案咨请西康建省委员会，汇案核转在卷，合并咨明。”<sup>⑥</sup>

① 《四川省政府民字第22125号训令》，1936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7卷，第5页。

② 《四川省政府廿六年民字第5477号指令》，1937年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7卷，第9页。

③ 《国民政府内政部渝民字第1036号密咨》，1938年5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8卷，第3页。

④ 《云南省政府秘一民字第174号密令》，1938年6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9卷，第6~7页。

⑤ 《四川省政府民字第14304号密令》，1938年5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658卷，第2页。

⑥ 《四川省政府民字第27729号密令》，1938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8卷，第6页。

同时，西康建省委员会也“附送雅安、天全、芦山、汉源、宝兴、金汤、越嵩、会理、昭觉、冕宁、宁东各县（局）原呈11件，附表22份”<sup>①</sup>报给内政部。

到1939年9月，仍有一些县没有填报，内政部再次咨请四川“查照转饬有关各县，迅行查报汇转，如未报各县，均无此类特殊情形，仍请分别注明见覆。”<sup>②</sup>四川省政府要求继续查填，调查最后到1939年12月才结束。

## 二 国民政府对川康土司调查

土司制度原是封建时代的遗制，与民国时期的国体不符，民国时期要求继续裁废土司，改土归流。于是，对各省土司情况进行调查。

### （一）四川省现有土司调查

1929年，内政部咨文中说：“查县为自治单位，载在建国大纲，依照现行制度，各省省政府以下除县市政府外，本不容有他种特殊行政组织，惟边远省份或以种族居处太杂，或因土地开发较迟，所有特殊区划及特殊制度不得不暂时存在，自属事实问题。兹为编定全国行政区划表起见……特再拟订现有土司调查表及现有盟旗或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两种送请贵政府（即四川省政府），饬令民政厅详加调查，凡与县治相当地方，现未改设县治，尚有此类特殊行政组织者，应即依式填表报部，以资稽考。”<sup>③</sup>由于川康没有盟旗或其他特殊组织，只有土司存在，故川康主要填报《现有土司调查表》。《现有土司调查表》的内容同云南、贵州<sup>④</sup>，见附表3。

按照内政部的指示，四川省政府要求遵照表格“依式填报来府，以凭汇报。”<sup>⑤</sup>这次调查四川全省都上报了调查表。根据调查得知四川省平武、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西昌、冕宁、昭觉、越嵩、盐

<sup>①</sup> 《西康建省委员会政字第291号咨文》，1938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8卷，第72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渝民字第2279号密咨》，193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8卷，第83页。

<sup>③</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1488号咨文》，1929年1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7页。

<sup>④</sup> 《内政部民字第1488号咨文》，1929年12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2卷，第201页。

<sup>⑤</sup> 《四川省政府第182号训令》，1930年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6页。

边、天全、峨边、盐源、会理、马边、雷波、古蔺、綦江、南川等20个县仍有土司存在。<sup>①</sup>西康的康定、泸定、炉霍、九龙、丹巴、瞻化、理化、巴安、甘孜、雅江、道孚、盐井等10多个县也有土司存在<sup>②</sup>。

## (二) 四川省边地土司调查

1939年1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给四川省的公函：“拟请贵省府将所辖境内已改土归流各土司之姓名、所在县治、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列单见示。其有尚未明令改流者，亦盼一并查复。”<sup>③</sup>

同年2月，四川省政府令第5、14、16区行政督察公署：“即便转飭所属夷区各县，遵照查填二份，转报来府，以凭汇覆为要！”并附《四川省 县边地土司调查表》一份。

《四川省 县边地土司调查表》包括：原有名称、土司姓名、现任职务、所在地址及所辖区域、所辖部落或支族、改流时期及备考等内容<sup>④</sup>。见附表16。

填表须知：（1）本表须详实查填，不得草率敷衍；（2）未由政府界以新职者不填“现任职务”栏；（3）尚未改流者不填“改流时期”栏；（4）本表须具二份，限奉文一月内呈报。

四川第5、14、16区行政督察公署按照要求，将已改土归流土司情况进行查填上报。四川第16区的平武、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靖化等<sup>⑤</sup>县有土司存在。而第5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和峨边4县均无土司设置，虽有土千百户不在查填之列”，故上报的表中填的是无<sup>⑥</sup>。

西康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康定、盐井、瞻化、理化、道孚、泸定、炉霍、丹巴、九龙、巴安、甘孜等县土司先后被委以团练局长、总保、保正、村长及调查员等职（也有部分土司没有任公职），先后完成改土归流。

①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6～257页。

② 《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旧有土司土职调查表》，1928年，《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366页。

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渝日字第180号公函》，1939年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348卷，第3页。

④ 《四川省政府第4051号令》，1939年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348卷，第2页。

⑤ 《四川省政府廿八民一字第20952号公函》，1939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348卷，第17～18页。

⑥ 《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呈文》，1939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348卷，第6页。

### 三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人口调查

1947年，内政部公函称：“扶植国内各少数民族之繁荣发展，为中央一贯政策。本部兹为明瞭各边地土著民族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状况，俾供施政参考起见，经拟订‘省县各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表式’一种……连同填表须知一份，函请查照转饬各土著民族住居县份遵照查填，并希于文到一个月内存送过部，以便办理”。

《省县各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表》包括内容及填表须知<sup>①</sup>与贵州的同类调查相同，见附表15。

这次调查，四川全省按要求进行填报。调查到1947年底完成。

### 四 国民政府对川康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与云南、贵州两省一样，这类调查有1947年的“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和1948年“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 （一）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

“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其要求和调查内容见云南和贵州部分。由于搜集的资料不全，目前只知道四川有成都、古蔺、兴文、峨边、德阳、夹江、邛崃、犍江、阆中、富顺、南溪、昭化、剑阁、庆符、南川、天竹、江油、茂县、蓬溪、仁寿、安县、射洪、新都等县上报了调查表。

#### （二）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

1948年8月，重庆绥靖公署“为明瞭川康滇黔边区各民族人口、生活、教育、经济、出产等情形起见，特制定调查表式一种……希于文到三个月内查填具报”，同时下发了“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令川康滇黔各省进行调查。

《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的内容与云南、贵州相同<sup>②</sup>，见附表11。

四川和西康两省，根据前面几次对少数民族调查情况，按照要求进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8158号公函》，1947年7月3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43卷，第1~2页。。

<sup>②</sup> 《云南省民政厅民统边字第14600号》，1948年9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2全宗765卷，第89~91页。



行了填报。

## 第二节 川康两省边政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四川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川西南、川西北、川西地区。川西南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及大凉山，民国时期属于四川省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川西北的松潘、理番、茂县、汶川、靖化、懋功等县，当时属于四川省第16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川西宁属的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昭觉等县，当时属于四川省第1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宁属的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昭觉等县划归西康省后，四川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有第5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和第16区的松潘、理番、茂县、靖化、汶川、懋功各县。由于它们地处偏僻，交通艰难，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故民国时期被视为边区。

川康两省政府为开发建设上述地区，先后成立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及“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等组织，对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调查，提出开发建设的方案。

### 一 四川省政府对川西南边区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位于川西南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与大凉山接壤。大凉山是傈罗（今彝族）聚居区，“具有特殊的语言、文字、饮食、服制，风俗习惯。……大凉山蕴藏之富，煤铁金银铅铜锌铝铋汞等国防之资源及农林牧畜之生产均有惊人之产量，对于抗战建国有重要之地位。而其周围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4县常受‘夷患’危害，各县土地常被夷人侵占，人民痛苦不堪”。<sup>①</sup>

#### （一）四川省对雷马屏峨各县的治理和宣慰

早在1937年，峨边县就拟定了《峨边县政府暂拟治夷方略》，主张“以汉夷亲善而至于同化，由交通控制而企于开发”两大原则，作为处理一切夷务的方针。将治夷方略分三期：准备时期、感化与开发时期、完成同化与开发时期。认为，如此“则夷务可于和平原则之下得以解

<sup>①</sup> 《（四川）开发大凉山意见书》，1944年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8365卷，第177~178页。

决，而开发边疆之口号完全实现矣。”<sup>①</sup>

1940年，雷波县制定了《雷波县政府治夷计划》，认为历来治夷政策不外剿抚二字，但终非根本办法。此计划提出：“应采用积极感化政策，庶足消患无形。且值此抗战严重时期……一方面加强自卫力量，一方面宣慰招抚。因势利导，设法羁縻。首谋消弭叛乱，次再谋实施管制，籍收逐渐感化之效果。”为达到预期的目的，决定分五步完成：即健全机构、兼施防抚、并用恩威、实施管制、逐渐同化<sup>②</sup>。但在此计划中，如认为彝族同胞“夷性犬羊，反复无定”，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宣慰各民族也是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1938年，行政院令：“查夷苗黎瑶等族杂居西南各省，久已无分畛域，自无庸另设专管机关。但各族居住区域内，各级政府对于各族事务，应格外注意。……各族聚居地方，应转饬该管专员县长，随时宣慰，并将宣慰情形，转报备查。”<sup>③</sup>四川省政府在接令后，向有少数民族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训令，令“该署遵照督饬所属夷苗等族居住区域内各县县长，对于各族事务，务须格外注意，因势利导，并随时宣慰以融洽各族情感，并将所拟宣慰办法上报到省府。”<sup>④</sup>

根据四川省政府的指示，雷、马、屏、峨4县，根据各自情况，先后拟定了各县宣慰夷族办法。在各县拟定的宣慰夷族办法基础上，1939年，四川省政府“参酌雷马屏峨四县实际夷情，订定四川省雷马屏峨四县宣慰夷族纲要。”<sup>⑤</sup>上报给国民政府内政部，并下发给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县政府和第16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四川省雷马屏峨四县宣慰夷族纲要》，分为总则、宣慰原则、宣慰办法、附则等内容。在宣慰原则中，提出了促进汉夷感情、提高夷族

① 《峨边县政府暂拟治夷方略》，1937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8365卷，第4~10页。

② 《雷波县政府治夷计划》，1940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8365卷，第71~78页。

③ 《国民政府行政院渝字第10411号训令》，1938年1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2~3页。

④ 《四川省政府廿八年民字第3190号训令》，1939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1页。

⑤ 《四川省政府廿八年民一字第17081号呈文》，193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15~16页。

文化、奖励夷人归诚、倡导夷地生产等原则。关于宣慰办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几方面拟定具体方案。此纲要对于政治方面尤其注重，主张消除汉夷畛域、昭示政府诚信、优奖有功夷人、严密夷民组织和训练、注重宣传工作、改善边民待遇等。本纲要由雷、马、屏、峨4县政府切实遵照实施<sup>①</sup>，但纲要中仍沿用“夷族”、“汉夷”以及其他类似字样，对于消除民族畛域不利。

## （二）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的设立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与大小凉山的夷患，国民政府向来重视。江应梁早就提出大小凉山“欲谋彻底开发，首须三省协同动作”。<sup>②</sup> 1947年，国民政府为统筹规划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决定成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作为管理这一地区的专门机构。

川康滇边区包括西康省的西昌、会理、冕宁、越嶲、昭觉、德昌、盐源、盐边、宁南、九龙等10县及宁东设治局；四川省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及沐川5县；云南省的永胜、华坪、永仁、巧家、永善等5县及宁蒍设治局。

划出的川康滇边区，“地域辽阔，绾毂滇藏，衔接川黔……实为西南国防之重要根据地。且蕴藏丰富，举凡重工业所必需的主要资源，在国内其他地区所不能兼备者，此皆应有尽有，实具有经济上的重大价值。惟边区居民，多为傜夷，发生‘夷患’已达二千多年，此患不除，不但建设无从着手，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亦失去保障。过去这里分属川滇康三省，政令难以统一，治夷步骤亦难同步。欲除此患，必须军政配合，通盘筹划。”

“为统筹规划边区夷务，达成设治目的，并开发资源，促进经济建设等事宜”<sup>③</sup>，1946年秋，西昌警备司令部贺国光司令，呈请重庆行辕转呈中央，设置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以财政困难，碍于政府不成立新机构的规定，未予批准。但三省边区边务，亟待规划进行，而且川康滇三省主席，均认为有统筹规划之必要，云南省政

<sup>①</sup> 《四川省雷马屏峨四县宣慰夷族纲要》，1939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73~77页。

<sup>②</sup>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第7~9页。

<sup>③</sup> 《西昌设立川康滇三省边务设计机构》，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0卷，第10~11页。

府主席卢汉更请求尽早成立。1947年，又经贺国光一再呈请，经行政院核准，在不增加经费的原则下，设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地址设在西昌。

1947年8月16日，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任命贺国光兼任主任委员。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此“委员会的建立使川康滇三省边区，有了一个统筹联系的机构，对于该边区边务的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有进一步的改进。”<sup>①</sup>

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设主任委员一人综理会务，由重庆行辕副主任兼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兼任之。委员9人至13人，共同策进会务，除由三省政府各派代表一人，西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第一处处长及第二处处长为当然委员外，其余委员由主任委员遴选，报请重庆行辕聘任之。为办事及研究设计便利起见，设秘书处及政务、经济两组。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政务、经济两组各设组长一人，由主任委员就委员中遴选派任，处组以下办事人员由西昌警备司令部职员调派兼任。本会于必要时，得聘任专门委员，并得视工作之性质与繁简，向三省政府商调专门技术人员。”

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第一，边务问题之调查研究及治理方案之拟订事项；第二，边区地方行政及教育改进的研究；第三，工矿资源之调查勘测及开发设计；第四，农林畜牧及工商业的调查改进研究；第五，各种已成事业之考察及调整建议；第六，交通的调查研究及建设方案的拟订；第七，行辕主任交付的调查设计事项等。<sup>②</sup>

开发川康滇三省边区，最大的障碍是所谓“夷患”。要先行消除“夷患”，积极治理夷务，需要制定相应的计划。1947年底，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拟订《川康滇三省边区夷务治理计划》。计划采取民族平等原则及同化进化政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用据点跃进方法，由点而线而面，分期进行。第一期（即1948年）的政治措施有九项：一是设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由三省省府派员参加，

<sup>①</sup> 《西南边务大事记》第八期，1947年9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20卷，第10~11页。

<sup>②</sup> 《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1947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537卷，第106~107页。

统筹筹划有关治夷计划及资源的调查设计等工作；二是设置建设指导局18处，即在北山、大桥、宁东、普雄、竹核、布拖、天台、麻陇、黄草、瓜别、泸宁、拖鸟、腴田、太平、西宁、羿子坪、万石坪、通安等各处设一建设指导局，专门负责治夷工作计划的切实执行，以矫正过去因为边区地方政府事情繁杂，力量分散，使治夷计划不能彻底之流弊；三是设立夷务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治夷工作人员有关夷情、夷语及治夷工作技能；四是办理夷民教育，设立夷民学校、民众教育馆各18所，依据夷胞文化程度推行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并为夷胞绝大多数不能识字，设立巡回电化教育工作队一队，使夷胞耳濡目染而收间接教育的效果；五是设置农牧工艺示范场二所，内分木工、泥工、农业、畜牧、铁工、纺织缝纫等6部，以习艺方式教授有关技艺，以改良其生活方式而臻于同化；六是开辟边区道路，开辟西宜、西永、九马、德丽、九永、峨巧、盐巧等7条驿道，逐年改成公路，构成交通网，有利于交通和文化输入，且根绝夷胞恃险为固之心理；七是发展夷区通讯，设置无线电总台1处，分台18处，及有线电话18处，构成通讯网，以利紧急消息及命令的传达，以便因时制宜，而免过去因小故而酿成大患的流弊；八是设立夷区卫生站，分区设置卫生站18个，负责区内夷胞医疗及卫生常识的训练，以减免其疾苦；九是组织设立生产和供销供应社，设立产销供应社总社一所，区所18所，供给夷胞日用必需物资及代销其剩余成品及原料，以改善夷胞生活经济。<sup>①</sup>

这是一个针对川康滇三省边区实际而制定的统筹周密计划，内容完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各项内容，如实施合理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准；授以技术以改良其生活；组织产销供应社以增进其生活经济；设立卫生机构，以救治其病苦；开辟道路，发展通讯以利行旅，而利文化输入等。不愧为当时治理少数民族的切要之图，如能秉此行之有恒，川康滇三省边区的开发建设，当会有效。然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此计划并未能真正贯彻落实。

## 二 四川省政府对川西北边区的调查、研究和设计

松潘、理番、茂县、汶川、靖化、懋功6县，位于四川西北部，东北

<sup>①</sup> 《川康滇三省边区夷务治理计划》，1947年10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521卷，第390~410页。

紧邻甘肃、青海，取道青海，可达苏联；西南连接康藏，可通英印，是一国际交通干线。这里虽为内陆，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具有国防的意义。民国时期这里属于四川省第16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汉、回、羌、西番（今藏族）、傛罗等民族。羌为土著，由于历史原因，人口日减，散处于汶川、理番、茂县。傛罗分布在松潘、理番。西番则松潘、理番、靖化、懋功都有，他们是七八百年前，由西藏、青海奉调从征而来，其后自由迁徙者亦多，形成了第16区边民之主干。

松潘、理番、茂县、汶川、靖化、懋功6县，僻处西北，历代统治者，多采取羁縻政策。民国成立，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没有顾及到这里。1935年，四川统一。“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需要拓展并建设后方。位于四川西北部的松潘、理番、茂县、汶川、靖化、懋功6县，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对此的开发。

#### （一）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193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为彻底明瞭及整理四川、西康、甘肃、青海边政起见，特组织“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

组织大纲规定：“设委员若干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委派：（1）现任或曾任各该地军事、政治职务，熟悉当地情形及当地民族状况者；（2）学者专家对于各该地之民情风俗，山川险要，语言文字，社团组织做过切实调查，有著作行世或有特殊的研究者；

（3）现从事或曾从事于各该地文化或社会事业，与当地民众情感相孚，且精通当地民族语言、习尚而对当地民众能加以组织训练运用者……各委员应将其经验所得或研究结果，分别整理送研究会呈候委员长分别采择施行。本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在委员中指定的常务委员承委员长之命令，受参谋团主任之指导，综理全会事务。本委员会设秘书一人，承常务委员之命佐领会务并监督指导各职员。设干事2至4人，协助秘书办理不属各组之事务。”

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分为两个组，各设组长、副组长一人，概就委员中指定。第一组主要从事边政之调查、设计事项，第二组是关于边民之政治训练事项。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主要任务有对川康甘青边区的调查、设计和边政的实施。<sup>①</sup>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组织大纲》，1935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5卷，第2~3页。

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是目前所知较早的边政研究机构。1936年，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重宇、李璜等拟定《边民教育计划大纲》<sup>①</sup>，这个教育计划实施的范围是四川宁属8县、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的各支傣罗民族及接近此等民族的汉人或汉化者；松潘、理番、懋功、汶县、茂县5县3屯的西番民族及接近此等民族的汉人或汉化者；西康及川康边区的康人、野番及接近此等民族的汉人或汉化者。针对以往边民教育失败的原因，本计划提出：一是确定边民教育系统；二是确定边民教育经费的来源；三是改善边民教育的师资及待遇；四是编辑适当的教材及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五是改良招徕边区学子的办法及改善边区学子的待遇25条；六是设研究所于各区以资辅助等措施。这个计划大纲经过国民政府委员长行营分别指示，原则上可行。此后，《边民教育计划大纲》由教育部令飭四川省教育厅遵照办理。

#### （二）第16区制定宣慰边民纲要

1940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咨文称：四川省的土著民族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在第16行政督察区所辖松理茂各县，多属羌戎獯猓（原文如此）各族，一部在第5行政督察区所辖雷马屏峨4县，多属猓猓，通称黑夷白夷。此两部分土著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均有不同，政教设施，亦因之而异。关于雷马屏峨4县边民，业经贵省（四川省）政府拟订四川省雷马屏峨四县宣慰边民纲要，呈奉行政院，令准备案各在案。至于松理茂等县边民，与康省宁属各县及川省雷马屏峨4县边民情形，既又不同，政教设施自应因地制宜，可否由贵省（四川省）政府参照川康建设方案内夷务部分，四川省雷马屏峨4县宣慰边民纲要……拟订四川省松理茂等县宣慰边民纲要。”<sup>②</sup>

于是，四川省政府令第16区专署及驻川西北土官边民宣慰委员李阳三，参照上述雷马屏峨4县宣慰边民纲要，“详密研讨各县夷情，参照拟订川西北各县宣慰边民纲要，呈候核定施行在案。”<sup>③</sup>第16区各县政府，依据雷马屏峨4县宣慰夷族纲要，根据本地实际，拟订出第16区宣

<sup>①</sup> 沈重宇、李璜等：《边民教育计划大纲》，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45～859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渝民字第2861号咨文》，1940年10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92～93页。

<sup>③</sup> 《四川省政府二十九年民一字第28331号训令》，1940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94页。

慰边民纲要。

《四川省松理茂懋汶靖六县宣慰边民纲要》分为总则、宣慰原则（提出促进边民情感、提高边民文化、创办土官头人讲习会、开发边区富源等原则）、宣慰办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几方面拟定具体方案）及附则等四部分。纲要与雷马屏峨4县宣慰夷族纲要大致相同，只是针对松理茂懋汶靖6县存在大量土司土官，在宣慰原则中将“奖励夷人归诚”改为“创办土官头人讲习会”，并在政治上对土司土官加以重视和宣慰。

### 三 川康建设方案

川西宁属的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昭觉等县，主要有西番（今藏族）、摩梭、傛罗（今彝族）、傣傣等族，原属四川省的第1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9月，国民政府令：“统一告成，训政开始，边远地方行政区域，亦应分别厘定……所有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各区，均改为省，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sup>①</sup> 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由刘文辉负责。1938年6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呈请划拨川边21个县归入西康，后经两省协商，并经国民政府批准，松潘、理番、茂县、汶川、靖化、懋功、名山7县仍隶属于四川，将原四川雅属的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6县，宁属的越嶲、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8县，共14个县及金汤、宁东设治局改隶西康。<sup>②</sup>

抗战爆发后，四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地，其后方治安以及建设工作，悠关国家抗战建国大计”<sup>③</sup>，西康与之唇齿相依，不仅关系后防，且为国家西部国防之前线。因此，对川康边区的开发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向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提交了《川康建设方案》，并获通过。

<sup>①</sup> 《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sup>②</sup>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9页。

<sup>③</sup> 《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边务及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1520卷，第131页。



川康建设期成会，是由国民参政会议长向第三次大会提议通过后成立的。随后，组织了川康建设视察团，由议长指定参政员21人，分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及西康5组，于1939年3月间先后出发，7月间返回到重庆。每组送交了视察报告，经过多次会议及分题讨论所得结果，而制定的《川康建设方案》。

《川康建设方案》共分九部分，（1）行政组织部分。甲、改划四川省区、川康两省行政督察专员及缩小县治，添设县治。乙、调整省以下行政机构。（2）兵役部分。甲、征送。乙、验收。丙、入营之待遇。丁、家属之优待。（3）治安部分。分治本和治标两部分，人民教养之切实筹划、基层机构之调整及地方自卫力量之充实为治本之策；社会不良团体之取缔、烟与毒之断然禁绝、军团清剿之严切责成、县长职权之提高及自新匪徒之处理为治标之策。（4）财政民生部分。包括原则和具体办法，提出应寓民生政策于财政政策之中、应使在财政政策之中含有奖金或保护农工商业之意、应使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同时并进三方面原则。具体办法有改革地方财务行政及其机构、实行地方预算制度、整理税制、添设银行支行，厉行贷款、取缔高利贷，普设合作社、改善人民尤其农民生活上所受之种种压力、扩大救济事业等。（5）经济建设部分。共有42项，可将性质比较接近者归为四类，甲、关于川康经济建设事业之设施方针6项。乙、现有之农、工、畜牧，亟待扶助指导者19项。丙、应即兴办及从速完成之工矿3项。丁、改进交通及运输之要点14项。（6）禁烟禁毒部分。（7）教育部分。分县教育行政机构、县教育经费、关于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关于中等教育、关于边民特殊教育等六方面内容。（8）夷务部分。（9）边区司法部分。提出治本和治标两方面，治本方法有制定适合康僰民情之特别法规、用康僰文字翻译实用法典、向康、僰、汉人普遍宣传法律常识等。治标的方法是培植边区司法人才、统筹边区司法经费、改进边区司法机构、缩小边区司法单位等。<sup>①</sup>

《川康建设方案》的根据是川康建设视察团的报告书。此报告书，是21位参政员经过100多天的考察，在视察团成员实地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建设方案。“凡所提出之问题，悉由实地视察所发现。凡所主张之方法，

<sup>①</sup>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建设方案》，193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第134～146页。

悉由事实所要求。川康两省，幅员广袤，种族复杂，地方状况随地而殊。此之所有，或为彼之所无（例如禁毒）；此以太过为嫌，彼或以不足为病（例如县长以下职权），视察团尊重事实，期成会从而尊重之。”<sup>①</sup>

方案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兵役、社会、教育、民族、司法等内容，是一个开发建设川康的全面计划。其中对于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尤其重视，把川康之经济建设，看成为全国经济建设之中心，提出“川康经济建设之设施方针，咸认注重民生为首要，如水利整理、农事改进、农村贷款、生计教育、日常生活必需品之调节（尤其在政府统制下之食盐）、工资之均平……实为川康建设之基本工作。”夷务方面，针对宁属各县以保罗为数众多（约有200万人），主张宁属几县范围内应设置如专员署的机关，充实其组织，扩大其职权，慎重其人选，使其就近督办军民政务。对于来归及征服之夷人的善后事务、收复夷区之初步设施应注意者也做出明白规定。虽是川康建设方案，但关注较多的是对四川的开发建设。为此，川康建设期成会后来又制定了《西康省经济建设纲要》（详见后面西康部分）。

#### 四 对西康的设计和开发

西康位于中国西南部，东界四川，南接云南，西邻西藏，北连青海，并与缅甸和印度接壤。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西康全境由三部分组成，原西康所属19个县、四川划入的宁属8县、1个设治局及雅属6县、1个设治局，到1939年西康建省时共辖33个县和2个设治局。西康居民以汉族、藏族（当时有叫康族、西番、古宗等名称，经识别均为藏族）为主，依次有蒙古族、回族、保罗族（今彝族）、潞族（今怒族）、摩些（今纳西族）、傈僳族等。其生产方式，高地草原以畜牧业为主，河谷地带以农业为主。

西康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位置重要，历代中央政府如欲治理西藏，须以康区作为依托；西藏如欲与内地加强联系，须借道康区，故有“治藏先治康，稳藏先稳康”之说。<sup>②</sup>清末，英国侵略西藏，西藏危急，清政府特别设立川滇边务大臣，进行各项改革，以巩固西康，屏障西藏。

<sup>①</sup> 《川康建设方案总说明》，见《川康建设方案》，193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第135页。

<sup>②</sup> 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 （一）《康藏垦殖计划》

1928年，刘文辉控制了康区，安定了形势。其时，诸如西康教育研究会、西康文化促进会、西康边政研究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触发认识西康热潮的升温。对于西康的开发，蒙藏委员会设计委员会曾拟就《康藏垦殖计划》，此计划提呈蒙藏委员会第53次常委会修正，并获通过。

《康藏垦殖计划》提出时，西康还未单独建省，所以将康藏视为一大区域。认为“康藏辖境，地广人稀，土性肥美，因遗传关系，土著人民，半多以游牧为业，不事耕种”，粮食收成差。“前清末年，汉兵驻防康藏，最感困难者，惟粮食一宗……据此观察，则垦务实为开发康藏之先决条件。”故拟分兵垦、民垦两种办法，逐渐推移。

将康藏垦殖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主要是对西康的开发：设立西康垦务总局于巴安，直隶于蒙藏委员会，由农矿部指导之（以下各总局同）。设立理化、察雅、昌都、康定、德格5分局。调查西康未设分局处所，并预计开垦需要人数。调查前藏拉萨附近荒地，并将将来应设前藏分局处所，及预定招垦人数。附设垦务训练所，及农具制造所、肥料制造厂于总局。实施造林政策。第二期主要是对前藏，设立前藏垦务总局于拉萨，组织与西康总局同。设立前藏各处分局，处所由第一期调查选定。调查前藏未设分局处所，并预计开垦需要人数。调查后藏日喀则附近荒地，并将将来应设后藏分局处所，及预计增加垦夫数目。增设西康未设分局处所。其余附设垦务训练所，及农具制造所、肥料制造厂于总局。实施造林政策等项内容与第一期同。第三期主要是对后藏的开发，设立后藏垦务总局于日喀则。其余项目与前二期同。

### （二）《西康省经济建设纲要》

1939年，西康建省后，针对康省地广人稀（当时每平方里平均不及1人），有丰富资源，为使西康经济发展，以利于抗战，川康建设期成会拟定了《西康省经济建设纲要》。

纲要共分九部分，（1）总纲：说明抗战期间经济建设之含义，西康经济状况之特征及经济建设应有之步骤。（2）抗战资源之开发：设立制硝厂、铁矿工业管理处、地质调查所，及土铜生产之协助。（3）抗战金融之充实：开设西康金矿局，指导金矿工程与改善矿工管理，奖励投资开发金矿。（4）衣着原料之扩充：棉业之推广与改进，蚕丝之改进与推广，创设手工毛织厂、制革厂，及畜牧改进事项。（5）粮食生产之增加：主要有调查本省荒地，办理示范垦殖，计划难民监犯移垦，奖励民

营合作农场，农作中心之树立（筹设西昌农场），设立果木苗圃及模范乳牛场。（6）民众住宅之改良：省会居住问题，农村居住问题，一般市民居住问题，建筑材料，筹设机械厂。（7）交通建设之急进：协力完成川康公路及筹办通车事宜，成康滇公路线测量工作并提前修筑西炉段，康泰公路之进行，飞机场之勘查，宁属铁路及其支线的踏勘，旧道交通之整理，畜力运输之改进等。（8）日用物品之制造：设立制材厂、碱皂厂，筹设制纸厂、陶瓷玻璃厂，及电气事业之调查与创办。（9）下层金融之调查。<sup>①</sup>

这一纲要是根据西康特殊情况制定的，较为详细，切实可行。

### 第三节 国民政府考察团对川康的调查

#### 一 国民政府及四川省政府考察团的调查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武汉，竭力谋求开发后方各省，以作为长期抗战之准备。“各边远省份，如宁夏、青海、西康、新疆诸省，亦各感觉其地位对于抗战建国之重要，纷遣代表，向中央接洽，而尤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氏为最热心，亲来武汉，表示愿邀各专家入康考察，根据其考察结果，以为将来施政之方针。”<sup>②</sup>于是，在1938年夏季，有了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的组织，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队，入康调查。社会科学部分由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之，自然科学分地质、畜牧、土壤、水利、生物5组，由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西北专家、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等合组之。社会学家柯象峰、民族学家徐益棠等人参加了西康科学调查团，参与西康民族的调查。柯象峰后写出了《西康纪行》，发表在《边政公论》上<sup>③</sup>。同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sup>④</sup>。

<sup>①</sup> 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7页。

<sup>②④</sup> 徐益棠：《十年来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sup>③</sup> 参考柯象峰：《西康纪行》，《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和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

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10多万元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聘请各大学教授担任团长、组长、专家等职，其中，有工程组、地理组、农林组、社会组、经济组、地质组<sup>①</sup>等。考察原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以嘉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一带，沿公路考察雅安、洪雅、天全、泸定、康定，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第二期以康定为中心，考察康定以西、以南及西北等地，以二个月至二个半月为期；第三期考察松潘、理番、茂县、懋功、平武、灌县，时间是一个半月至二个月<sup>②</sup>。但是实际只进行了三个月考察。

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由参政员21人组成，分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及西康5路，于1939年3月~7月间，经过100多天的调查。每组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为考察边区情况，研究边区问题，宣慰边区民族及改进边民生活”<sup>③</sup>，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20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除进行医疗、宣传外，对于当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等作了调查。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成《雷马屏峨纪略》，于1941年7月，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sup>④</sup>。1940年，还有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视察团，中央振济委员会的川北边地考察团等<sup>⑤</sup>。

由于川康被看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政府非常重视西康，组织了一些名为旅行团、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对康区进行调查。其中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了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一南至西昌，一北到西宁，分道视察。

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的康昌旅行团，以王家桢、王事干为正、副团长，由华侨参政员、政府各部会及各文化、经济、团体的人员组成，共

① 方壮猷：《凉山俅族系谱》，《边政公论》第4卷第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②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考察团简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印，1937年。转引自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③ 《四川省边区施教团组织办法》，1940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427卷，第44页。

④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⑤ 徐益棠：《十年来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有团员24人。该团“以考察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主要任务在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做开发之计划。”<sup>①</sup>考察路线由重庆起程，经过内江、自贡、乐山，沿乐西公路，经峨眉、富林、西昌等地，止于会理。考察团成员之一的朱契“于考察经济之余，掇拾途次游记，汇为一编”<sup>②</sup>，写成《康昌考察记》，于1942年9月出版。

青康考察团（又叫视察团）由行政院发起组织，团长王应榆，副团长成光耀，团员18人，由军政、经济、交通各机关所派。“该团任务为考察青康之富源及政情。”考察线路由重庆出发到康定（西康省府），分南北两路，至昌都、玉树、西宁等地。这两次对西康的调查“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sup>③</sup>

此外，教育部还主办大学生暑期边区服务团（后面有详细介绍），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理茂边区施教团，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合组的西南文化考察团（包括川康边境，以大小金川为中心地带）等<sup>④</sup>。

## 二 四川省政府对大小凉山的调查

1938年，四川省政府派出民政视察员易民苏、夷务考察员毛筠如两人，深入大小凉山夷区实地考察，因势利导，对于“增进夷人内倾好感，大都投诚归顺，夷汉渐趋融洽各项夷务工作，渐收成效”<sup>⑤</sup>。事后，易民苏、毛筠如写出了夷务考察报告书，作为四川省政府制定治夷计划的依据。随后，毛筠如又多次深入夷区，实地考察与宣导夷人，解决夷族之间、夷族与汉族之间一切纠纷，“收降历年叛乱马边之水普等四支悍夷，安抚恩扎夷酋，减少雷波夷患，协办屏山五支夷人总投诚，解决峨边全县骚然之夷务纠纷，消弭大木干家大举反叛马边而历月不能解决之大患等，”还选送三批夷族学生到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受训。他“在边区刻苦奋斗，导化夷人之精神，及其博得夷族中之信仰，实非寻常人所能企及。”根据他历年考察经验，自著或协著有《马边纪实》、《雷马屏峨纪略》、

① 边政资料：《边疆考察团体出发》，《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

② 朱契：《康昌考察记》自序，大时代书局，1942年9月。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④ 徐益棠：《十年来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⑤ 《四川省政府廿八年民一字第17081号呈文》，193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659卷，第15页。

《雷马屏峨夷务鸟瞰》、《大小凉山之夷族》等书<sup>①</sup>。

### 三 蒙藏委员会对川康少数民族的调查

抗战期间，蒙藏委员会<sup>②</sup>调查室组织了对四川、西康的多次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2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sup>③</sup>。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了《川西调查记》（1943年）。

《宁属洛苏调查报告》，是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的边疆调查报告之五，1942年4月出版。

“宁属”为“宁八属”的简称，即西昌、会理、盐源、盐边、越嶲、冕宁、昭觉、宁南8县，民国初年为川边镇守使辖地，继属四川省第18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宁属的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昭觉等县划归西康省。宁属四境，南北以金沙江及大渡河为界，东西以大凉山及打冲河为界。其东部与雷波、马边、屏山、峨边4县连接，大凉山在其境内，这里是傈罗（今彝族）的聚居区。

“洛苏”为彝文之译音，是彝族的自称。他称有傈罗、夷人、夷家等。是宁属的土著民族。洛苏分黑白两部分，俗称黑夷和白夷。此所谓黑夷和白夷，非以肤色而言，两部分人肤色并无差别。据蒙藏委员会此次实际调查所得，凡白夷区域之人民皆为汉化之夷人，当地称为“熟夷”；凡黑夷区域之人民，皆尚未汉化之夷人，当地称为“生夷”。白夷多能汉语，黑夷多不通汉语，故黑白之分，大抵以其汉化程度而言<sup>④</sup>。洛苏散处宁属各地，一部分统辖于白夷土司，一部分统辖于黑夷土目，一部分编入地方保甲，黑夷地方往往不使外人深入，故欲知其人口确数实非易事。据这次调查计算人口约250万人（过去的估计是200万），其中，白夷约占十分之三，黑夷约占十分之七。

洛苏的分布，“俨然成无数不规则之螺旋形。若以汉人之居住地为核心，则白夷之所居为此核心之外线，而黑夷又其外线也。……汉人之在宁属者，多居于城镇及交通要道，成点与线之状态。汉人之四周，多

① 参见陈炳光：《〈大小凉山之夷族〉序》，载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行，1947年。

②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最高机构，在第五章有专门介绍。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

④ 黑夷和白夷之分，除了汉化程度外，作者认为还有血统、地位及等级等的区别。

为白夷，白夷之四周，全为黑夷。……以此知汉人与白夷渐成混同之势，而黑夷尚独立自成区域也。”这是就洛苏分布的整体而言。若以地区论，“则宁属北部，洛苏极少；因大渡河以北即汉源县境，悉为汉人居住地带。其东南西三面，皆为洛苏聚居之地。东部洛苏以大凉山脉为中心，迤东及于四川之雷马屏峨等县。东南部洛苏以昭觉、宁南，沿金沙江之西岸一带为中心。南部洛苏以会理、盐边，沿金沙江之北岸一带为中心，其人口之稠密，达于云南境内。西南部洛苏以西昌、盐源间，循大雪山脉为中心。西部洛苏以冕宁、越嶲间，亦循大雪山脉为中心，人口之多，深入西康境。……其西南部两盐（即盐源和盐边）一带之夷人，除洛苏外，尚有摆夷（今傣族）、里索（今傈僳族）、摩娑（今摩梭）、苗、及白儿子等族杂处其间，惟为数甚少耳。”<sup>①</sup>

《宁属洛苏调查报告》有三章，第一章 宁属与洛苏（分宁属之地势、洛苏之沿革、及洛苏之分布三节）；第二章 洛苏之经济（有垦牧、林矿、工商、交通四节）；第三章 洛苏之社会（分为组织与制度、文字与教育、生活与俗尚、司法情形、武力与治安五节内容）。此调查报告，对于了解民国时期这个地区彝族的沿革、分布、社会及生活习惯等有重要价值，其中对于当时宁属彝族的分支及其分布记录尤为详细。

《川西调查记》，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于1941年组织的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进行调查后写成的报告，1943年3月出版。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边疆教育会秘书王文萱任团长，有中央、金陵、齐鲁、华西、协和、云南、武汉、四川等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康技艺专科等学校的教员10人、学生47人参加<sup>②</sup>。调查分为两队，一为川西队，由王文萱任组长，葛维汉为副组长，调查区域为杂谷脑河流域及岷江流域茂县至汶川一段，调查的民族主要是羌戎，调查内容有信仰、风俗、艺术、建筑、经济、语言等，历时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sup>③</sup>。另一队为西康组，以越嶲、冕宁为中心，进行考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十余万字的《川西调查记》。

《川西调查记》分为七部分，即羌人之来源、信仰（有祭白云石王、宅内所供奉之神祇、端公、禁忌）、建筑（包括住宅、磨房、碉堡、其他建筑）、婚嫁丧葬（有婚嫁习俗和丧葬习俗）、艺术（分服

① 《宁属洛苏调查报告》，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1942年版，第7~9页。

②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③ 《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印，1943年。



饰、头饰、其他艺术、附羌人歌曲词谱)、岁时、语言等七部分。这是关于单个民族的详细调查报告,是民国时期对羌族的详实记录。

《宁属洛苏调查报告》和《川西调查记》均是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记述集中,条理清楚,资料准确,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基本上是资料的简单汇集,没有更多的分析。

本章小结。川康两省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没有云南和贵州多。在第一类调查中,从调查种类和次数来说,云南为最多,共有5类10次。其次是贵州,调查有4类8次。最少的是四川和西康,只有4类7次。但是,川康两省很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宣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拟定宣慰纲要,如《四川省雷马屏峨四县宣慰边民纲要》和《四川省松理茂懋汶靖六县宣慰边民纲要》等,对边区的开发建设也十分重视。

由于川康两省被看成是中国抗战的根据地,中华民族复兴之地,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对川康两省的考察,因此,政府组织旅行团、考察团的活动较云南、贵州两省多。

纵观国民政府对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几省的调查,第一类调查基本相同,如西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等均为国民政府中央机构统一进行的调查。云南情况特殊,增加了一类“傣族调查”。

由于西南各省成立了各自的边政机构,其余两类调查是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开展的,调查内容各有不同。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 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研究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既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又深刻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边疆民族政策需要贯彻实行，因此，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措施，又是其民族政策的体现。本章重点研究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民族政策及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研究

治边政策主要包括：“陆疆政策、海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以及传统的治边思想<sup>①</sup>。

治边思想是民族政策的前提和思想理论基础，民族政策又是统治者治边思想的体现。研究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首先应该研究其调查研究的目的，即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即是国民政府治边思想的体现。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了国家就有了中央处理同周边民族关系的治边思想及民族政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治边思想。因为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四夷）聚居的地区，所以治理边疆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马大正、方铁、李大龙等教授提出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主要有：夷夏之辨观，夷夏之防观、以华变夷观、先华夏后夷狄、守中治边，以及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

民国时期的治边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变化。本节主要从民国时期与古代治边思想的不同方面进

<sup>①</sup> 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光明日报》2001年2月13日。

行探讨。

如第一章所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思潮传入中国，对民国时期的治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思想中，首倡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批评“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因而呈一片散沙之状。要摆脱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状况，就必须用民族主义作为基础，实现“五族共和”为核心的国内各族大融合<sup>①</sup>，这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族共和思想，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中华民族一体观、中华民族一元理论）、边疆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治边思想。

### 一 民国时期的民族观

民国时期的民族观经过了“五族共和”论到中华民族一元论的发展过程。

#### （一）“五族共和”论和中华民族的一体观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发表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布中华民国的成立。他在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人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统一。”<sup>②</sup>这是第一次正式声明五族共和论。

解读这一宣言，这里的“汉”指的是武昌起义时宣布独立的17省的汉族所聚居之地，即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省制的中国部分。所谓的“满”是东北地区满族的故地。“蒙”指的是蒙古族聚居的内、外蒙古。“回”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地区。“藏”是指的西藏。由此可知，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地域就是由这些原清朝的中国“本部”与“藩部”总合之地域。同时，新生中华民国的人民包括了生活在这些地域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

<sup>①</sup> 参考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82页。

<sup>②</sup>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6页。

孙中山先生认为：汉、满、蒙、回、藏诸族，在初本出一源，只以所居区域不同，遂各形成其特殊的语文和风俗。但经过数千年来各民族间的相互混合，相互陶熔，又复由异而渐趋于同。对于怎样实现民族统一问题？他提出“同化”，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即通过融合、同化五族，使之成为单一的中华民族。1912年9月3日，在宣布五族国民合进会创建宗旨的《五族国民合进会启》中称，“五族国民，固同一血统，同一支派，同是父子兄弟”，“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sup>①</sup>

随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具体办法之讲演中说：“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今日世界之中，是最强最富的民族国家，他们民族的复杂，就种族来说，有黑种、白种、红印度种，有几十种的民族；就国界来说，最多的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也有几十国的民族，是世界国家中民族最多地集合体……何以美国的民族不称英荷法德俄美几国的人，单称美利坚的人呢？诸君要知道，美利坚的新民族，便是合英荷法德俄几国的人同化到美国所成的名词。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到了美利坚之后，都合一炉而冶之，成了一种民族……便专称为美利坚民族。因为只有美利坚一种民族，所以才有今日光华灿烂的美国……像美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地民族主义，这样积极的民族主义，才是本党所主张民族主义的好榜样。”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今日就是要“仿效美利坚民族的规模，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sup>②</sup>

首先，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族一体观有其进步意义。他主张中国各民族本出一源，中华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相互融合，相互陶熔，又渐趋于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观点，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有其缺陷。因为中国除汉、满、蒙、回、藏五族外，还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所以后来孙中山先生也认识到“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sup>③</sup> 1919年以

<sup>①</sup> 孙中山：《五族国民合进会启》，转引自[日]松木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

<sup>②</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04～205页。

<sup>③</sup> 孙中山：《民九修改章程之说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7期，转引自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页。

后，孙中山就没有再用五族共和的概念。孙中山之所以只关注满、蒙、回（指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中国本部的回族）、藏等族，一是因为民国时期，满、蒙、回、藏居住的边疆地区危机严重；二是孙中山把居住于中国西南的苗、瑶、彝等族看成“已经同化了的”<sup>①</sup>民族，而且西南地区早就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下。

再次，孙中山提出的同化理论是以汉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

他坚持以汉族为中心，使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而成为一个中华民族。他说：“我们在今日讲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或者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经许久了，此时单讲汉族，不怕满、蒙、回、藏四族的人不愿意吗？说到这一层，兄弟以为可以不必顾虑。因为现在的满洲人附日，蒙古人之附俄，西藏人之附英，就是没有自卫能力的表征。将来提撕振拔他们，还是要依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就是拿汉族来做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都来同化于我们……所以说到中国将来无论是有什么民族参加进来，必须要他们同化于我们汉族。”<sup>②</sup>国民党在1923年1月1日的宣言中，说明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就是“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

这里孙中山仍然认为汉人的生活、语言、宗教、习惯要胜过其他少数民族，主张采取同化政策，用汉族去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使中国融合成为一个汉化的大中华民族。可见，他受大汉族主义和当时流行的美国“大熔炉论”思想的影响之深<sup>③</sup>，这是孙中山民族观的局限性所在。

## （二）中华民族一元理论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中华民族一体观，提出了中华民族一元理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说：“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sup>④</sup>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

① [日]松木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05～206页。

③ 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9期。

④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1期，1941年8月10日。

大会宣言第八项要求：“重边政，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sup>①</sup>

他们认为：国族等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被重新定义为是属于黄帝子孙的同一宗族。1928年5月3日，由于日军占领济南事件的发生，北伐停止。1929年5月3日，国民党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們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不谋报复，我们就不能算中国人！”在日本侵略我国的危机关头，将被当作汉族祖先的黄帝抬出来，并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提出了诸民族群体为“宗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宗族相互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因此这些宗族能共同对抗外敌。

后来，中华民族一元理论，作为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述到：五族不是各自的民族，而是原本有着共同血缘的宗族的集合体的单一的中华民族。认为中国各民族无种族、血统的区别，声称各宗族之间的差别仅是“由于宗教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实同为一个民族，并且为一个体系之种族。”<sup>②</sup>在对民族及边疆问题讲话中又说：“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非炎黄子孙，近世之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sup>③</sup>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的《民族政策初稿》中正式提出：“树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并向边民普遍宣传。”<sup>④</sup>

中华民族一元理论，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国族”（中华民族）同源，即中华民族来自同一祖先，并认为：中华民族本出一源，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之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只因为宗教和所居区域不同，遂各形成其特殊的语文和风俗。民国时期，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的时候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5年1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②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页。

③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0卷。

④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1431卷。

候，将被当作汉族祖先的黄帝抬出来，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的概念。国族同源理论对于团结中国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共同抵御外国侵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漠视中国各民族的存在。因为中华民族来自共同祖先是前提，因此就否定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存在，而代之以宗族的概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整个中华民族内，只存在许多宗族，否认民族的存在。这明显与客观事实相背离。

再次，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趋于一体思想。中国不同的宗族由异而渐趋于同，最终形成一大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因此，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形成一大中华民族。这里的中华民族概念是包含了各民族汉化为汉人的全体。

民国时期，许多学者也认识到，虽然边疆各族人民有着许多名称，可是详细分析他们的体质文化及其过去的历史，无一不与中原汉人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演进，逐渐与汉族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顾颉刚，他于193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sup>①</sup>一文，他从种族和文化的融合过程等方面进行研究，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其后，张廷休、费孝通、岑家梧等先生也先后发表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sup>②</sup>当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趋于一体的认识虽然与当今民族学界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提法不可类比，但已包含了多元一体思想的雏形。这个观点为费孝通先生接受，他自己承认：“‘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sup>③</sup>

最后，通过民族同化，完成建立大中华民族的目的。即由政府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倡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

①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周刊》第9期，《昆明·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② 参考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1944年4月。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代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逐渐统一边疆地区语文等措施，实现民族同化。这是政府的强制同化，并非各民族人民自愿。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的中国人概念等于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是融合、同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的一个大民族，中华民族概念是汉化为汉人的全体。这与中国共产党认为的中国人概念等于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构成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在承认56个民族的存在和多元性的基础上，将其集合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概念不同。<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民族观，由古代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观变为中华民族一体观，提出了中华民族一元理论，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但坚持用汉族去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其实质仍是大汉族主义的。蒋介石宣扬的中华民族一元理论，漠视中国各民族的存在，而代之以宗族的概念，抹杀了中国是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但是，在近代中国人民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贫弱的情况下，提出中华民族一体观念，有政治的目的。中华民族一元论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具有较大作用，应肯定其进步意义。中华民族一体观在当今处理台海两岸关系亦有现实意义。

## 二 民族平等观

中国自夏迄清王朝的统治都是以统治民族为尊贵、优越，被统治民族为卑贱、低下。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10多个朝代，夏族—华夏族—汉族大多是统治民族，其间仅有两个朝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前后有几十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区域性的民族政权。在夏族—华夏族—汉族统治的历朝历代，他们视本民族为尊，以其他民族为卑；视本民族分布区为“中国”，视其他民族为“四夷”、“边裔”，视其分布区为“化外”；对待其他民族“夷夏有别”、“先华夏后夷狄”，把其他民族比为“豺狼”、“犬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多用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名称大都用虫兽鸟及反犬旁等侮辱歧视的字，这完全是歧视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当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后，一样具有优越感，一样压迫剥削和歧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如元朝把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族列为一等；清朝时，“满洲为国家之根本”，以满族为

<sup>①</sup> 参考〔日〕松木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首为尊。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民族歧视和不平等观。

孙中山先生主张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宣告中华民国之国民，不论民族，一律平等，是为民族统一。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sup>①</sup>将民族平等用法律的形式写入约法。

同年9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发表讲演：“今后凡属蒙藏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皆得为国家之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之参政权”。绝不像“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俄国之于人民，奴隶视之，日本之于高丽，牛马视之”。9月3日，在五族合进会西北协进会欢迎会上说：“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的问题，亦同时解决。”又说：“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以共赴国家之事，兹望以五大民族合作之力量，保障人类最大的幸福，建立世界光荣之伟绩，以维持世界人类的利益，以求进于世界大同。”<sup>②</sup>

国民党在1923年1月1日宣言中称：“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sup>③</sup>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正式宣布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宣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sup>④</sup>。所谓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是就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关系而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就国内各民族之关系而言，体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的主张。<sup>⑤</sup>

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③ 转引自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1985年，第26~27页。

⑤ 参考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0页。

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对民族主义有进一步阐释，在所著的《三民主义纲要》中说：“我们的民族主义，对外保持我们整个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不得使那一部分受人侵略。对内要谋平等自治的发展，不许民族间有谁压迫谁的事实。”可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仍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思想，并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重要内容。

在《民族政策初稿》中规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sup>①</sup>。1943年，又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具体说明，国民政府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宗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予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思想还载入中华民国的约法和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47年，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也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sup>②</sup>写进宪法。

当然，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各民族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民族平等只是流于表面和文字。但从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不平等，到国民政府提出中国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对近代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有重要的作用。

### 三 边疆观

中国的边疆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它随着中国疆域的变迁而变化。中国古代的边疆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的，而且对边疆地区多有忽略。中国古代的治边思想是“先华夏后夷狄”或“内诸夏而外夷狄”及“守中治边”。“先华夏后夷狄”或“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观念，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就有清楚的记载。《尚书·禹贡》的“五服”、《周礼·夏官司马》的“九畿”、《周礼·职方氏》的“九服”，以及《礼记·明堂位》记周公朝诸侯四夷之事，都明显反映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思想观念。夏朝的这种“内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宗（2）1431卷。

<sup>②</sup> 《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1985年，第178、443页。

外”、“先后”的思想，一直存在于以后汉族建立的各个朝代。历代统治者以为统治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即“守中治边”。

民国时期的边疆概念，当时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有三种含义：一是地理的边疆，二是政治的边疆，三是文化的边疆。地理的边疆是指我国领土陆地上与他区毗邻的地带。政治的边疆是指在某些边疆区域，有所谓蒙旗、土司、伯克、政教合一等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原的省县两级的地方行政制度。文化的边疆是指国内某些民族在语言、风俗、信仰、一切生活方式上不同于中原汉文汉语、农耕、无固定宗教信仰的民族居住地区而言。<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边疆主要包括“东三省、外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康、西藏等地，即以旧有的18行省为内地，余则以边疆目之。”<sup>②</sup>可见，民国时期的边疆、边区概念，更多是指政治的边疆和文化的边疆，如西康、青海等，从地理上看，不属于边疆，但是国民政府将他们看成边疆。

虽然边疆与中原关系肇自远古，但对边疆问题作系统的调查研究，重视边疆，对于边疆建设作较积极的推动，是从20世纪30~40年代才开始的。

民国时期对边疆的重视与中国边疆危机有密切关系。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国面临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东部海疆，美、日侵略台湾；在西北边疆，英俄对新疆进行侵略和争夺；在西南地区，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和英法不断地侵略云南，边疆问题开始日益严重。

民国建立至1930年，中国边疆危机仍相当严重，“外蒙早已苏化，政治经济诸端，早为苏联政府所支配；土西铁路方告完成，新疆益见威胁；而黑龙江兴安岭以西，苏联正陈兵示威，凶焰正炽。日本努力争逐，投资于两线（南满路与吉会路）两港（大连港与罗南港）之建筑；利用韩民，移民延边反客为主，有取而代之之势；而南满沿线煤铁农林之经营，势其锐猛，野心日渐暴露。康藏时起纠纷，而尼泊尔又复有内犯之状态；滇北之界约未定，而滇南矿产问题又渐趋严重。各国利用我国内部多事之机会，益复肆其侵略，于是边疆更岌岌不可终日矣。”<sup>③</sup>

① 参考张汉光：《边政往何处去》，《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边政公论》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3月。

②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③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其时，由于国内战争不断，当时的政府对边疆问题既无法重视，也无暇筹边。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全国上下才进一步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开始重视我国边疆。“九一八事变”以后，“西南之纠纷未已，初则因英印之挑拨，而发生康藏之争，继之以青藏之争，回康之争，川康之争，康事益复紊乱。西北，初则因考察团而发生中法学术界之争执，继则因政治问题而发生金马之冲突，终则因国际之牵引而造成南疆之独立。云南则班洪事件之扩大；海南则西沙群岛之被占。而内蒙复于‘东北问题’未解决之前，忽要求高度自治。”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凌纯声先生在《中国边政改革刍议》一文中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其原因虽多，然首先发难于我国东北，则中国边疆问题，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斯言亦不为过。”<sup>①</sup>所以“自东北事件发生以来，一日而蹙地千里，国人视线所集，益觉边远省区建设之急切与重要。”<sup>②</sup>

以往，论及边疆问题者，将其原因归为是帝国主义者之挑拨，其实边疆地区发生的少数民族事件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1932年10月~1933年3月，广西兴安、全县、灌阳、龙胜等处瑶民两次发生变乱；1933年1月~8月，云南丘北侯保全、王相等发生反抗斗争；1936年6月~1938年1月，湖南永绥苗民发生抗租事件，“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sup>③</sup>。因此，政府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边疆问题，再不自谋解决，而努力建设边疆，则不仅我国之未来边患，必尤甚于往昔，且下次世界大战，又将爆发于中国。从前我国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此次战争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sup>④</sup>

国民政府重视边疆地区，有一个从重视西北到重视西南的发展过程。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西北的开发。3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

①④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②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1931年11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22页。

③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都。同时筹备西京委员会，以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建设进行了一些规划，如《开发西北计划》、《开发西北案》、《救济陕甘案》等。<sup>①</sup>

西北的重要性主要是：第一，国防的战略重要性，当时苏、日、英三国对西北均有所图。第二，西北资源开发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西北的物产极其丰富，对此的开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文化上的重要性，西北是黄帝开国之地，有着5000年光辉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主要的交汇点。1932年，国民政府的民族复兴运动开始了，民国时期要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就要开发西北<sup>②</sup>。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开发建设西北的热潮。

但是，国民政府对西北的重视和开发，只是权宜之计。1935年，当国民政府完成了统一西南的任务后，就把西南看成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尤其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再迁重庆，西南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将注意力和发展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强调西南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掀起了对西南边疆调查研究的热潮。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的重视，不仅因为西南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而且西南地区与英美的势力范围毗邻，这比与苏联接壤要安全得多。

总之，民国时期的治边思想同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相比较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变化主要有：第一，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观变为中华民族一体观，提出了中华民族一元理论；第二，由民族歧视和不平等观变为民族平等观；第三，由“先华夏后夷狄”或“内诸夏而外夷狄”及“守中治边”思想变为对边疆地区的重视。这是政府重视西南边疆地区，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思想来源。

<sup>①</sup> 葛飞：《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潮》，《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考[日]松木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边疆地区大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对边疆的重视还反映在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上。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是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沿袭和发展，是民国时期治边思想的体现。

国民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边疆民族曾表示过注意，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较集中的表述是1941年4月，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sup>①</sup>。

另外，国民政府内政部也拟具了《民族政策初稿》<sup>②</sup>，分为一般的原则和个别的办法两部分。第一部分一般原则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原则，拟定实施办法有11项：（1）消弭各民族间狭隘的民族界限；（2）培植各民族自治能力；（3）促进边区文化经济建设；（4）提倡内地人民与边民通婚；（5）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地及边地人民移住内地；（6）推行国语逐渐统一边区语文；（7）树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并向边民普遍宣传；（8）辟所谓“少数民族”问题之谬妄，并向边民普遍宣传；（9）宣传各民族利害共通关系，增强各民族向心力；（10）普遍实施国民教育，激发边民国家意识；（11）普遍实施卫生教育，增进边民健康。

第二部分个别的办法，针对蒙、回、藏等不同民族提出不同的民族政策。甲、对于蒙人：（1）外蒙：劝导外蒙取消自治、招抚外蒙王公贵族、对外蒙来归青年加紧实施党化教育。（2）内蒙：积极扶植内蒙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加强盟旗与省县之团结。乙、对于藏人：加强藏人与内地之联系、消弭藏人内部之纠纷、宣传三民主义。丙、对于回人：宣传维吾尔人为中华国族构成分子、消弭内地回人种族观念，严办种教之分。丁、对于边区其他土人：宣传民族平等原则，取缔欺压土人之行为与制度，增进土人聚居区域设治工作，积极实施国民教育，提高边区土人知识水准与国家意识，促进边区土人生产事业。

综合国民政府历次代表大会及其民族政策初稿，总结民国时期的边

<sup>①</sup>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1431卷。

疆民族政策，简言之就是：民族平等，民族同化，培植各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

### 一 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以三民主义为指导

国民党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其立国建国的根本，故对于边疆民族政策，亦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实行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边疆民族政策。这一点在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本党致力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除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sup>①</sup>表述的尤为明显。蒋介石在其统治时期，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严重的背离，但是表面上，他仍以三民主义为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 二 中华民族一元理论是边疆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一元理论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五族不是各自的民族，而是原本有着共同血缘的宗族的集合体的单一的中华民族。认为中国各民族无种族、血统的区别，声称各宗族之间的差别仅是“由于宗教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实同为一个民族，并且为一个体系之种族。”<sup>②</sup>“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非炎黄子孙，近世之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sup>③</sup>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的《民族政策初稿》中正式提出“树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并向边民普遍宣传。”<sup>④</sup>

### 三 民族平等是边疆民族政策的原则

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sup>⑤</sup>将民族平等用法律的形式写入约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①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②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页。

③ 蒋介石：《民族及边疆问题讲话》，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6020卷。

④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1431卷。

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1947年，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也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sup>①</sup>写进宪法。

民族平等的原则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扶助其发展

如前面所述，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说明国内各民族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三条规定，“其次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助之，使之能自决自治。”<sup>②</sup>因为边疆地区环境特殊，凡事均较内地落后，若一任边疆各民族以本身力量自求发展，成绩当比较渺小，因此，必须由中央力量来扶助之。

（二）团结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

国民党1923年1月1日宣言中说：“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亦说：“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sup>③</sup>均说明民族主义之最终目的，是在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完成大中华民族之建设。

（三）尊重并融洽各民族之宗教习俗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形成有五个要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地理及历史文化不同，民族间的风俗习惯也不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中“对于各该地风俗习惯之记载，须和平诚恳，不可有助人恶感之文字，在可能范围内必须以新旧思想的融洽为要领。”<sup>④</sup>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也有“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

（四）改正少数民族称谓，以显示民族平等

国民政府从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所得结果发现，西南地区民族名称繁杂，多达200余种。历史

① 《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1985年，第178、443页。

②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民年鉴》，新亚书店1928年版。

③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④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1931年11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22页。



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多带有歧视和侮辱性，如“苗”、“蛮”、“夷”、“猺”、“猓”、“獐”等称谓，所用的字大都是虫兽鸟及反犬偏旁，这是过去历代统治者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为体现国民政府的民族平等原则，1939年8月，对少数民族的一般称谓问题，国民政府作出了规定，“将含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正，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则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者，可称西藏人，其他杂居于各省边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称为某某省边地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sup>①</sup>明令禁止再用苗夷蛮猺猓獐等少数民族名称，概以其生长所在地人称呼。

同时规定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起见，“应将原有名称一律予以改订，以期泯除界限，团结整体中华民族。”<sup>②</sup>1940年1月，经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开会商讨研究，制定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共收入西南地区66个以虫兽鸟偏旁命名的少数民族名称，依据下列原则进行改正：第一，凡属虫兽鸟偏旁之命名一律去虫兽鸟偏旁，改从人旁。第二，凡不适用于第一项原则者，则改用同音假借字。第三，少数民族称谓，其根据生活习惯而加之不良形容词，如“猪屎佬”、“狗头瑶”等之“猪屎”、“狗头”等应概予废止。改正命名一律注有拼音，并在原命名表后附记有该族分布地域等<sup>③</sup>。

此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0年10月下发，令遵照执行。其后西南各省对于本省民族名称才较为规范，如云南省在1946年出版的《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所载云南少数民族的名称，不再有虫兽鸟及反犬旁等（如猺人）字样，全部改为亻字旁，不再用歧视性的民族名称。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识别。

当然，民族平等虽然写进了中华民国约法，写进了宪法，在国民政府的诸多文件中也随处可见。但是，这只是表面和流于文字，在国民党

① 《国民政府渝字第470号训令》，1939年8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58页。

② 《云南省政府秘内字第2883号训令》，1940年1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131页。

③ 《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940年10月1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135~165页。

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各民族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而且民族平等只显示在民族名称的改变，而非权利。

#### 四 民族同化是边疆民族政策的方针

要形成一大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同化手段。于是，在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中，提倡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逐渐统一边疆地区语文等措施。<sup>①</sup>由政府实行民族同化。

为此，各地制定了关于民族同化的计划和大纲，如1937年2月，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拟定了《贵州省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同化苗胞计划大纲》。1937年4月，贵州省政府会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拟定并颁布了《贵州省各县土著民族同化工作纲要》。这些计划大纲均由政府强制实行，强迫同化。

#### 五 政治上培植各民族自治的能力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政权在民的政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人民对于政治有明确的认识，并能充分运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内，以筹办自治为根本办法，以县作为自治单位，一方面调查人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务，修筑交通；一方面教育民众，训练民众。边疆文化本来较之内地就为落后，一般民众对于政治之了解，亦较内地低。故训政过程在边疆地区尤为必经之阶段。换言之，边疆各地应以筹办自治为实行民权主义的根本之图。

国民政府认为边疆政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培植各民族的自治能力，“对于边疆各民族，其一切设施应以扶植自治能力，改善生活文化，以完成自治之基础为目标。”<sup>②</sup>怎样培植各民族自治能力？国民政府认为发展边疆教育为其重要一途，因为教育乃提高人民智能水平最大之力量。

同时，应尽量任用边疆人才。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族政策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1431卷。

<sup>②</sup>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中要求：“中央各重要机关须注意于录用边远各地人才。”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政府应培养边地人才，俾中央各机关得充分任用边地出身之人员，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又规定：“各边疆地方政府及各级边政机关，应适应环境情形，尽量以任用各民族地方人才为原则，其优秀者应特予选拔，使其参与中央党政，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就是说，尽量任用边疆人才，不仅中央如此，边疆各级地方政府亦如此。尽量任用边疆人才从行政效率方面而言，可以收集思广益之功效；从准备实行民权主义方面而言，则使边疆各民族有同样参加政治的权利，得以提高其政治能力。

## 六 经济上开发建设边疆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条规定，“建国之要首在民生，故对于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sup>①</sup> 边疆各族人民生存条件艰苦，经济落后，生活较差。边疆的开发建设，也就是要解决边疆各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改善其生活，实行民生主义的边疆政策。民生主义的边疆政策包括五个方面内容：

### （一）边疆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

中国边疆地区地旷人稀，资源丰富，但与内地相比生产力低下，经济十分落后。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案第五条提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又于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内称：“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实人口开发土地为首先要着，而以其他建设为辅。”<sup>②</sup>

### （二）发展边疆固有之生产事业

要改善边疆人民生活，必须设法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之道，应选

<sup>①</sup>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民年鉴》，新亚书店1928年版。

<sup>②</sup> 参考《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10、22页。

择其环境所宜，当地固有而为人民所熟练者，努力改进之，当可事半功倍。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称：关于边疆各地之“经济建设，应取保育政策，于其原有之产业与技能，应尽量设法使之改良，俾人民能直接获益。”<sup>①</sup>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对于边疆人民原有之各种生产事业，政府应予资本及技术之协助。”<sup>②</sup> 边疆固有之生产，大半为畜牧，其次为农林、为织造，只因为其资本缺乏，技术落后，进步不大。故若欲使其发展，国家就要在资本和技术两方面予以支持，实为根本之图。

### （三） 建立边疆地区的经济重心

应以中央力量选择边疆适当地方建立边疆经济重心。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请求设立青海畜牧实验区之决议。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于适当地点内，中央设立大规模之畜牧垦殖及毛织皮革等企业组织，并奖励边民经营。”又“逐渐增设边疆各地金融机构，以助工商事业之发展。”在边疆地区一则设立大规模的企业组织，一则增设金融机构，这两条对于经济重心的建立，至为重要。

### （四） 充实劳力，开发土地

劳力、资本、土地三者为生产的要素，缺一不可。有土地有资本，而无劳力可用，则土地资本均等于废物。我国边疆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劳力缺乏，致使边疆大量土地未能有效利用。政府既然已计划在边疆地区设立企业组织及金融机构，并将在资本上予边疆人民以协助，资本问题当可解决。惟劳力一项若不设法增加，就不能推动边疆经济的发展，故充实劳力乃为开发边疆的重要措施。

而增加劳力最有效的办法是移民实边。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曾有移民到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sup>③</sup> 的指示。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案第五条指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必须订立方案积极进行，并予以财政及其他必要之援助。”随

① 参考《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154页。

②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③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544页。

后，向边疆地区移民垦殖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

#### （五）开辟边地交通

交通为国家之动脉，是货运通畅，文化传播，国防巩固，民生改进的重要工具。我国边疆穹远，幅员广大，正是由于交通闭塞，与中原及内地的长期隔绝，造成了边疆的落后。民国时期的交通工具，多是利用人力与畜力，一封信往往经数月始达，其他运输方面的艰难，可想而知。同时交通影响政府政令之推行及人民生活，更是深刻。故边疆交通之开辟，实为建设边疆之急务。

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的讲话中，提出要修筑铁路，认为“修筑了铁路，到处联络起来，中国粮食便可以四处交通，各处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所以铁路也是解决食饭问题的一个好方法。”<sup>①</sup> 边疆地区的交通如何开发，其线路如何，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有详细的厘定。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内有：“迅速开辟边疆主要之公路铁路”的规定。

上述开发建设边疆的措施，目的在于改善边疆人民生活，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 七 文化上发展边疆教育，提高边民文化

边疆地区由于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要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提高其文化，只有重视边疆教育。这里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又称为“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苗夷教育”、“苗民教育”等，即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边疆教育的目的是推行“国语”运动，统一边区语文，使少数民族实现汉化。

国民党在三届二中全会关于蒙藏之决议案中决定：“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又在发展教育之要点中“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筹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实行普及国民教育，厉行识字运动，改善礼俗，使其人民能受三民主义之训育，具备自治之能力。”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中提出：“尽力发展边地人民之教育，在中央及邻近边地之文化发展地方，由国家设置完善之补习学校，以谋其升学之便利。各大学专门学校，应特别优待边远地方之学生。而各边远地方之教

<sup>①</sup> 胡汉民：《总理全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59页。

育，更应由中央宽筹经费，特别提倡，以求其迅速发展。”

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要求：对于边疆“民族之教育，中央应切实制定妥善方案，而努力以谋其发展，国家对于各族之教育，必须宽筹经费，确立预算。”<sup>①</sup>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更明确规定：“改进并扩大现有边疆教育机关，以培植边疆人才；于适当地点设置必需之各种各级专科学校，并设置各级师范学校，以期造就边疆各种人才，以应建设之需要；特设边疆语文编译机关，编印各种民族语文之书籍及学校用书；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sup>②</sup>

对于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规定，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各级政府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这些都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详细内容在下一节将有介绍，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提出的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一体观等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中进步的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给予高度的评价。<sup>③</sup> 但国民党实行的是封建专制统治，虽然名义上主张民族平等，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间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而且，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间较短，其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到20世纪40年代，“尚有人认为（国民党）中央对于边疆，迄今犹未建立一确定之政策者，此实为已定边疆政策，未能见诸实施，而引起之误解，”<sup>④</sup> 有的也只是一纸空文。

国民政府提出中华民族一元理论，妄图抹杀各民族间的差别，代之以宗族的概念，这是不对的。边疆民族政策中主张民族同化，而且是政府的强制同化，这必然遭到边疆人民的反对。

<sup>①</sup> 参考《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23、154页。

<sup>②</sup>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民族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sup>③</sup>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页。

<sup>④</sup>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措施研究

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措施，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措施主要有：在西康建省、对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移民垦殖、发展边疆教育等方面。

#### 一 西康建省

民国初年，裁撤了清代的府、厅、州建制，保留了省、道、县三级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道制，实行省、县二级。西南地区云南、四川、贵州等省早就建立了省级机构，只有西康建省经过了较长时间和复杂的过程。

西康为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的结合部，这一地区是西藏与内地联系的门户，为四川之屏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康设置行省是国民政府加强对康藏地区统治的重要措施，是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主要举措。

##### (一) 西康建省的酝酿

清朝末年，清政府先后在西北、东北、蒙古及西南边疆地区推行以改革边政、充实边防、建设边区、建立行省为主要内容的改革<sup>①</sup>。光绪年间，新疆建立行省。东北设立奉天（1929年1月改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sup>②</sup>西康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建省。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英人进逼，康藏危机日趋严重。1905年，“巴塘事件”发生，清政府派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继祺就近出关“剿办”。平定动乱后，清政府感到藏事棘手，川边多事，所以决定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以川滇边务大臣名义，经营西康地区前后5~6年，其主要的功绩有：第一，改土归流。他用武力收取各地土司之印，设官治理。先后将巴塘、里塘、德格、高日春科、孔撒麻书、灵葱、白利、章谷、单东、鱼科、东科、卓斯、罗科、纳夺、巴底、巴旺、鱼通、明正、江卡、乍丫、察木多、八宿等地土司改土归流。<sup>③</sup>第二，划明康、藏地界。过去世人只知有藏，不知有康，以为由四川入藏，一出川境，就是

①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②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433页。

③ 参考傅嵩焘著，陈栋梁重刊：《西康建省记》，中华印刷公司1932年版。

藏域，而不知川藏之间还有三千里的辽阔地域。赵尔丰及傅嵩焘上奏拟建西康省的范围是“东到打箭炉（今康定），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sup>①</sup>也就是说四川之打箭炉（今康定）以西，丹达山以东为西康地域。第三，收回康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政府为表彰“圣德”，将西康的一些地方赏赐给了藏人，后来有的地方又被藏人占领。赵尔丰入康以后，次第收回了江卡、贡觉、桑昂、杂瑜、瞻对等地。第四，筹边善后。用兵固然重要，而善后事宜尤为重要。赵尔丰在被任命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筹边办理善后，并与四川总督锡良商拟应兴办开垦荒地、创办学校、安设电线、修建台站、考察矿产、测绘地图、清查户口、训练精兵、注意边圉<sup>②</sup>等事务。于是在西康兴学校，办实业，取得初步成绩。

经赵尔丰和傅嵩焘二人惨淡经营，西康已渐具行省规模，遂由傅嵩焘拟定西康建省方案，建议清廷将西康正式改设行省。此奏未到达北京，武昌起义爆发，西康建省暂被搁置。

## （二）西康正式建省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不设省的地区仍采取特殊的统治制度，在京兆（顺天府）、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西康）设五个特别行政区<sup>③</sup>。但川边特别区设官分职不断变化，1912年在川边设经略使，任命尹昌衡为经略使，规划设治，管理行政<sup>④</sup>。1913年，西康改隶川边特别区域，各府厅州一律称县。1914年1月，北洋政府令设川边镇守使，其职权为管理川边军政和民政，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后由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等先后继任川边镇守使<sup>⑤</sup>。1924年，四川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禹九）来康主持政局，但未能真正办理川边事务。

1927年，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接管西康。1928年8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以建国大纲仅有省治，并无特别区之规定……训政开始，自应将特别区域次第改省，以昭化一。”<sup>⑥</sup>要求将西康、青海、热河、察哈尔、

①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0~921页。

② 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234~238页。

③ 林炯如、傅绍昌、虞宝棠：《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0页。

④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⑤ 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7~38页。

⑥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47页。



绥远等特区改为省。是年底，国民政府先后设置青海省、宁夏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并把甘肃的一部分划归宁夏省。但西康由于形势复杂，当时藏军仍在向西康进攻，暂时未能组织省政府。

1929年，成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办理西康一切政务事宜，并拟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暂订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简章”。简章规定：“本军兼管西康特别区域……于西康政府未成立以前，特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直隶军长，商承边务处，处理全区民政事务。本会为总理西康全区政务机关，对于全区行政官吏均有监督指挥之权。”<sup>①</sup>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成为当时西康最高政务机关，采取委员会制度。

1934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西康省政府未成立以前，设西康建省委员会，执行所属地方一切政务”，以从事筹备。“该会直隶于中央，其经费由中央补助之。”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等7人为委员，并指定刘文辉为委员长<sup>②</sup>。在《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列举了建省的七项大事：即交通的开发，资源的调查，疆界的厘定，地方制度之决定，教育方针之决定，自卫能力之培养，各地人才之延揽<sup>③</sup>。此后，对西康建省的各种规划和调查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经与四川省政府协商，呈请国民政府同意，将四川省的雅属、宁属14个县2个设治局划归西康，西康成立省的条件成熟了。1939年1月1日，宣布西康正式建省。

西康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十分紧密。国民政府在西康设省，在藏区与内地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打破了英帝国主义将西康地区划入他们所设计的“大西藏国”的阴谋，对于抵制英帝国主义的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西康东界四川，南接滇缅，北连青海，西邻西藏，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国民政府在此建立行省，进行管辖，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抗日战争中，西康与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被看成是国家民族的复兴之地，对于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① 梅心如：《西康》，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102~104页。

②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47页。

③ 《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2页。

## 二 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

### （一）民国时期的边政制度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国时期沿袭清朝的边政制度。当时主要的边政制度有盟旗、土司、政教和部落四种<sup>①</sup>。

在昔日外蒙古、乌梁海、科布多三地，及当时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兴安、辽北六省，为盟旗分布的主要区域。此外在吉林、青海、新疆等边疆省份，亦有若干盟旗存在。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始于元朝，完善于明朝，清朝因明旧制。民国时期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地区，仍为土司制度分布之主要区域。

政教制度，是政治与宗教的合一，政治上的领袖，同时又为宗教上的教主。在我国边疆区域内，喇嘛教势力所及之地，常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内蒙古、青海、康西（即西康在金沙江以西之地）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均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部落为同一语言文化人群之团体，其生活为游牧或定居。民国时期尚有许多部落，散处西南与西北边疆各地。按其所在地域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腹地部落，或被征服，或渐涵化，其原始的政治组织，完全消失，仅保存其特殊的语言文化，如民国时期散处西南各省的苗瑶等族。二是近边部落，保存其政治之原始组织，但有时亦受政府爵命，而称土官，但听官不听调，如大小凉山之“保罗”部落，青海、西康两省间的俄洛部落。三是远边部落，远处边徼，昔所谓不服王化者，显著之例，如滇西葫芦王地的“野卡”部落，野人山中之“野人”部落。

上述四种边政制度，具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这些制度都是在我国边疆地区实行的特殊统治制度，是中国古代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的体现。二是统治者多系世袭或为转世。三是所辖土地均实行公有制度。四是被统治的人民多数视为世民，行动不得自由。这些“边政制度，名称虽异，而实质上大同小异，大都停滞于部落封建神权政治各阶段之上。”<sup>②</sup>

### （二）民国时期的西南土司

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对土司情况进行调查，如1929年和1939年的土

<sup>①②</sup>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司调查。《中国民族史》一书认为：到宣统三年（1911年），大部分土司皆被改流，只在云南、四川偏远地僻之处还有部分土司未改流<sup>①</sup>。但调查得知，在当时的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5省，仍有土司存在。

云南约有大小土司、土弁100余人，从土司分布情况看，按照东南西北排列，土司分布在巧家、广南、文山、玉溪、蒙自、石屏、建水、江城、思茅、六顺、景谷、镇越、佛海、南峽、车里、镇康、昌宁、澜沧、沧源、耿马、瑞丽设治局、潞西设治局、梁河设治局、陇川设治局、盈江设治局、龙陵、保山、莲山设治局、泸水设治局、兰坪、中甸、德钦设治局、鹤庆、丽江、宁蒗设治局、永胜、武定，共37县或设治局<sup>②</sup>。土司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的边境沿线，即当时的中（甸）维（西）沿边、腾永沿边、澜沧沿边、思普沿边和河（口）麻（麻栗坡）沿边5个边境地区。较著名者有滇西十土司，其中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均在十土司之列，它们都是名实俱存的土司，滇南以车里宣慰司为最大。

四川20个县有土司30余处，另外有百户土目若干<sup>③</sup>，主要分布在平武、松潘、理番、茂县、汶川、懋功、西昌、昭觉，越嶲、盐边、天全、盐源、会理、雷波等少数民族聚居县。集中在川西北及川西南，最大者有宣慰使，如梭磨、瓦寺二土司，小者有百户土目。四川土司情况见附表17<sup>④</sup>。

西康分为宁雅康三部分，康属之土司土目，共有77处<sup>⑤</sup>，有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正千户等职，其中以明正土司、巴旺土司为著名。西康宁属即原四川宁远府地，辖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昭觉、宁南、盐边8县及宁东一设治局，上自土司，下至土目，有45家<sup>⑥</sup>，其中较著名的如越嶲之邛部宣抚司，盐源之木里安抚司，其余多为长官司、千户、百户等小土司。雅属大都是汉族，只有宝兴县有穆坪土司。

①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

② 见附表6。

③ 《四川省所辖土司名称表》，1931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43~45页。

④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7~260页。

⑤ 根据西康政务委员会统计调查，见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366页，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140~148页。

⑥ 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1944年2月

贵州省境内多山，汉夷杂处，清末时就大多改土归流。民国初年，又陆续将土司裁废，到1929年土司调查时，这里已经没有土司制度存在。

从民国时期西南土司存在的情况看，可分名存实亡、名废实存及名实俱存三种。四川汶川县瓦寺宣慰司及云南澜沧江以内的大部分土司，因接近内地，属于名存实亡，他们对于土民不能征役与派款，亦无司法权。巴旺宣慰司属当时西康丹巴县管辖，清末虽已缴印改流，但却是名废实存，其政治系统仍旧，土司1人，下有大头人6人，分管地方事务。云南澜沧江以外的土司，如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耿马宣抚司均为名实俱存的土司。

从民国时期土司的品秩来看，由于清朝实行分土降袭政策，各省土司大都品秩较低。以云南省为例，“各土司职务亦有官秩地位较高者，为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但为数较少<sup>①</sup>。1939年，云南共有109处土司，其中宣慰司、宣抚司、副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13处，约占云南土司的12%。此外，文职有土知府、土同知、土知州、土通判、土舍等，武职有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土目等官占了88%，可见保留的土司绝大多数是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而且各省土司土官，一般辖地较小，职别较低。

### （三）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封建遗制，民国建立后，人们一直要求废除土司制度。国民政府“内政部成立后，认为土司制度，不特不合现时行政组织，亦且违反现代潮流，更以各省土司，坐享厚糈，剥削人民，迭据人民呈控土司，欺压案件，不一而足……对于改土归流政策，亟应力求实行。”因此，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制定土司调查表，要求有土司的各省切实查明，依式填报，并拟具改革意见，以供参考。其目的是“欲调查现实情况，以为改革张本。”随后在1930年、1931年间，又迭饬仍存土司制度各省，切实厉行改土归流，“并于20年（即1931年）8月间，呈准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嗣后各省政府如有呈报土司补官袭职之事，不再核准。”<sup>②</sup>改土归流仍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这表明国民政府废除土司制度的决心。

“土司制度原系封建时代之一种特殊行政组织，依现行制度，各省

<sup>①</sup> 《云南行政纪实》第二编，《边务—土司制度》，1943年，第2页。

<sup>②</sup>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251～260页。

省政府以下，仅有县、市政府及预备设县之设治局，此项土司制度，亟应废除。”<sup>①</sup> 因此，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土司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边远省份尚未设置县治地方，或因种族居处不同，或因文化经济落后；依其人口财赋及地方各种状况，未达到设县程度，亦应设置设治局，以为渐次改设县治的基础。”<sup>②</sup> 并颁布了设治局暂行条例。同时，国民政府要求有土司的各省政府拟具改革土司意见。为此，西南各省都制定了改革土司的计划。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重要门户，民国时期，在云南沿边漫长的国境线上，国防力量薄弱，还需要土司号召当地人民，团结共御外侮。而且，一旦大规模改土归流，“土”与“流”矛盾激化，必然导致边疆动荡，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而极少数土司也会引狼入室，用帝国主义的势力对抗改土归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稍有不慎，将引起边疆危机<sup>③</sup>。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抗战物资的交通线，太平洋战争后，云南又成为中国抗日前线和战略反攻的主战场，云南边疆的稳定关系国家民族的安危。

而且，“边地人民服从土司已成习惯，而近年以来各土司因教育文化之熏陶，知识增进，对于国家思想、政治意识均能了解，咸知服从中枢，拥护政府。偶遇外力之侵袭，尚能率领民众设法抵御，倾心向内，克尽守土之责。在此国防设备薄弱时期，土司既为一般边民所信服，尚须赖其号召团结共御外侮，似难遽为废除……”，“故对于边务之一切措施，不能不就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民，倾心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sup>④</sup> 因此，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对云南土司以务实态度，采取了较为切合云南实际的改土归流政策和办法，即“缓进”政策和“设流而不改土”的办法。

早在民国初年，根据云南实际，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镇守使李根源提出“经营土司急进、缓进二策”。云南地方政府最后选择了“缓进”之策，“谓急于改流，转多顾虑。不若为之更化善治，以守

<sup>①</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300号咨文》，1931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38~39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683号咨文》，1930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41页。

<sup>③</sup> 王文成：《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sup>④</sup> 《云南行政纪实》第二编，《边务—土司制度》，1943年，第1页。

潜移默化之功。乃设弹压委员，先从事于审理诉讼、设立学校、振兴实业、筹办警察诸端。使土司地方，渐与内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sup>①</sup> 这就是“渐进”的改土归流政策。

1929年后，云南省拟定土司改革意见，仍沿袭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办法为“设流而不改土”，即“原日土司头目名称，概仍其旧，但须受流官节制指挥。”<sup>②</sup> 按照内政部改革土司的办法，在边疆民族地区，未达到设县程度的地方，应设置设治局，作为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以为改设县制的初步设施。民国时期，云南省先后设置了龙武、宁蒗、碧江、泸水、潞西、梁河、宁江、盈江、莲山、福贡、陇川、瑞丽、德钦、贡山、沧源等设治局<sup>③</sup>。同时，云南政府继续给土司发印信，允许他们承袭。

1942年，滇西沦陷，云南成为对日抗战的前线。边疆各土司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起来进行抗日，尽守土之责，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线光天等，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云南土司抗日有功，政府暂时未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但改土归流毕竟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为使土司制度逐渐废除，以谋地方自治，云南省政府认为要改土归流，首应提倡文化普遍施以教育，并须移植多数人民充实边地，由多方面开发生产，使其经济繁荣则财赋人口始有独立改治的资本。欲达到此种目的，势必先行修筑公路，便利交通，才能逐步着手进行，事体既大，需费尤多，非短期内所能办到，特采渐进办法，一方面分划土司地区，加设行政官吏，一面于民国23年（1934年）由民政厅长丁兆冠厘定各土司地方行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公布。1934年7月1日至1935年6月末，为土司地方行政建设的第一年，1935年7月1日起至1936年6月末为第二年，1936年7月1日起至1937年6月末为第三年。“责成地方官按年督饬土司举办识字运动，宣传教育，浅议筹设简易识字学塾及国民补习学校，修治道路，种植森林，调查学童数目，筹设初等小学校……”以此加强对土司地区的开发。要求“各该管县县长或设治局长暨地方绅首，督促各土司依照本方案之规定，按年

① 《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19页。

②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第255页。

③ 《云南民政概况》，云南省民政厅，1936年12月。

次第举办……各土司头目督率土民，切实考察地方情况……分年推进，毋操切从事，毋敷衍塞责，有负厚望。每届年终，立将筹办所指各事实情况，报由该管县府或设治局，派员实地考察，转报汇核。”<sup>①</sup> 随后，各地每年都按要求上报地方建设情况。云南省政府这一土司地方建设方案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云南土司制度的废除是采取自然淘汰的办法。1945年，云南省第四区专员龙绳武拟一呈文，“土司身后不许子孙承袭，以期陆续淘汰。”<sup>②</sup> 云南省政府认为“极有见地，准予如呈照办。”<sup>③</sup> 随后，云南省民政厅发训令，“令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局遵照办理”。<sup>④</sup> 从此，土司死亡和因案停职后，一般不再给其子孙印信，云南土司才不得承袭。但土司制度的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以后。

土司制度的存在，体现了云南政治统治的两重性特点，即在政治系统来看，云南在民国初年设行政委员或县佐，后渐改为县或设治局，“已与内地不殊，然设置流官，而土司未废，土流两重政治”<sup>⑤</sup>，采取的是“土流并治”。按照《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县为自治单位，各省省政府以下除县市政府外，本不容有其他特殊行政组织存在，但由于云南情况特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普遍依靠本地土司进行管理，正如云南省政府认为的“设官分治原与土司制度系属两事”，“故土司制度之存在与国家行政之施行，实际上并无何种障碍”<sup>⑥</sup>。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滇西的十土司地，虽然名义上土司受流官节制，实际上土司掌握了当地政治经济大权<sup>⑦</sup>。

四川省政府也制定了改革土司制度的意见。1931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四川省政府向会议提出提案：“建议请

① 《云南省所属各土司地方行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1934年，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43卷，第29～32页。

② 《云南省民政厅民叁二字第477号呈文》，1945年10月12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71卷，第9页。

③ 《云南省政府秘人一字第276号指令》，1945年11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71卷，第39页。

④ 《云南省民政厅民叁二字第50号训令》，1945年1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71卷，第40页。

⑤ 方国瑜：《土司之地位》，原载《云南》，民国35年（1946年）1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6卷，第7页。

⑥ 《云南行政纪实》第二编，《边务—土司制度》，1943年，第1页。

⑦ 参考江应梁：《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第三章，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明令废除屯员土司制度，以便改土归流”。“川省所辖土司，计平武、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西昌、昭觉、越嶲、盐边、天全、盐源、会理、雷波等县，有土司30余处，冕宁、峨边、马边、古蔺、綦江、南川等县，有土目若干。除天全之穆坪，业经改土归流，改为宝兴县外，其余茂县陇木长官司承袭案，前准部（内政部）电复以各项土司名称，应行改革，俟设治局暂行条例公布，再行统筹办理。”

具体办法是：“边远省份尚未设置县治地方、或因种族居处不同、或因文化经济落后，依其人口财赋及地方各种状况，未达到设县程度，亦应设置设治局，以为渐次改设县治之基础等语，川边土司地方情形，正复相同，除已改流为县外，其余土司土目，拟请视区域之大小及人口财赋之多寡，查酌情形，一律改为设治局。不敷成立设治局者，划分乡镇，归原属县府办理，以收统一之效。”<sup>①</sup>此提案经大会通过，嗣由内政部“咨请四川省政府详拟办法，再由部核定办理”<sup>②</sup>。

按照提案，1932年6月，四川省的上鱼通少数民族聚居地改置为金汤设治局。1936年11月，又于川西南新征服夷区巴且夹谷地区设置宁东设治局。其余不敷成立设治局的地方，划分为乡镇，归原属县府办理，原土司名称大都保留。

西康土司在清末，赵尔丰厉行改土归流，筹设县治时，康属土司当时多数都缴印改流。然而改流不久，就遇到清王朝的覆灭，使西康土司势力并未彻底消除。而一般土民旧观念太深，服从土司已成习惯，故历任康区知事对从前曾任土司或土司的后人，均委以总保、保正、村长等职，以示羁縻。因此，康属19个县之区长及民团副总队长，多由土司头人担任。

1927年，刘文辉击败刘禹九（成勋），将康区纳入二十四军势力范围。对于旧日土司平时较恭顺者，加以怀柔；其顽强不化者，加以惩治。又通令全康，“其任有现在总保、村长等公务者，开导之。其未任有公务者，不再加委。而从前所规定土司喇嘛膳给，仍按年发给，俾一般土职胥沾实惠，藉免野心复起，”<sup>③</sup>通过任命旧有土司为各县总保、

<sup>①</sup> 《全国内政会议提案第76号》，1931年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41~42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300号咨文》，1931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7509卷，第38页。

<sup>③</sup> 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139页。



保正、村长等职，使他们全部改流。

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制实行省、县两级制。而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有设治局作为一种过渡机构，这是对西南土司改革的主要措施，也是中国古代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的体现。

### 三 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因此，移民垦殖是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又一措施，是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举措。

中国西南边疆地广人稀，可垦之地多。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统计，云南省荒地12112407亩（国民政府内政部1934年统计），四川省112465350亩（此数过于庞大，与该省其他报告相差甚远），西康1130000亩（农林部调查），贵州16996275亩（国民政府内政部1933年调查）。这些数据可能有出入，如四川的荒地是否达1亿多亩？但是西南地区荒地较多则是事实。

移民垦殖：一可以巩固国防。我国边疆幅员辽阔，且边防空虚，移民垦殖有利于巩固国防。二可以改善和提高边疆人民生活。移民垦殖使大批内地人员迁来边疆，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边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三可以调整人口分布。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据推计全国总人数的6/7，集中于全领土1/3的冲积平原地区内<sup>①</sup>。而边疆地区赤野千里，旷无人烟，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移民垦殖可以调整人口分布，改善土地分配。四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我国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移民垦殖有利于团结边疆各民族人民，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尤其是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的供给不得不以大后方为根基，移民垦殖成为战时农业增产和安置难民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sup>②</sup>。当时政府认为“边疆屯殖，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sup>③</sup>

国民政府及西南各省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关移民垦殖的政策法令，成立专门的垦务机关。1933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奖励辅助移垦原

① 施珍：《成长中之中国垦殖》，《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② 陆和健：《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

③ 李顺卿：《垦殖政策》，《中农月刊》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

则》，同年5月，颁布《清理荒地暂行办法及督垦原则》。1934年7月，颁布《徒刑人犯移垦暂行条例》。1938年10月，颁布了《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1939年5月，修改为《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同月，颁布《中央补助难民移垦经费办法》。1941年5月，颁布《调用荣誉军人从垦暂行办法》和《战后救济归国侨胞从垦办法》等。1943年，起草《垦殖法原则》。中央垦务行政初由振济委员会会同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主持办理，至1941年2月，农林部成立垦务总局，专门负责此事。主要工作除督导各省垦务外，还调查各地荒地，分区设立垦务管理局，直接办理垦殖<sup>①</sup>。

到1943年8月底，农林部直属的垦区有10个，它们是陕西的黄龙山垦区和黎坪垦区、江西的安福垦区、甘肃的岷县垦区和河西屯垦实验区、福建的顺昌垦区、四川的东西山屯垦实验区和金佛山垦殖实验区、贵州的六龙山屯垦实验区，西康的西昌垦牧实验区。这10个垦区共有垦民62454人及荣誉军人1896人，开垦的荒地390485亩<sup>②</sup>。

西南各省也根据本省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成立各省相关垦务机构，开展移民垦殖。

1935年8月，云南省成立了开（开远）蒙（蒙自）垦殖局，主要开垦开远县之大庄坝及蒙自县之草坝和蒙自坝。云南省曾于1937年11月派员前往思普沿边调查荒地<sup>③</sup>。1938年3月，拟定《难民移垦实施方案》，颁布《云南省承垦公私荒地暂行办法》，并设立云南垦务委员会<sup>④</sup>。1938年7月，行政院拟定《云南开发之意见》，其中有垦殖荒地及推广农业办法。<sup>⑤</sup>

1938年7月，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宇皋，拟定《为招募海外侨胞资金垦殖云南边地意见及计划书》和《解决滇缅界务悬案暨改进滇西边政方略》，呈报给（国民党）中央。当时正值抗战“军兴半载，沿海富庶之区，几尽沦于敌手，生产事业，多陷停顿，影响所及，颇不利于长期抗战，所幸西南各省，位居安全，资源地利，尽可启发。……滇省地利，以迤西各县最关重要。”究其原因：一是滇西

①③④ 施珍：《成长中之中国垦殖》，《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② 《国民政府年鉴》第二回，行政院编纂，1944年10月，第12章，第18～20页。

⑤ 国民政府行政院：《云南开发之意见》，193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十二全宗（6）15700卷。

毗连缅甸，可修铁路，以保证军需运输。二是滇西各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一旦开采，可以成为国家之重要资源。但是“战时中枢财政，诚恐无力及此。思筹再三，乃有招募海外侨胞资金之议。”他提出利用南洋华侨的资金，开发云南边地。并拟定《滇边垦殖长期公债发行办法》暨《云南迤西边政兴革计划》，请求国民政府设立隶属于行政院的“滇边垦殖委员会”，发行滇边垦殖长期公债，开发云南边疆地区资源，办理各项事业<sup>①</sup>。

1939年10月，云南省划出滇南的车里、佛海、南峒、镇越4县作为暹罗（今泰国）回国华侨移垦区，并在南峒设立侨胞垦殖委员会及招待所，办理华侨移垦事宜<sup>②</sup>。1940年8月，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提出了《开发边地方案》。根据云南省地势、交通、物产、社会等不同情况，将迤西分为思普沿边、沧顺沿边和腾龙沿边三大区，并从充实国防、建设航空根据地、健全政治机构、建设交通、推进卫生事业、组织企业公司、改良现有实业、探测矿产、筹办垦殖等方面提出了开发计划<sup>③</sup>。

贵州省垦务初由建设厅主办，1938年3月，成立了隶属于贵州省建设厅的“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以后由农业改进所指导试办开垦荒地。1937年9月，颁布了《贵州省各县实施垦种暂行办法》<sup>④</sup>。1939年1月，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受该省振济委员会之委托，在平坝设立模范农场，又协助西南垦殖公司设立蛮子洞第一农场。1942年，农林部在贵州设立六龙山垦区。1943年10月，颁布了《贵州省督垦荒地办法》。

四川省垦务原由建设厅办理，1936、1937年间曾派人分赴边区调查荒地情况。1938年9月，公布了《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及《承垦荒地实施规则》<sup>⑤</sup>。同年，拟具了《四川边区垦荒计划大纲》<sup>⑥</sup>。1939年12月，成立了四川省垦务委员会，制定《难民移垦实施方案》，在平北、东西山设立垦务管理局或办事处。此外，农林部还在四川设有东西山屯垦区管理局及金佛山垦殖实验区管理处等<sup>⑦</sup>。四川省政府设立“四川省边区屯

① 梁宇皋：《为招募海外侨胞资金垦殖云南边地意见及计划书》和《解决滇缅界务悬案暨改进滇西边政方略》，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2045卷。

②⑤⑦ 施珍：《成长中之中国垦殖》，《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③ 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开发边地方案》，1940年8月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583卷，第40～50页。

④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Q101～103页。

⑥ 《四川边区垦荒计划大纲》，1938年，中国第二次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2044卷。

垦筹备委员会”，下设总务、测绘、屯务、农事、交通、林务、畜牧、矿务等组，对四川各边区进行调查，提出开发计划，经营屯垦。如雷马屏峨屯殖开发调查委员会提出《垦殖雷马屏峨及宁属四年计划》<sup>①</sup>。并设立雷马屏峨垦务局、松理懋茂汶靖垦务局等。

西康省在抗战后，设有西康宁属屯殖委员会，负责筹划宁属8县的垦区。另由中央拨款委托设立西康西昌兴国垦区。1941年11月，农林部在西康建立西昌垦区<sup>②</sup>。

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可以分为国营、省营、民营等形式。

国营垦区：西康西昌垦区；四川的东西山屯垦实验区、雷马屏峨垦区、金佛山垦殖实验区；贵州的六龙山垦区等属于国家经营，由垦务总局负责。

省营垦区主要有：云南省垦务委员会开办的开蒙垦殖局；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设立的平坝模范农场；四川垦务委员会办理的平北垦务局、雷马屏峨垦务局、松理懋茂汶靖垦务局、东西山垦务办事处、彭水垦区办事处等。

民营垦区主要有：云南的华西垦殖公司建立的建水羊街坝实验区，富滇新银行的蚕业新村；贵州有西南垦殖公司创办的蛮子洞第一农场；四川有同生垦社、蜀边垦殖公司、国民垦殖公司等。

此外，还利用军队、难民、内地无地的农民及迁徙囚犯到边疆地区屯垦。如在四川，军政部成立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1941年11月，成立四川东西山屯垦实验区。1942年，农林部将西康的西昌垦区改为屯垦实验区。

移民垦殖是以移民实边，建设边疆，增进国家富强，巩固国防为目的。在抗战的严峻形势下，边疆地区的移民垦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41年11月成立的四川东西山屯垦实验区，到1943年招致荣誉军人及家属从垦者743人，开垦荒地9900亩。贵州的六龙山屯垦实验区，共有荣誉军人237人，开垦荒地802亩<sup>③</sup>。另据1944年4月，四川省建设厅报告，全省移垦人民17760人，开垦荒地769652市亩。西康有垦民547人，已垦荒地2025市亩<sup>④</sup>。

① 《四川省政府边区屯殖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垦殖雷马屏峨及宁属四年计划》，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8366卷，第13～95页。

②④ 施珍：《成长中之中国垦殖》，《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③ 《国民政府年鉴》第二回，行政院编纂，1944年10月，第12章，第19页。

移民垦殖在安置难民、增加粮食、充实边防、增强抗战国力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边疆人民生活的改善及边疆文化的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 四 西南地区的边疆教育

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是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

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最初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负责，1940年，为加强边疆教育，国民政府将蒙藏教育委员会扩大组织为蒙藏教育司，负责聘请边疆教育人才，研究推进边疆教育，民族学家凌纯声担任蒙藏教育司司长。同时，成立了边疆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有凌纯声、吴文藻、刘锡藩等民族学家参加。该委员会曾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视导员暂行规则及劝学暂行部分》、《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等文件<sup>①</sup>。

##### （一）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sup>②</sup> 1929年，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sup>③</sup>。

<sup>①</sup> 《边疆教育概况》，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年。

<sup>②</sup> 《国民党三届二次中央全会通过的蒙藏决议案中有关教育部分》，1929年6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5页。

<sup>③</sup> 《教育部公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1929年7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6~817页。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实施蒙藏教育计划》<sup>①</sup>，“本计划一面顾到全国教育统一的宗旨，一面也注意蒙藏地方实际的事实”，有不能完全适用内地教育办法的，有相当的变通办法。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各宗（西藏相当于蒙旗的行政区域）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划和掌管这些地方的教育事宜。决定在首都、康定二处，各设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两年内完成；原有的北平蒙藏学校也应整理而使之充实。计划蒙古各旗、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酌设小学若干所，在1931年以前，至少各须成立一处，以后逐渐推广；在蒙古、西藏重要地方，按照社会需要，各设一职业学校，限六年内完全成立；蒙古、西藏重要各地，及新疆各设一中学、各设一乡村师范学校，限六年内一律成立，并提出了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设置学校的地点和招生区域。

同年，教育部制定了《边疆教育实施原则》<sup>②</sup>，包括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方面内容。关于边疆教育的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二是以谋边境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三是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四是力谋边疆各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意识之增高。各级学校之课程，根据内地各级学校课程之标准，并斟酌边疆各民族情形编订，规定各级边疆学校的教材应特别注意“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等”内容。

1934年，教育部颁布《捐资兴学褒奖补充办法及待遇章程》和《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等。并于1936年10月，通令各省市对西南边疆学生来内地求学者，应比照蒙藏学生章程，予以优待，以示提倡<sup>③</sup>。

1935年，教育部拟具了《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准备在西南地区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小学8所，贵州小学6所，并于各省原有

① 《教育部实施蒙藏教育计划》，193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20～829页。

② 《边疆教育实施原则》，19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833页。

③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第10章，第165～166页。

师范学校内，指定一二所添设边胞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又拟定《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预定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sup>①</sup>。

根据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边政，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中“边地民族之教育，中央应制定妥善方案”要求<sup>②</sup>，1936年，又议定《有关边疆教育基本实施纲要》五条。1938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几经讨论，草拟边疆教育方针及办理边疆教育原则。嗣后，经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研讨，到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并获通过。

这一方案首先使边疆教育有了明确的方针，“旨在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其次，分列各级边疆教育的中心目标。此外对于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育用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疆劝学制度等项，均有具体规定。

1941年秋，教育部与有关机构筹划呈准，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作为边疆教育的保障<sup>③</sup>。随后，教育部制定《各边省推进边疆教育三年计划》，对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标准，要求各省在可能范围内，拟定实施计划。在西南各省中，四川、云南、西康均按要求制定各省边疆教育三年计划。

## （二）中央及教育部边疆教育的实施

1930年，中央政治学校决定成立附设蒙藏班、西康班<sup>④</sup>。1932年，先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增加招收蒙、藏、维吾尔等族学生数量。随后，将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增加投入，完善建制，扩大招生，<sup>⑤</sup>大量培养边疆人才。1934年，为推广边疆教育，中央政治学校计划设置边疆分校，地点初步选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等8处筹设分校各1所<sup>⑥</sup>。

①③ 李祥金：《西南的边疆教育》，《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5年11月23日，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145页。

④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组织规则》，1930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西康学生训练班组织规则》，1930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7～818页。

⑤ 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⑥ 《中央政治学校设置边疆分校初步计划纲要》，1934年2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9～820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于边疆教育更为重视，于重庆附近设立国立边疆学校，招收边疆青年，作为升入普通大学的准备教育。校内附设边疆教育、行政、卫生、畜牧、兽医等专修科，以造就边疆建设人才<sup>①</sup>。

边疆教育的开展首先是鼓励边疆青年到内地学习。边疆青年有的进入上述专门的蒙藏学校或附设的蒙藏班学习，有的进入内地的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国民政府令地方选派边疆优秀青年，就学于内地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为了鼓励边疆学生到内地求学，还制定了奖励的办法。

其次，在边疆各地兴办各级边疆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及西南各省地方政府先后制定了发展边疆教育的纲要和计划，在边疆地区先后成立了各级学校。边疆学校的兴办分为教育部办的边疆教育和西南地方政府办的边疆教育两部分。

教育部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各级学校。教育部主办的教育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四类。第一类师范教育：教育部在西南设立的直属边疆师范学校6所，其中云南有3所，它们是云南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国立大理和丽江师范学校；贵州1所，即国立榕江师范学校；西康有2所，即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和巴安师范学校。第二类职业教育：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职业学校4所，四川、西康各2所，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和清溪职业学校；西康有国立金江初级职业学校和西康初级职业学校。第三类小学教育：西南地区国立小学有木里小学（盐源）、凉山小学、越嵩小学等<sup>②</sup>。1940年夏，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有少数民族毕业生10余名，教育部令在彝良苗族聚居区成立奎香实验小学。教育部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小学，原属倡导示范性质，小学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兴办。第四类社会教育：教育部对于边疆社会教育，主要由各校兼办，每年教育部酌情发给一些收音机、幻灯机等器材，令各校组织巡回施教队、剧团等，巡回边疆各地施教。其他如办理民众识字学校、开放诊疗所等活动，也由一些学校在做<sup>③</sup>。

### （三）西南地方政府的边疆教育

在中央的倡导下，西南各省政府也十分重视边疆教育，积极推行边

①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7月，第167页。

② 参考《各级国立边疆学校呈报概况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378、12379卷。

③ 参考凌纯声在边疆教育会议上讲的《边疆教育工作报告》（《边铎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和李祥金的《西南的边疆教育》（《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疆教育。边区各省都依据上述的方案，或计划，或纲要，设立边民学校，招收边疆青年，对于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待。

云南民族复杂，边疆各地语文、宗教及生活方式均有不同。云南省为唤起边疆同胞的民族意识，使其增强国家观念，1931年3月，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29条。1935年9月，云南省教育厅拟具、公布《推广边疆教育计划及实施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夷民学生待遇细则》<sup>①</sup>等。

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师资，云南省决定在省立昭通中学内附设边地师资班，以训练少数民族师资为目的。此外，先后设立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宣威乡村师范、大关简易师范（1940年改为大关乡村师范）<sup>②</sup>、佛海简易师范、蒙自师范学校、个旧简易师范学校、广南简易师范学校、思茅师范学校、保山师范学校、鹤庆师范学校、永胜简易师范学校、镇南师范学校、大理女子师范学校、景谷简易师范学校等<sup>③</sup>。

从1935年起，云南省先后创设中甸、维西、兰坪、镇康、澜沧、南峽、六顺、车里、江城、金平、德钦、碧江、福贡、贡山、宁蒗、耿马、沧源、临江、泸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师宗、永胜、丘北、龙武、河口、华坪及环州（武定县）、圭山（路南县）、炎山（昭通县）、黄草坪（巧家县）等34所省立边疆小学。1941年后，由于收支系统变更，经费紧缩及战争等因素，云南省立的34所边疆学校发生变化。除师宗、圭山（路南县）两校为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继续办理外，环州、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龙武、华坪等7所学校，因为当地学校已具规模，为配合国民教育的实施，均划归各地方办理。宁蒗由于环境特殊，暂行停办。1942年，日寇侵略滇西，多数边区陷于战时状态，办学困难，遂将澜沧、沧源、车里、南峽、泸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镇康、河口等12所学校暂时停办。1944年，滇西沦陷区收复后，依照计划及斟酌各地情形，于1945年春季，恢复了泸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等7个设治局的省立小学<sup>④</sup>。

① 《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391卷。

②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③ 《民国27年度（云南）省立中等学校设施概况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391卷。

④ 《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10月，第884页。

贵州早已设省，与普通边疆省份不同，如果就地理、政治而言，贵州并非边疆。但贵州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1/6，散布于黔省各地。因此，贵州作为边疆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1935年春，蒋介石到贵州，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内每年至少拨出10万元作为少数民族教育经费，贵州边疆教育开始受到重视<sup>①</sup>。同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殊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民族教育<sup>②</sup>。

1936年，二十军军长杨森到贵州，从昭通到石门坎，选苗族青年数人送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sup>③</sup>。杨森提出同化苗夷的工作，主张凡部队驻军地，接近苗夷的地方，均须实施短期教育<sup>④</sup>。1936年，杨森驻军安顺，以兴办学校，启发民智为己任，与当地绅士杨庆安等组织安顺苗民文化促进委员会，设一、二、三中华小学（针对石门坎教会的光华小学），并设中正夜校及中华民众学校，经费由二十军拨给。后因抗日战争开始，二十军开拔前线，学校移交给县政府，又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sup>⑤</sup>。

40年代后，贵州省教育厅拟定了《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sup>⑥</sup>，并于教育厅下专门设立了边地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贵州边疆教育事业的最高组织机关，规定在边民聚居的县政府设立边民教育促进委员会。

1946年，贵州省政府制定《加强边胞教育办法》<sup>⑦</sup>，关于教材之编纂，边胞学生的优待，师资的培训，习俗的改良等都详细列入，内容十分丰富。

贵州的边疆教育主要是设立师范学校及省立边疆小学。1936年3月，为培养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贵州省政府成立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到1939年，校址迁到榕江，改为国立榕江师范学校<sup>⑧</sup>。同时，于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贵阳、黄平、荔波、台拱、关岭、威宁、安南、丹江、水

①⑤⑧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② 《贵州通史》第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③ 梁欧第：《西南边疆教育的几个类型》，《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1日。

④ 马毅：《苗夷教育之检讨与建议》，《西南边疆》第7期，1939年10月。

⑥ 《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1445卷。

⑦ 《贵州省政府加强边胞教育办法》，《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

城、定番、八寨、罗甸等12县分设省立小学12所<sup>①</sup>，专招少数民族学生。另外，还办有部分短期小学。

1938年，贵州省政府在青岩成立了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第一期收容约50名学生，半年后毕业，主要以研究苗夷语言，辅助推行政令为任务。但由于诸多原因，第二期不能招生，后来交给省训练团办理，改为方言讲习组，但无成效<sup>②</sup>。

1941年，贵州省在台江举办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从镇远、铜仁、都匀三个区中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招收学员，以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为目的。该所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公费待遇。1944年夏，此训练所迁往炉山县属的凯里镇<sup>③</sup>，改为炉山师范学校，校长由少数民族人士吴修勤担任<sup>④</sup>。

川康的边疆民族教育开始于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鉴于川滇边疆民族，亟需开化，奏请在四川省宁属设立“化夷学校”100余所，每所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0~60人，边疆教育收效良好。1929年，四川的宁属8县设立宁属垦务局，附设有初等小学性质的“化夷学校”，约有夷族学生30~40人。后因为垦务局撤销，“化夷学校”随之停办。1931年，宁属驻扎屯垦军，创办宁化学校，由夷族青年曲木尧负责主持。后由于种种原因停办。

四川各县的少数民族教育计划中，提出：“凡边境接近夷区的县属各学校，尽量招收夷族子弟，予以较优的待遇，并由附近夷民之团丁，切实劝导其向学，以期同化；并计划设立短期义教于附近夷区之地”。依据教育部《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中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sup>⑤</sup>的要求，四川省决定在宁属、雷波、马边、屏山、松潘、懋功、汶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酌设普通小学若干所。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行委员岭光电、王奋飞等呈请行政院，“请求规定待遇夷族学生章程，补

① 《贵州省边疆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456卷。

②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③ 《贵州通史》第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④ 梁欧第：《西南边疆教育的几个类型》，《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1日。

⑤ 李祥金：《西南的边疆教育》，《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助夷族私立学校办法，并令中央政治学校在各夷族集中地区，筹备政治分校。”<sup>①</sup>

民族学家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曾于1941年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区教育情况进行视导。他对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提交给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sup>②</sup>。

1935年，西康成立建省委员会，到1939年以前，西康建省委员会在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方面多有表现。师范教育方面：第一，训练藏族师资，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级，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学生，修业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到各学校服务。第二，训练义务教育师资，为推广短期义务小学教育，对考取或曾任小学教师及简易师范的毕业生，训练4个月后，分到各县短期义务小学任教。初等教育方面：第一，创设省立小学，在康定、泸定、丹巴、九龙、甘孜、瞻化、巴安等7县各设省立小学1所，另设藏族小学5所。第二，设立短期小学，在康区18个县中先后设立短期小学70所，毕业年限由一年制改为两年制，为将来学生升入县立小学及省立小学做准备。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西康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发展。西康边疆教育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类。学校教育方面：第一，高等教育，在西康筹备和建立省立西陲五明学院，校址在康定，这是研究佛法的唯一机构，以“沟通汉藏文化，配合康地政教，宏扬佛法为宗旨”。第二，中等教育，设立康定中学，招收高初中学生。同时继续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训练特殊师资。第三，小学教育，1939年3月，在理化、定乡、稻城、得荣4县，增设省立小学各1所。开始筹办白玉、石渠等县的省立小学。社会教育方面：第一，广设民众学校，康属新设民众学校40所。第二，巡回电化教育，1939年3月，教育厅电化教育队从康定出发，经过康北、康南15个县，巡回放映电影及广播<sup>③</sup>。

综观民国时期西南几省的边疆教育，虽然都称为“边疆教育”，但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各有不同，各代表不同类型。正如梁欧第先

<sup>①</sup> 王一影：《泛论边疆夷族青年的教育与训练》，《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

<sup>②</sup> 李安宅：《视察川甘边疆教育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401卷。

<sup>③</sup> 梁瓿第：《民国以来的西康边民教育》，《边政公论》第1卷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

生所说：西康的边疆教育可称为学差教育（老百姓认为让小孩读书是当差），四川大小凉山的称为保罗教育，贵州的边疆教育称为异化同化教育（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教育是异化教育，由中央和贵州省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教育称为同化教育）<sup>①</sup>，而云南的边疆教育与国民教育趋同。

民国时期“厉行尚同运动，务使全国任何宗族逐渐趋于一种信仰，一种文字，一种语言，一种习俗”<sup>②</sup>，当时的政府认为边疆教育实际是一种有时效性的教育，它的“最高的目的在于求本国境内各族人民文化现象之统一”，一旦“达到国内文化现象之统一，各族情绪之合一，中华民族之永固”<sup>③</sup>时，即是边疆教育时效消失的时候。其实质是通过边疆教育实现民族同化。

总之，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对于开发边疆，培养边疆人才，提高边疆人民的文化，改善边疆人民生活，加强各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综观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西南几省中，“川、滇、康三省，因为经费人才较充裕，边疆教育成绩较好”<sup>④</sup>。

当然，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起步较晚，1929年以后才开始，受到重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后。二是边疆教育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内地所通行课本，使用的是汉字，内容与边疆同胞的生活相去甚远，以致于当地政府要求学生入学，被认为是政府的逼迫。如民国时期，西康人民误以为送子弟入学是“当学差”，亦名为“娃娃儿差”，极感痛苦，“迭次向政府陈请豁免或减免充学差的名额，甚而有些人家不愿其子弟当学差，而出资请人顶替。”<sup>⑤</sup>三是由于边疆教育尚在草创时期，西南几省边疆学校的设置以师资培训和初等教育为主。四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教育后来出现两种倾向，第一，边疆教育本来是独立的，经费及学校都应独立，而西南各省边疆教育后来逐步走上与国民教育合流的道路。边疆学校被裁撤，并入国民教育学校，经费依附在

① 梁欧第：《西南边疆教育的几个类型》，《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1日。

② 李寰：《中国边政机构之回顾与前瞻》，《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1日。

③ 国民政府内政部：《边疆教育政策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1431卷。

④ 凌纯声：《边疆教育工作报告》，《边铎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

⑤ 柯象峰、符气雄：《西康省边民教育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12454卷。

国民教育经费下开支，使边疆教育不能大力发展。第二，边疆教育有从特殊走向普通化的倾向，边疆教育有其特殊性，为了边疆教育而设有研究、设计及师资训练种种机构，然而40年代后，这些机构逐渐趋于普通化、一般化。如国民学校的设置，特殊训练机构的撤销，就是实例<sup>①</sup>。

#### 第四节 中央边政机构的设立

边政机构为实行边疆民族政策，从事实际开发建设边疆的主办机关。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族管理机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央的边政机构经过了清末的理藩部，到民国初年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再到蒙藏委员会的发展。

##### 一 蒙藏委员会的设立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管理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sup>②</sup>，是民国时期中央的边政机关。

它是由清末的理藩部发展而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4月，由于国内政治力量的斗争和妥协，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政权移交之时，正值中国边疆多事之秋，英、俄、日等国，尤其是英、俄利用混乱局势，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把外蒙古、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边疆危机十分严重<sup>③</sup>。当时蒙藏地区形势严峻，需要设立一专门机构管理蒙藏事务，1912年7月19日，宣布成立蒙藏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管理蒙藏事务。

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蒙藏事务局为蒙藏院。蒙藏院设参事室、秘书室、总务厅及第一、第二两司。并设蒙藏专门学校、招待所、喇嘛印务处等附属机构。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筹备处，以替代蒙藏院，以张继、白云梯、刘朴忱为常务委员。12月，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赵戴文为副委员长。1929年2月，蒙

① 李祥金：《西南的边疆教育》，《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②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7月，第309页。

③ 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理论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藏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蒙藏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主要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计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蒙藏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置委员7人或9人，由国民政府任命；置常务委员3人，由国民政府就委员中指定，开会时轮流主席<sup>①</sup>。蒙藏委员会第一任常务委员是张继、白云梯和刘朴忱，委员有罗桑囊嘉、格桑泽仁、陈继淹和李凤冈<sup>②</sup>。蒙藏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内务处）、蒙事处和藏事处，各处下设分科。另设编译室、调查室和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等。蒙藏委员会于必要时可委派或聘任专门人才或精通蒙藏情形或语言文字者为专门委员、编译员或调查员。

1932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要点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增至15~21人，并就其中指定6人为常务委员；该会应每年轮流分别往蒙藏各地视察。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再度修定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将委员人数增至21~27人，指定6人为常务委员，并扩充其机构编制<sup>③</sup>。

该会附属的机构（直属机构）有北平蒙藏学校、驻平办事处、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蒙藏招待所、蒙藏旬报社（后改为蒙藏月报社）、蒙藏通讯社、张家口牧场。受蒙藏委员会监督指导的机构还有蒙藏政治训练班、驻藏办事处、杀虎口牧场、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驻京办事处、蒙旗宣慰使公署、西藏驻京办事处、西藏驻平办事处、西藏班禅驻平办事处等<sup>④</sup>。

根据国民党中央边疆施政纲要中“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的要求<sup>⑤</sup>，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周昆田、陈之迈、吴文藻、楚明善等11人为理事，徐益棠、顾颉刚等5人为候补理事。研究室主任是吴文藻，出版主

①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国民年鉴》第四编，新亚书店1928年版，第37~38页。

② 《名人小录》，《国民年鉴》附录，新亚书店1928年版，第7页。

③ 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政策刍议》，《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9期。

④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7月，第311页。

⑤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任为周昆田<sup>①</sup>。蒙藏委员会出版有《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刊》等刊物。

蒙藏委员会所管理的少数民族事务主要是政务和政策性的，其他很多事务则分属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如教育部有蒙藏教育司，组织部中有边疆党务科，军令部中的二厅五处及其他部门也有管理少数民族的相关机构。1935年以后，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设立滇西、金川、喀木、积石、天山、河西、河湟、绥蒙等调查组<sup>②</sup>。

## 二 蒙藏委员会的工作

处理蒙藏事务是蒙藏委员会的主要任务，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分为抗战前和抗战后两个阶段。

抗日战争前，蒙藏委员会在“边疆地方行政制度之改建，边疆关系之调整，边疆宗教事务之整理，边疆状况之调查，边事书报之翻译，边疆教育之振兴，边地实业之创立”<sup>③</sup>等方面做了下述的工作。

### （一）改建边疆地方行政制度

一是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二是制定蒙旗保安队编制大纲，并设置保安长官；三是设置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四是设置西康建省委员会。

### （二）调整边疆关系

一是1930年6月，召开蒙古政教长官会议；二是设立蒙古、西藏两个地方及青海、西康两省驻京办事处；三是制定边疆政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四是1936年，护送班禅大师回藏。

### （三）整理边疆宗教事务

一是厘定喇嘛转世、任用、登记、奖惩等各种法令；二是册授班禅额尔德尼及章嘉呼图克图等宗教领袖的名号；三是整理喇嘛寺庙的各项事务。

### （四）边疆状况调查

先设计于归绥、宁夏、酒泉、西宁、康定、维西、敦煌等地，设立归绥、宁夏、酒泉、西宁、康定、滇西、新疆等调查组，后改为绥蒙、河西、积石、金川、喀木、滇西、天山、河湟等调查组。并于张家口、

①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

②③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7月，第310、312页。



平地泉、定远营、二里子河、拉卜楞、昌都等地设立分站，深入边陲，作各种专门性调查。1933年开始，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出版的调查报告有《乌兰查布盟各族调查报告书》（1933年）<sup>①</sup>。

#### （五）翻译边事书报

先后共出版有蒙藏状况，西藏记要，总理（孙中山）对蒙藏之遗教，国民党中央对蒙藏之法令，以及边疆政教名词译义等25种书籍。

#### （六）振兴教育

除整理北平蒙藏学校，于（国民党）中央创设蒙藏政治训练班外，还制定奖励蒙藏青年赴内地入学办法，并尽力推行蒙藏地方社会教育。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政府的西迁，蒙藏委员会配合政府其他事业机关（如教育部、交通部等）继续实施政务。1937年后，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了蒙藏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

蒙藏委员会在蒙藏地区的工作大致可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来概括<sup>②</sup>。

#### 第一，政治方面

一是派员对蒙古蒙旗进行宣慰。如1942年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亲往绥远、宁夏、青海等地抚慰蒙胞。二是增强蒙古行政机构。自绥远包头失守后，绥境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随军西迁。1939年，蒙藏委员会决定绥境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增设常委委员3名，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有的7处3个委员会。同时对撤到榆林的绥境蒙古各盟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予以调整，增设副长官1人。三是健全盟旗组织。对于各盟旗长官因故出缺者，蒙藏委员会均遴选有威望之人继任。为加强各旗与中央的联系，蒙藏委员会制定了蒙藏委员会派驻每个盟旗协赞人员办法及服务规程，呈准行政院备案实行。并遴选训练合格，在盟旗工作有年，具有成绩的人员为派驻各盟旗协赞专员。四是调查蒙旗实际状况。蒙藏委员会制定调查表式，令派驻各盟旗协赞专员，协同各该盟旗长官，认真填报表格，上报蒙藏委员会。调查内容包括：蒙旗长官世系沿革、蒙旗人口实况、测绘蒙旗略图、蒙旗兵备详细情况、蒙旗农矿

<sup>①</sup>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sup>②</sup>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参考《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7月，第314~321页）和第二回（行政院编纂，1944年10月，第17章，第2~9页）。

情形、蒙旗工商业情况、蒙旗学校状况、蒙旗召庙情形、蒙旗司法现状等。五是主持达赖转世事宜。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亲到拉萨，主持第14世达赖坐床大典。这是国民政府政令及于西藏的最明显象征。六是护送班禅灵柩入藏，并办理班禅转世事宜。1936年，班禅由拉卜楞赴玉树，定于翌年8月返藏，不意于12月在玉树圆寂。1939年冬，国民政府派赵守钰护送班禅灵柩入藏，并由中央仍照旧例办理班禅转世事宜，寻访转世灵童。七是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1934年，黄慕松作为专使入藏，曾留下总参谋刘朴忱、参谋蒋致余驻藏办事，但是没有正式设官署。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14世达赖坐床大典，与西藏地方政府商定，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并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由孔庆宗、张威白为办事处正、副处长。

### 第二，经济方面

一是蒙藏委员会协助蒙古同胞改良畜种，诊治畜类瘟疫。二是商准绥远省建立大规模的皮革工厂，为发展皮革贸易，蒙藏委员会商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派员前往收购。三是发展盐业生产，令伊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与青海左、右翼盟商量，设法增加西蒙盐的生产。并由财政部选派技术人员前往指导协助。四是调查蒙藏地区的农垦、水利、矿藏等情况，为开发经营农垦、水利、矿藏，蒙藏委员会随时予以调查，并商请有关及专门机构进行调查，以作为开发经营的根据。五是发展蒙藏经济，调剂蒙藏金融，先后筹设合作社，并在蒙藏适当地方设立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六是在青海、西康各省改善乌拉制度，减免捐税，以减轻人民负担。

### 第三，教育方面

抗战以后，蒙藏委员会除登记边疆失学青年，奖励边疆青年到内地就学外，又通令蒙古各蒙旗，于1939年、1940年内，设立或增设小学1所。到1944年，绥远、宁夏两省境内各蒙旗皆已设立小学至少1所，另设有伊盟中学1所及阿拉善旗简易师范学校。为培养边政人才，蒙藏委员会又设立蒙藏政治训练班，到1943年，共毕业学生130余人。此外，蒙藏委员会驻外地的各调查组，奉令在所在地兼办社会教育，设立民众图书馆，组织巡回教育队，发行书刊，以提高边疆人民的文化水平。1940年，蒙藏委员会在西藏拉萨设立书报阅览室，并于江达、昌都各创办1所小学，拉萨设小学1所，加伦堡设立中华小学1所。为鼓励边疆青年到内地求学和进修，蒙藏委员会制定了《待遇边疆学生规则》、《补助蒙藏

回学生办法》等，并对内地僧侣往西藏游学者，规定各种优待办法。

这时期蒙藏委员会先后出版《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41年）、《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1942年）<sup>①</sup>。

此外，蒙藏委员会在调解边疆地区纠纷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1930年2月，调处西藏地方与尼泊尔间因通商事件而发生的纠纷。1930年，调处西康大金寺与白利寺因为争夺庙产而发生的冲突。1932年2月，处理额尔多斯左翼前旗齐春山枪杀该旗代理扎萨克那森达赉，以及该旗独立团团团长奇英文枪杀齐春山的两次事变。1935年4月，抚平乌拉特前旗所部满图寺的叛变。1943年，处理了伊盟事件等。

蒙藏委员会在西南地区还组织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调查有三种：

一是通过制定调查表格，自上而下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调查，如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9年对土司及已改土归流土司情况的调查均是由蒙藏委员会组织的。

二是通信调查，即由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地调查员，写出调查报告，呈报给蒙藏委员会。如蒙藏委员会派驻西康调查员潘申五长驻康定，西康情况通过通信上报蒙藏委员会。

三是派出考察团及人员进行的调查。抗日战争中，调查室下设的调查组，对西南地区进行了调查。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涉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西康、云南省等，发表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2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成果<sup>②</sup>。

同时，蒙藏委员会还派出调查员开展调查，如1936年，蒙藏委员会调查室派出见习员李中定、唐磊赴巴安，沈毓祺、吴三立赴德格等地调查<sup>③</sup>。1939年，李中定将平日调查所得的资料，汇编成《康南八县调查纪要》<sup>④</sup>。

① 参考《边政公论》上的广告。

②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

③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派出见习员李中定、唐磊赴巴安，沈毓祺、吴三立赴德格等地调查》，1936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4048卷。

④ 李中定：《康南八县调查纪要》，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4103卷。

沈毓祺写出了《西康旧有土司土职调查表》<sup>①</sup>。1939年，康定调查员左仁极写出《西康土司头人概况调查》。蒙藏委员会组织的调查或考察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了解。

蒙藏事务是蒙藏委员会的基本职责范围，反映了蒙藏委员会建立之初，蒙藏地区在中国边疆的特殊地位，及在中国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因为我国其他民族地区都已经建省，只有藏族和蒙古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和蒙古，由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历史原因尚未建省或建立像省一级的地方政权组织，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sup>②</sup>，因此，在中央成立处理蒙藏地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是必要的。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蒙藏委员会与这些地区的王公、喇嘛等上层打交道，对他们进行笼络，同时任命其中的一些民族上层担任政府和蒙藏委员会的要职，如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被任命为“蒙旗宣化使”，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但是，蒙古和西藏不能概括中国所有的边疆地区，当时中国的边疆还包括东北、新疆、西南等地，蒙藏事务不能概括所有的边疆问题。这也反映了封建意识的残留，只重视几个较大的民族，忽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sup>③</sup>。“蒙藏委员会掌理事项是关于蒙古、西藏的行政与兴革事项，蒙古和西藏不能概括边疆，行政兴革似乎不甚具体而空洞。因为前者的规定，新疆及其他边民的事务，在中央便无固定闻问的机关；因为后者的规定，在当时的蒙古与西藏的情形下，蒙藏委员会仅能承袭蒙藏院理藩院的作风，打团结与安定的口号，办招待调处宣慰册封等等的事务……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所以人事便近于清闲，也因为人事的不健全，所以机关便日趋于消极地无能。”<sup>④</sup>而教育、文化、军事、交通等事项，多分掌于中央的相关机构，政出多门，事权分散，蒙藏委员会所能执行者，“不过边疆政治之联系与边民感情之沟通而已。”<sup>⑤</sup>

民国时期，“中国边政之废弛，其原因固多，然中枢无健全之边政

① 沈毓祺：《西康旧有土司土职调查表》，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4049卷。

②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5～856页。

③ 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④ 张汉光：《边政往何处去》，《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

⑤ 许公武：《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机构，恐为其主因。”<sup>①</sup>

1945年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边政区域，不限于蒙藏，而中央边政机构，范围既嫌狭窄，地位亦居次要，内容尤待更张。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央改现在的蒙藏委员会为边政部或民族部。<sup>②</sup> 根据学者的建议，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决定“改组蒙藏委员会为边政部”。<sup>③</sup> 后来，因为对边政部的性质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蒙藏委员会一直没有撤销。

从上述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可看出，蒙藏委员会工作主要针对蒙藏地区，虽然在抗战后，蒙藏委员会也关注和重视西南边疆地区，对西南开展了一些调查，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势力很难深入西南几省，蒙藏委员会在西南地区的调查相对于蒙藏委员会在蒙藏地区的调查研究要少。相反，对这些地方的调查是由西南几省的边政机关来开展的。

这个机构的设置暴露了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偏颇和缺陷，忽视了国内绝大多数民族的存在，违背了国民党所标榜的“民族平等”的主张<sup>④</sup>。由于蒙藏委员会的职责不健全，又由于民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西南几省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民国时期在西南各省另有边政机关。这些地方政府建立的边政机构名称不统一，云南叫“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叫“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有“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等。边政机构的不统一，使得政府对全国边疆民族地区没有统筹的计划，政令也不能自上而下，一以贯通。

①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② 参考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和张汉光的《边政往何处去》（《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

③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194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四），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112页。

④ 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 结 语

### 一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历史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载。中国古代的文献古籍中虽然有大量各民族的情况记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过认真的系统调查研究。

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曾出现调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热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可分为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以及学者个人进行的调查3类。而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是其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部分，积累的资料最多。但是，众所周知，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对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调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 （一）这是首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调查

最早由政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调查是在清朝末年，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政府理藩部曾对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过3次调查，内容有垦务、木植、牧厂、野兽、皮毛骨角、铁路、矿产、渔业、盐务、兵制、学堂、台站、疆界、商务等。这些调查主要在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进行，而且这些调查是为兴办实业了解情况，对兴利实边有一定益处<sup>①</sup>。清末，还对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过边界调查。但这些并非是专门针对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

政府官方组织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民国时期尚属首例。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较短的时间内，尤其在20世纪30~40年代，先后对西南少数民族组织过如此多的调查，反映了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视。这些调查规模较大、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民族学资料。调查资料及当时的研究成果既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今天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民族学资料。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sup>①</sup>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 （二）对今天的民族调查与研究，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是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三类调查中的一种，是中国民族学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近现代中国民族调查历史上的重要一环。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对此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全貌，构建完整的中国民族学史，有利于我们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做好今天的民族工作。

## （三）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政府的调查既是民族学在中国传播基础上实现的，反之，政府的调查又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国民政府的调查是民族学在中国传播和初步发展基础上实现的，是中国首次运用西方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开展的大规模官方调查。如第一类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每次调查前都制定了调查表式，有填表说明和要求。在政府下发的咨文、密令中，对调查的目的都有说明。调查的组织，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咨文给西南各省政府，令各省民政厅作为调查的主要组织机构，民政厅再下令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各县情况，填表上报。调查方法是采用调查表收集大量信息，通过对调查表的汇总，掌握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及土司情况。虽有某些数字不够准确，但上报的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此外，政府有关机构的调查及政府派出的考察团的调查，也是运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考察、访谈、记录等，写成了调查报告和开发边疆的计划方案。许多留学回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这些调查，他们运用了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使西南民族调查具有科学性。

同时，政府对民族学的鼓励和运用，又促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学科的发展，往往同政府的需要和重视有密切关系，正如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所说：学科的发展“大都由于时势的需要与机会的便利，机会不顺，学也难成，需要一生，应者四起。”<sup>①</sup>民族学在其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主要是利用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象，侧重于民族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到了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政府政治统治的需要，使中国的民族学学者逐渐用民族学、

<sup>①</sup>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sup>①</sup>。当时由于中国边疆问题的严重，民族学研究与国民政府强调的边政研究相结合，使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在理论及实践上同时并进，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sup>②</sup>。政府对民族学的重视和运用，促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

#### （四）有的放矢，针对性较强

国民政府的调查是属于行政性调查，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故每一次的调查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目的性。1929年对土司的调查是为了编订全国行政区划表，了解少数民族及其上层情况，处理好当时的民族关系，巩固其统治，并为继续改土归流做好准备。1934年开展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是因为西南边疆危机，尤其是云南边界问题，这一点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发布的咨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即“为团结国内各种民族，为防止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对于苗夷民族各项情况，实有深切明了之必要……”。1938年进行的西南边区的民族调查主要是由于抗战的需要，“对于苗夷等族亟应因势利导，予以组织训练……籍以增强抗战力量，”故这次的调查更侧重于民族的分布、男女人口数目、壮丁数目（壮丁指18岁至45岁的男丁）和开化情况等。1940年5月~1941年4月，国民政府要求对云南边疆傣族人民进行调查，主要是针对大泰族主义的泛滥……总之，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都是为巩固其统治，了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情况，为当时的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和施政措施提供参考。

#### （五）调查较认真，上报资料较为翔实可靠

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从上报调查表的情况看，可分为三种。以云南省为例，第一种是本辖区没有少数民族或自称没有少数民族，如呈贡、晋宁、绥江、大理等县没有或自称没有少数民族，呈请免报。第二种是按要求填报合格，如文山、中甸等县及碧江、泸水设治局等。第三种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合格者，由云南省民政厅饬令详查明确，另行填报或补报，如元江、缅宁、罗次、玉溪、大姚、永仁等县就被打回去重新填报。在1938年边区民族调查中，丽江、开远、金平、砚山等县甚至被发还多次，直至填报准确。所以，这些调查的资料较为翔实可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263~264页。

②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靠。而政府边政机构的成员和一些政府官员撰写的大量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计划方案，都是在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当代史，是一个时代西南民族状况的真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六） 调查种类较多，内容丰富

政府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中，云南种类为最多，其次是贵州和川康。调查内容包括民族种类、名称、分布情况、人口数目（总数及男女人数）、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民族性格、婚姻丧葬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教育开化情况、经济状况等，内容十分丰富。虽然每次调查的侧重点不同，但通过对这些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状况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发展历史。

#### （七） 调查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这些民族调查，对国民政府了解西南地区民族、边防等情况，制定边疆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一致抗日，稳定和巩固西南大后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开发大西南，加强民族团结，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也存在以下局限性：

### （一） 西南少数民族称谓不统一

国民政府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仍通称为苗、夷、蛮、僮等，或称边民、边胞。把西南少数民族通称为苗、夷、蛮，这是沿袭清代对西南民族的称呼。《清史稿》称“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僮罗、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若《汉书》：‘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皆蛮之类。”<sup>①</sup>

民国以后，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仍沿用“苗、夷、蛮”等称呼，后

<sup>①</sup> 赵尔巽：《清史稿》缩印本，第512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33页。

又以边民、边胞称之。这从国民政府下发的民族调查表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如1934年的调查是“西南苗夷民族调查”，1938年的调查是“西南边区民族调查”，对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名称是《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民国时期，虽然提出民族平等原则，但民族间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上报的调查表中多沿用苗夷蛮猺獠等称谓，所用的字大都是带有歧视侮辱性质。民族的名称除了蛮夷外，所用的字尚带反犬旁，如獠、猺人等，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仍有歧视和压迫。

## （二）未能对西南民族进行科学的分类和识别

民国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没有按照语言系统进行分类，导致西南民族名称繁杂，种类很多。在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中，主要是依靠分布有少数民族的西南各地地方官员进行，他们没有接受过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上报的调查表只注意了少数民族的自称和他称，没有按民族的语言系统来进行科学的分类，导致民族名称繁杂，种类很多。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名称有200余种<sup>①</sup>。其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名称根据1938年上报的调查表统计，约150多种（作者自己统计）。云南民族有“白苗”、“花苗”、“黑苗”、“青苗”、“红夷”、“白夷”、“黑夷”、“黄夷”、“岗夷”、“黑乾夷”等不同名称，“白苗”、“花苗”、“黑苗”、“青苗”明显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在民族调查表中却被当成不同的民族。类似的情况在调查表中很多，如上报的有“花裤獠”、“大裤獠”、“黑獠”、“白獠”、“獠罗”、“长毛獠”、“斫头獠”等，他们也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却被看成是不同的民族，“花裤獠”、“大裤獠”是根据他们的服饰来命名的，“斫头獠”是根据他们的风俗而得名。此外，民族名称也不规范，相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调查表中写法不同，如“香谈”，被写成“香檀”、“乡谈”。傣傣，被写成“栗栗”、“力苏”、“黎苏”。

贵州民族名称和种类，有“黑獠、罗鬼女官、白獠、宋家苗、菜家苗、卡尤仲家、普笼仲家、黑脚苗、尖头苗、马蹬龙苗、大家龙苗、花苗、红苗、白苗、黑苗、青苗、东苗、西苗、侬苗、打牙苗、前发仡佬……土仡佬、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等71族系”<sup>②</sup>。另据《贵州

<sup>①</sup> 《云南省政府秘内字第789号通令》，1939年1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58页。

<sup>②</sup> 贵州省民政厅：《贵州民政概况》，1944年10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275卷。

苗夷族社会概况》一文认为：贵州少数民族达82种<sup>①</sup>。作者对1934年上报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进行统计，贵州民族的名称达90种之多，说明了当时民族名称的繁杂。民族种类有苗族、仲家、仡佬、龙家、侬罗、水家、侗家及僮家等，其中苗族为最多。由于各族人民住在崇山深谷，族间不相往来，遂以地域不同、语言、习俗亦不同，乃依照他们服装的颜色与其他特性，有不同的名称。若以衣服颜色区分，有青苗、黑苗、白苗、红苗、花衣苗；以居住地域区分，有高坡苗、河边苗、平地苗、山苗、坝苗、车苗、西苗、箐苗；以地名区分，有水西苗、加车苗、滚塘苗、车寨苗、洪州苗、平伐苗、八寨黑苗、克孟牯羊苗、谷蔺苗、紫云苗、西溪苗；以衣服花纹区分，有花苗、大花苗、小花苗、花衣苗；以所着之裙区分，有长裙苗、短裙苗、围裙苗；以职业区分，有采铁苗、打铁苗；以装饰区分，有古董苗、纠纠苗、枕头苗、尖顶苗、凤头鸡、黑脚苗等。其次还有仲家（今布依族），仡佬。仅仡佬族就分为花仡佬、红仡佬、前发仡佬、披袍仡佬等。

1939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禁止再用苗夷蛮猺猓獠等少数民族名称，概以其生长所在地人称呼。同时规定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起见，“应将原有名称一律予以改订，以期泯除界限，团结整体中华民族。”<sup>②</sup> 1940年1月，虽制定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但并未对西南各民族进行认真的民族识别。

### （三）政出多门，各行其事

民国时期没有统一的边疆管理机构，虽然中央有蒙藏委员会，但蒙藏委员会不能很好地行使管理边疆的职能。从蒙藏委员会的名称和机构设置来看，蒙藏事务是它基本职责范围。但是，蒙古和西藏不能概括中国所有边疆地区，而且，西南几省在民国时期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蒙藏委员会不能有效的管理西南边疆事务。

西南边疆省份各自设立边政机构，各行其事，云南有“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省有“民俗研究会”和“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有“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等。边疆管理机构的不统一，使得对边疆地区的设计、开发、建设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划。

<sup>①</sup> 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sup>②</sup> 《云南省政府秘内字第2883号训令》，1940年1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131页。

#### （四） 调查有失全面与客观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属于行政性调查，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由于每次调查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故在全面性和客观性方面有欠缺。如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调查不够深入。在几次调查中，主要是重视少数民族种类、人口、户籍、居住区域和生活习尚（习惯）等，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状况等没有包括在内。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结果，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很难有实际意义。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反映出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阶级状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南各族人民既要受汉族统治者的压迫，又要受他们本族土司或其他民族土司的统治。但在少数民族调查中，没有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的阶级情况。

#### （五） 调查工作效率不高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还反映出了当时办事效率的低下。调查一般都要求在文到十日或一月时间内限时填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调查拖延的时间很长，有的甚至达几年都上报不齐。以云南省1938年边区少数民族调查为例，1938年6月云南省政府密令，要求于文到十日内，翔实调查填报，但是到1938年11月只有武定等55县上报到云南省政府。随后，云南省民政厅又多次发训令，甚至快邮代电令，要求及时调查填报，但很多县仍然拖延，甚至有的县以境内无少数民族居住为由推诿不进行调查，亦不上报，故耽误了调查表汇总上报时间。全省调查表收齐仍然到了1941年8月。

当然，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尽管有以上不足，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官方组织的民族调查，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一些民族学的调查成果曾被统治者利用来巩固其统治，但我们不能为此否定这些调查成果的科学意义。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仅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参考，为制定开发边疆计划提供依据，而保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调查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地方志的编纂以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

## 参考文献

### 档案类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第1431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第2044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2）第2045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6）第15700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全宗（6）第15702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378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379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391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401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454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全宗第12456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第4048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第4049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41全宗第410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9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2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5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6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7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20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21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28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34卷。

-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42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4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48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58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59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71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7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80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10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232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583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第916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全宗第544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全宗第646卷。  
云南省档案馆藏：教育厅全宗第765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第290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第1445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1全宗第2872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21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29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38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40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42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43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46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6047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第7096卷。  
贵州省档案馆藏：M8全宗2目第715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41全宗第7509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1348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1363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1520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1521卷。

-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427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537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657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658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659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725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7729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8365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第8366卷。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201全宗第12卷。

### 专 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94年版。

《国民年鉴》，新亚书店1928年版。

《内政年鉴》（一），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云南省政府：《云南行政纪实》，1943年。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1985年。

云南省民政厅：《云南民政概况》，1936年。

江应梁：《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4月。

江应梁：《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9月。

江应梁：《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11月。

江应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江应梁：《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

行，1943年。

彭学沛：《云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贵州省苗民概况》，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印，1937年。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

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下），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1947年。

朱契：《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

《宁属洛苏调查报告》，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1941年。

《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印，1943年。

梅心如：《西康》，正中书局1934年版。

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6年版。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傅嵩焘著，陈栋梁重刊：《西康建省记》，中华印刷公司1932年版。

尹明德：《滇缅界务调查报告》，1931年版。

林炯如、傅绍昌、虞宝棠：《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胡汉民：《总理全集》，民智书店1930年版。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丁伟志：《对历史的宏观思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海士著、黄嘉德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法]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英]戴维斯：《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方福祺：《方国瑜传》，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日]松木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29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1985年。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第二回，行政院编纂，1943年、1944年。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谢本书：《片马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二

集·云南专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江应梁先生自述》，见高增德、丁东主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边疆教育概况》，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年。

《贵州通史》第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 论文：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张文芝：《弥足珍贵的史料——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史料评述》，《民族》，1997年第11期。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斯文半月刊》，第2卷第3期，1941年11月16日。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辑，1946年。

江应梁：《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现代史学》，1937年4月。

江应梁：《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江应梁：《民族学在云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

《西南边区（贵州部分）民族调查表》，《贵州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0、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1日。

《镇宁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

《望谟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4期，1946年7月1日。

《荔波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1日。

《平越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1日。

《威宁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10、11期合刊，1946年12月1日。

《施秉县边胞概况》，《边铎月刊》，第12期，1947年1月1日。

王嗣鸿：《台江边胞生活概述》，《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1日。

梁瓿第：《车寨社区调查》，《边铎月刊》，第5、6期合刊，1946年8月1日。

梁瓿第：《民国以来的西康边民教育》，《边政公论》，第1卷7、8期合刊，1942年3月。

杨森：《从边疆危机说到本（贵州）省边胞文化工作》，《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

《边疆考察团体出发》，《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周刊》第9期，《昆明·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1944年4月。

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1944年2月。

岑家梧：《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季刊》，第1卷第4期，1940年。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边政公论》，第3卷第2期，1944年2月。

凌纯声：《边疆教育工作报告》，《边铎月刊》，第9期，1946年11月。

张汉光：《边政往何处去》，《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

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边政公论》，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3月。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

施珍：《成长中之中国垦殖》，《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李顺卿：《垦殖政策》，《中农月刊》，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

李祥金：《西南的边疆教育》，《边铎月刊》，第7、8期合刊，1946年10月。

《贵州省政府加强边胞教育办法》，《边铎月刊》，第2、3期合刊，1946年5月。

王一影：《泛论边疆夷族青年的教育与训练》，《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

愈兄：《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社会研究》，1940年第12期。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1年12月。

罗致平：《战时中国人类学》，《社会学讯》，1946年第1期。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李有义：《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 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
- 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
- 王文成：《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 陈露、刘泰民：《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社会动员》，《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 王志芬硕士论文：《柯树勋与思普沿边开发》，云南大学，1999年印。
- 曹明煌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云南大学，2003年印。
- 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9期。
- 葛飞：《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潮》，《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 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 陆和健：《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
- 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许公武：《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5、6期合刊，1942年1月。
- 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 附表

附表1 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

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	种类					
	户籍					
	人口					
	语言					
	生活习尚					
	教育情况					
	备考					

附表2 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

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	民族种类					
	居住区域					
	人口数目	男				
		女				
	壮丁数目					
	生活习惯					
	过去开化工作情形					
	备考					

附表3 某某省现有土司调查表

某某省现有土司调查表	土司姓名					说明：如无土司省份此表可不填
	所在地					
	管辖境界					
	何时设置					
	隶属何处					
	可否改设县治					
	现在土司姓名					
	何时委任					
	备考					



云南省 县 现任土司调查表  
局

附表5 对汛督办署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现任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 龄	简明经历	备 考

附表6 云南省现任土司调查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 龄	简明经历	备 考
巧家	户侯司	禄廷英			已于1938年病故，只有一女，无人承袭
广南	世袭土同知	依鼎和，字铸九	40	广东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文山	世袭开化土经历司	周如桂			据该县县长呈报，1939年病故，尚未承袭
玉溪	世袭土州判	王家宾，字作之	42	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1916年袭
蒙自	纳更土巡检	龙健乾，字幼丞	36	北平正志中学毕业	
	犒吾土司	龙鹏程	32		
石屏	思陀土司（土千总衔）	李呈祥，字景云	39	省立第一中学毕业	
	落恐土司（土千总衔）	陈钺氏	50		该土司已故，由其母陈钺氏暂代
	左能土司（土千总衔）	吴忠臣	56	未入学校，私请教师教读十年，粗识文字	



续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龄	简明经历	备考
	亏容下河土司(土千总衙)	孙荫宗	32	石屏高小毕业	
	亏容上河土司(土千总衙)	孙斌元, 字雅堂	49	未入学校, 请教师在家练习十年	
建水	猛弄掌寨土外委	白日新, 字映乾	26	县立高小毕业, 承袭乃父白兆麟之职	1928年承袭
	纳楼司分管乐善永顺二里及江外三猛土方土舍	普国泰, 字平阶	48	清私塾修业, 承袭乃故伯父之职	
	纳楼司分管崇道安正二里土舍	普鸿武, 字幼乔	34	县旧制中学毕业, 承袭乃父普家福之职	
	五亩掌寨土外委	陶文贵	31	未入学校, 粗识文字, 承袭乃父之职	1924年承袭
	瓦渣副掌寨土外委	普国樑	23	高小毕业, 承袭普经魁之职	1931年承袭
	马龙掌寨土外委	李锦廉	35	清私塾修业, 承袭乃父李开科之职	1922年承袭
	六呼掌寨土外委	李瑞庭	25	未入学校, 粗识文字, 承袭乃伯李朝阳之职	
	宗哈副掌寨土外委	白继光	38	未入学校, 粗识文字, 承袭乃父白石柱之职	1917年承袭
	溪处土舍	赵福星			因争袭, 主谋杀死另一赵福星嫌疑案被停职
	宗哈瓦遮正掌寨土外委	普正宽			1939年病故
江城	整董土把总	召存仁, 字新安	25		
思茅	猛旺土司	召映福	35	高小毕业	
	竜得土司	叶应龙	36	未入学校不识字	
	倚邦土司	曹仲书	22	省南箐学校毕业	
六顺	六顺土把总	刀盛珩, 字瑞廷	32	初中毕业	1930年承袭
景谷	威远土千总	刀永康, 字映泉	34	普洱省立旧制师范毕业	

续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龄	简明经历	备考
	猛班土把总	周忠权，字俊宽	30	普洱省立旧制师范毕业	
	猛戛土把总	刀太清	32	高小毕业，中学修业	
镇越	猛腊土把总	刀镇邦，夷名君孟	30	汉夷学校毕业	
	猛伴土弁	召叭竜拿	50	历任土职	
	猛仑土弁	刀继忠，又名刀新民	40	历任土职	
佛海	猛海土把总	刀宗汉，字良臣	32	识字无多	
	打洛土千总	刀庆华	26	识字无多	
	猛混土把总	刀栋宇，字官南	30	颇识汉文	
南峽	猛满土外委	刀正清	38	未入学校，粗识文字	
车里	车里宣慰司	刀栋梁，字柱臣	56	不识字，略通汉语	
	大猛笼土千总	刀荣安	30	不识字，略通汉语	
	猛罕土把总	刀栋庭，字柱石	38	军官讲习所毕业	
	小猛养土把总	刀正才	46	不识字，略通汉语	
镇康	孟定土知府	罕中兴	18		尚未正式承袭，已令饬遵例承袭
昌宁	湾甸土知州	景功，字谨恭	15	师范毕业	
澜沧	孟连宣抚司	刀派洪	21	粗识汉文和缅文	
	募乃土把总	石玉清	28	上海复旦大学修业	
	上猛允土把总	刀世泽	18	昆明南箐小学修业	
	下猛允土把总	刀富文	28	不识字	
	大山土守备代办	石秉忠，字汉臣	38	粗识文字	
	蛮海土守备	石安荣	4	未入学	
	东河土把总	张启财	29	粗识文字	

续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龄	简明经历	备考
	圈糯土千总代办	李家声	14	初小	
	猛滨土目代办	罕刀氏	50	不识字	
	西盟土目代办	李长	38	不识字	
沧源	猛角董土千总	罕华相, 字绍卿	60	略识汉字	
耿马	耿马宣抚司	罕富廷, 字裕卿	31	曾受私塾教育一二年, 粗识文字	
瑞丽设治局	腊撒长官司	盖炳铨	46	能识文字	
	猛卯安抚司	衍景泰	14	高小毕业	由刀保图代办
潞西设治局	芒市安抚司	方克光			
	遮放副宣抚司	多英培			1932年承袭
	猛板土千总	蒋家俊			
梁河设治局	南甸宣抚使	龚统政	18		
陇川设治局	陇川宣抚司	多永安, 字靖之	29	腾保等15属自治训练所毕业	
盈江设治局	干崖宣抚司	刀承钺	23	私塾读书11年	1931年承袭
	户撒长官司	赖奉先	56	不识字	1922年承袭
龙陵	潞江安抚司	线家齐, 字比德	28	腾冲私塾	1929年承袭
保山	练地土巡捕	杨定周	20	高小毕业	
莲山设治局	己革盞达副宣抚司	刀思鸿升, 字缙轩	48	稍通文字, 现任该属保安副团长之职	该革土司系刀思必治之子, 迭经请求复职不准
泸水设治局	老窝土千总	段承恭	33	高小毕业	
	六库土千总	段承经	25	保山师范训练所毕业	
	鲁掌土千总	茶光周, 字鼎丞	29	高小毕业	
	登埂土千总	段承钺	60	初识文字	
	卯照土千总	段廉华	18	小学毕业	

续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龄	简明经历	备考
兰坪	兔峨土舍	罗星， 字紫垣	32	县立高小毕业	
中甸	五境土守备	刘恩， 字国荣	50	历充土目	
	五境土守备	陈延年， 字永生	60	历充团首	
	大中甸境土千总	松耀魁， 字射斗	30	初小毕业	
	小中甸境土千总	汪曲批	21	素习藏文	
	江边境土千总	杨汉钦， 字国安	45	高小毕业	
	泥西境土千总	七玉麟， 字瑞书	34	初小毕业	
	格咱境土千总	田余丰， 字尚鑫	31	边区师资训练班修业	
	大中甸境土把总	杨灿文， 字子安	42	历任土目	
	大中甸境土把总	齐祖望， 字位东	60	历任土目	
	大中甸境土把总	徐凌云， 字国才	62	历任土目	
	大中甸境土把总	七友才	18	初小毕业	
	大中甸境土把总	王绍郭， 字克昌	42	高小毕业	
	小中甸境土把总	马玉龙	52	历任土目	
	小中甸境土把总	陈纪	19	省立中学毕业	
	江边境土把总	和士杰， 字冠英	40	小学毕业	
	江边境土把总	和锡铨	40	高小毕业	
	江边境土把总	杨尚礼	42	历任土目	
	泥西境土把总	刘汉鼎， 字蜀章	24	高小毕业	
	泥西境土把总	黄育英	19	初小毕业	
	泥西境土把总	何世昌	26	初小毕业	

续表

属别	土司名称及职别	土司姓名及字号	年龄	简明经历	备考
	格咱境土把总	松培祖	65	历任土目	
	格咱境土把总	牛奎斗	26	高小毕业	
	格咱境土把总	桑义阿间	47	历任土目	
德钦设治局	阿墩子土千总	木氏阿宗	65	未入学校	因木尚忠身故，其子尚幼，暂以其妻阿宗代办
	阿墩子土把总	桑尚荣	45	不识汉字，仅识藏文	
	阿墩子土外委	吉福	34	未入学校，仅通藏文	
鹤庆	世袭土通判	高忠亮，字位卿	13	现入小学，略识浅义文字	
丽江	土通判	木琼，字佩铭	33	丽江中维兰联合中学毕业	
	土千总	杨如桐，字凤鸣	29	高小毕业	
	土守备	和立忠，字盖臣	61	曾充土把总、土千总等职	
	土千总	王育忻，字月山	48	前清军功，历充土把总、军佐，民国28年（1939年）补为土千总	
宁蒗设治局	永宁土知府	阿民翰，字孟屏	30	初识文字	
	蒗蕨州土知州	阿鸿钧，号运辰	35	能识文字	
永胜	顺洲土州同	子天明	13	顺洲小学毕业	
武定	勒品乡土巡捕	李国钧，字鸿逵	30	成德中学修业	
	暮莲乡土同知	那维新，字焕民	31	北京大学及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	远出未归，由其母那安和卿负责
	环洲乡土舍	李鸿纓，字健雄	23	武定小学毕业	

注：此表是1939年调查所得，所载共有37个县（局），有109处土司，按照东南西北区域汇列。



附表9

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

某某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调查表	县(市)				
	少数民族名称				
	人数				
	合计				
	全县(市)人口数				
	少数民族占全县(市)人口百分比				
	备考				

附表10

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

族名	人数			分布地区	生活习惯	语文	宗教	备考
	共计	男	女					

附表11

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表

族别						
人口数	男					
	女					
面积						
教育程度	小学					
	中学					
	专科					
经济状况	主副食物					
	通货情形					
	特产物质					
	输入主要物资					
武力概况	枪种					
	弹药					
归化程度						
备考						

附表12

云南省傣族人民调查表

云南省傣族人民调查表	种类				
	人口数目				
	散布区域				
	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之百分比				
	有无特殊活动情形				
	备考				



附表13 贵州省 县改土归流土司调查表

县改土归流土司调查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				
	住址				
	备考				

说明：此表为原档案中的格式。

附表14 贵州省已改土归流土司调查表

县名	姓名	年龄	籍贯	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	住址	备考
开阳	刘锡臣	60	开阳	刘家衙土司	第五区刘家衙	该土司职务于民国成立后即行取消，现在并未任何职务
	杨荣和	72	开阳	杨家衙土司	第三区杨家衙	同上
黄平	何仲文	28	黄平	任短期小学校长	岩门司	
	张义安	30	黄平	闲居	岩莺屯	
	冯国栋	27	黄平	不详	第一区	
兴仁	龙春衢	50	兴仁	逊清时原袭保鲁布三营营官，现任初级小学校长	第四区鲁土营	
	龙介眉	45	兴仁	逊清时原袭阿计营土守备，现任联保主任		

续表

县名	姓名	年龄	籍贯	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	住址	备考
盘县	龙腾壮	55	盘县	盘县北里冬防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六区洒基凹	龙腾壮、龙鹏程系同胞兄弟，两地分居。该祖人自清初受土司职，后人世袭相承，现已改土归流多年
	龙鹏程	51	盘县	1938年任本县第八区区长，（1939年）已卸职	第七区梅子沟	
黔西	安经畚	48	黔西	原名法可土司，曾任区长，现闲居	第二区水淹坝	
	禄藻章	38	黔西	原名法稷土司，曾任区长，现闲居	第八区枸皮水	
施秉	安培基	40	施秉	原职镇远府偏桥正长官司	施秉城外黄品街	承继安永福，未改土归流
	杨育荪	57	施秉	原职镇远府偏桥右长官司	施秉城外杨家街	未改土归流
	杨著臣	51	施秉	原职镇远府偏桥左长官司	施秉城外中寨	未改土归流
罗甸	黄平康	64	罗甸	原任罗敖、罗赖两亭亭目，现在务农	第三区逢亭联保罗赖乡	
	王周元	51	罗甸	原任上隆亭亭目，现在务农	第三区上隆联保	
	黄景熙	43	罗甸	原任怀亭亭目，现在务农	第六区仁矿联保	
三合	张善述	68	三合	普安土司	第四区普屯	现未任职
丹江	余柱臣	50	丹江	原为乌迭司土千总，现在赋闲	丹江县城内西街	
	黄灿一	80	丹江	鸡誦司土千总，现在赋闲	麻江属桃五	
册亨	岑吉松	30	册亨	过去是土目，现未任职	第一区羊场	
	周老八	26	册亨	过去是土目，现未任职	第五区洛发	
	陆昌易	50	册亨	过去是土目，现未任职	第一区八卧	

续表

县名	姓名	年龄	籍贯	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	住址	备考
	依春照	50	册亨	过去是土目， 现未任职	第四区央兵	
	陆克光	20	册亨	过去是土目， 现任第三区第一联保主任	第三区者诰	
松桃	杨氏	不详	松桃	原平头司着可 正长官司	第三区平头司	本县土司自民国光复后，均未承袭，名字及年龄无从查悉填注。各该土司亦未新任地方职务
	田氏	不详	松桃	原平头司副长 官司	同前	
	杨氏	不详	松桃	原乌罗司着可 正长官司	第四区小寨	
	冉氏	不详	松桃	原麻兔司副长 官司		
沿河	张升平	58	沿河	原名祐溪正长 官司，曾充任 城防司令	沿河县下街	于1935年10月，奉（贵州）省政府字3388号训令废止土司在案
织金	安仲三	60	织金	原属水西土 司，曾任第五 区区长，现任 本县县政设计 委员会委员	鸭堰	
	安少华	53	织金	原属水西土 司，现任本县 联防队长	八步场	仲三之弟
	安鹏	23	织金	原属水西土 司，现任本县 保训所中队长	五里河	仲三之侄
	安崇智	20	织金	原属水西土 司，现任第九 区义勇队队长	茶店	仲三之侄
	杨定乾	45	织金	原属三塘土 司，曾任本县 第九区区长， 现任本县县政 设计委员会 委员	官寨	

续表

县名	姓名	年龄	籍贯	现任职务及原有名称	住址	备考
	杨士英	35	织金	原属三塘土司，现任第五区区务协进会委员	三塘	定乾之弟
	杨效芬	21	织金	原属三塘土司，曾任第五区义勇队队长	官寨	定乾之子
	邬荣光	48	织金	原乾河土司，曾任第四区乾河联保主任	乾河	
郎岱	沙见秋	50	郎岱	赋闲	高石坎	
	陆绍武	45	郎岱	赋闲	鸡场	
黎平	石氏		河南祥符	潭溪长官司	第五区铜关	
	石氏		直隶沧州	潭溪副长官司	第一区潭溪	
	吴氏		江西太和	八舟长官司	第一区八舟	
	李氏		江西太和	洪州长官司	第三区洪州	
	林氏		江西太和	洪州副长官司	第四区水口	
	欧阳氏		江西太和	新化长官司	第二区新化司	
	阳氏		江西太和	欧阳长官司	第二区欧阳司	
	吴氏		江西太和	欧阳副长官司	第二区	
	杨氏		江西丰城	龙里长官司	第二区龙里司	
	杨氏		江西吉安	三郎长官司	第二区三郎司	
	杨克忠		江西太和	古州（罗里）长官司	第七区罗里寨	

说明：此表是作者根据1939年贵州各县上报的改归流土司调查表进行的汇总，15个县，共有51位。表中“现任”是指1939年，特此说明。

附表15

省 县各边地土著民族人口调查表

宗(民)族别				
居住区域				
人口数	合计			
	男			
	女			
壮丁数				
各民族特质异同	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			
	经济生活			
	教育程度			
	语言文字			
备注				

附表16

四川省 县边地土司调查表

四川省 县边地土司调查表	原有名称					
	土司姓名					
	现任职务					
	所在地址及所辖区域					
	所辖部落或支族					
	改流时期					
	备考					

附表17

四川省所辖土司名称表

县 别	土司数目	土官数目	土族名称数目
平武县		土通判一	西番、吐蕃一
		土长官司一	西番、吐蕃一
		土知事一	西番、吐蕃一
茂县	静州长官司一		羌一
	陇木长官司一		羌一
	岳希长官司一		羌一
	长宁安抚司一		羌一
	水草坪巡检司一		羌一
	牟托巡检司一		羌一
	竹木坎附巡检司		羌一
	实大关副长官司一		羌一
汶川县	瓦寺土司一	瓦寺宣慰使司宣慰使一	唐古忒族一
松潘县	长官司一	土守备一三	蛮族一
	民政司一	土千总八	戎族
		土把总一	羌族一
		土外委一	傜族一
		土弁三	傜族一
理番县	梭磨土司一	宣慰司一	
	卓克基土司一	长官司一	吐蕃族一
	松冈土司一	长官司一	吐蕃族一
	党坝土司一	长官司一	吐蕃族一
懋功县	鄂克什一	大头人四 小头人四	夷族一
	绰斯甲一	大头人六 小头人六	同上
西昌县	河东长官司一	千户五、百户六	傜罗一
	阿都正长官司一 副长官司一	千户一、百户二	同上
	昌州长官司一	千户一、百户一	同上

续表

县 别	土司数目	土官数目	土族名称数目
	普济州长官司一	千户一、百户二	同上
	威龙州长官司一	千户一、百户一	同上
冕宁县		苏州土千户一	傜罗、西番二
		架州土百户一	架州土百户一
		糯白瓦土百户一	傜罗、西番二
		大村土百户一	同上
		苗处土百户一	傜罗一
		漕谷土百户一	傜罗、西番二
		大盐井土百户一	傜罗一
		中村上百户一	西番、傜罗二
	苦竹兼通安土司一	土百户一	黑夷白夷二
昭觉县	沙马宣抚司夷	土目一	八且支夷一
		土目一	阿什支夷一
		土目一	沙马支夷一
		土目一	夹不马家夷一
		土目一	吉狄支夷一
		土目一	李哀支夷一
		土目一	下三支马家夷一
		土目一	上三支马家夷一
		土目一	阿洛支夷一
		土目一	水扒支夷一
		土目一	阿俟夷一
越嶲县	邛部宣抚司一	土官一	傜罗一
	松林地上都司一	土官一	西番一
盐边县	巡城兵马司一	舍目二 大头四	苗子一 傜一
	马刺长官司一	舍目二 大头四	摆夷一 傜罗一
		中所土千户一 舍目四 大头八	摩梭一 西番一

续表

县 别	土司数目	土官数目	土族名称数目
		右所土千户一 舍目四 大头八	摩梭一 西番一
天全县	宣慰使司宣慰使一		穆坪土番一
峨边县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雅扎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魁西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二	哈什三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蜚瓜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别色落底支夷一
		呷斯土百户一	西番、傛罗二
		石古路土目一	水田、傛罗二
		青土嘴土目一	水田、傛罗二
		白宿瓦土目一	傛罗、摩梭二
		水落土百户一	摩梭一
		河边土百户一	傛罗、水田二
		沙坝土百户一	傛罗、水田二
		冕山土百户一	傛罗、水田二
		窝保土百户一	傛罗一
		锣锅底土百户一	水田、摩梭二
		蜡蜡白土百户一	水田一
盐源县	木里安抚司一	把司四 大头八	西番一、傛夷一 么些一、呷述一
	瓜别安抚司一	把司四 大头六	么些一、西番一 傛罗一
		中所土千户一 把司二 大头六	西番一、么些一 傛傛一、摆夷夷 傛夷一



续表

县 别	土司数目	土官数目	土族名称数目
		右所土千户一 把司二 大头六	西番一、么些一 傣夷一、傣傣一
	古柏树巡城兵马司一	把司二 大头四	西番一、么些一 傣夷一
		左所土千户一 把司二 大头四	西番一、么些一 傣夷一
		前所土百户一 把司二 大头四	西番一、么些一 傣夷一
		后所土百户一 把司一 大头一	西番一、么些一 傣夷一
		禄马六槽土目一 把司一	么些一、傣夷一
		阿撒土目一 把司一	西番一、么些一
会理县	黎溪土司一	土千户一	黑夷白夷二
	普隆土司一	土百户一	黑夷白夷二
	看保兼会理土司一	土千户一	黑夷白夷二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白魁阜鸡疏支夷一 哈布麦黑疏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胃扭支夷一
		土百户一	别挖支夷一
		土百户一	哈纳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马咄支夷一
		土千户一 土百户一	肥巴支夷一 哈鸡疏支夷一
		土百户一	乌抛支夷一
		土百户一	呆得支夷一
马边县		土千户一 酋长一 土百户一 土百户通事一	黑夷一 白夷一 傣罗一

续表

县 别	土司数目	土官数目	土族名称数目
雷波县	正长官司一	土千户一三 土百户四二	白夷一 黑夷一
古蔺县		头目一	傛罗一
		头目一	羿子一
		头目一	白儿子一
		头目一	仡佬一
		头目一	花苗一
		头目一	青苗一
		头目一	鸦雀苗一
		头目一	多罗苗一
綦江县		土目一	青苗一
		土目一	红苗一
		土目一	罗哪一
南川县		土目一	苗一

此表系1931年四川省提供的四川土司名称简表，见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内政年鉴》（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第257~260页。

##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半年的修改，现在终于杀青。手捧着自己逐字撰写的稿子，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不安。激动的是3年学习的成果终于要面世了，心中不禁感慨万千。这3年多的学习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十分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也深知自己基础差，底子薄，只能加倍努力的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查阅、抄录档案，收集资料，晚上进行整理和研究。假期，先后到四川、贵州、南京等地查阅资料，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我的选题《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过去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没有可资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档案刚开放不久，有的档案属于控制使用，部分资料我至今无法看到。加之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免精力有所分散，尽管已倾向竭力，但书中肯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心里难免惶然。

望着书稿，此时此刻，来自老师、同学、朋友、亲人的种种帮助和支持，使我没齿难忘。我的点滴进步，都与他们的鼓励、关心和帮助分不开。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万永林教授，他没有嫌弃我的愚钝，收下我这个学生。在我论文的选题过程中，他因人施教，根据我曾教过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历，确定民国时期作为我研究的范围。在论文的写作、修改阶段，万老师细心评阅，认真修改，几易其稿，使论文得以完成。在此向万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

感谢云南大学尤中先生对我的指导。感谢云南大学方铁教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并对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使之得以发表。还要感谢云南大学王文光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杨德华教授、云南大学张鑫昌教授、方慧教授，在论文选题、写作、修改过程中提出的中肯意见。感谢王志良老师两次阅读论文。感谢我的学友们，在我困难时给予的帮助，在我痛苦时给予的安慰。

感谢云南省档案馆的张文芝、贾云、杨平等同志，贵州省档案馆的李平远、刘树清、龙珊同志，四川省档案馆的汪素香同志，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王俊明同志等，以及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为我提供的方便和支持。

感谢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并为我论文的出版提供了资助。感谢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封海清副校长和科研处长柴毅龙教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杨云宝主任。

还要感谢父母的理解。感谢我丈夫在我准备考博及读书的几年中，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及对孩子的教育，使我能安心学习，完成学业。

马玉华

2006年6月